



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

一个王朝的背影

唐际根 著

考古队长
讲述商朝往事

- 殷墟为什么能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
- 跨时空回溯：种系与族源
- 家在洹上：农业与定居生活
- 经济史上的海贝时代：货贝与贸易
- 占卜：未来可以预知
- 斧钺下的生灵：人殉与人祭
- 岁月无法尘封的美丽
- 鬼神泣，文字出
- 『狰狞』与质朴：艺术的意味与美感
- 祸起干戈：王朝的覆灭
- 世界的殷墟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ress.com

殷墟

一个王朝的背影

唐际根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 / 唐际根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3171-0

I. 殷… II. 唐… III. 都城-古城遗址(考古)-简介-安阳市-商代
IV. K·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7307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责任印制：赵德静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月第一版 开本：B5 (720×1000)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印数：1-13 000 字数：280 000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佳信达〉)

目 录

- 壹 殷墟为什么能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 贰 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 9
- 叁 三千年山水传奇 27
- 肆 跨时空回溯：种系与族源 37
- 伍 国家与社会 49
- 陆 家在洹上：农业与定居生活 65
- 柒 牧野原本牛羊肥：畜牧业 89
- 捌 百工竞艺：门类众多的手工业生产 97
- 玖 马车遥伴轻舟过：水陆交通 127



- 拾 经济史上的海贝时代：货贝与贸易 135
- 拾壹 占卜：未来可以预知 139
- 拾贰 葬俗：棺椁为屋，事死如生 143
- 拾叁 斧钺下的生灵：人殉与人祭 149
- 拾肆 岁月无法尘封的美丽 167
- 拾伍 鬼神泣，文字出 183
- 拾陆 『狰狞』与质朴：艺术的意味与美感 197
- 拾柒 祸起干戈：王朝的覆灭 215
- 拾捌 世界的殷墟 225





殷墟为什么能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洹（huán）河，是我国北方的一条小型水系。多少个纪元，她静静地流淌在豫北平原，宛如一名裸卧的少女，冰肌玉肤，睡意朦胧。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依偎在洹河怀抱的豫北重镇安阳，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都邑所在地。

这个王朝便是商朝。商王朝在安阳的都邑，被称为殷墟。

这是一个备受全世界关注和景仰的遗址。这是一个有着辉煌身世的遗址。这是一个被称为“考古圣地”的遗址。

殷墟，书写在豫北大地的古老传奇，静静地躺在洹河之滨，等待人们去阅读、去聆听。（李自省 摄）



1899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现代金石学家收藏。

1908年，学术界确认甲骨系安阳殷墟所出。

1928年，学术界首次正式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934年，发现商王朝的王陵区。

1936年，惊现被称为“世界最古老档案”，保存有1.7万片带字甲骨的大型甲骨坑。

1939年，安阳村民从地下掘出司母戊大鼎。

1961年，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6年，发掘保存完整的商代国王配偶“妇好”墓。

1983年，中国古都协会将殷墟列入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1999年，东北外缘钻探出面积达4.7平方千米的商代夯土城址。

2000年，考古界评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殷墟以最高得票数名列第一。

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酝酿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将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全球角度确认了殷墟作为“具有普遍和突出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

殷墟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的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它以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实物资料，证实了曾零星见载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商王朝的存在，而且提供了有关商王朝的丰富知识。

作为商王朝的都邑，殷墟的核心价值，在于甲骨文。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前身。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卜辞，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等各方面，是研究殷代社会的珍贵资料。人类历史长河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等在内的古老文字体系早已不再使用，但甲骨文却将生命延续至今。不仅今天中国的十几亿人仍然使用汉字，汉字还对日、韩等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中华文明的光芒穿越时空，照耀了半个地球。



殷墟记录了许许多多的重要创造发明。最典型的例子是块范法青铜器铸造技术。这种独具一格的技术完成了重达875千克的司母戊方鼎，将中国青铜文明推进到鼎盛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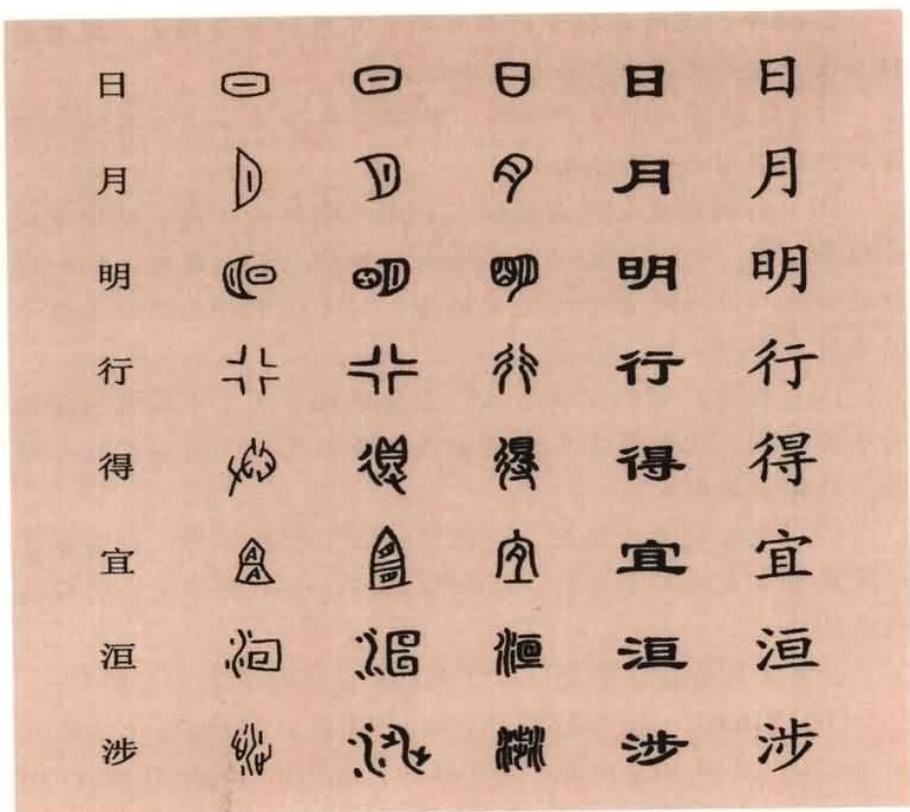
殷墟又是中国文明进程中许多重要制度的巩固或转型时期。

中国人历来强调血缘，重视亲情。这一特征很大程度上缘于商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宗族结构”。居住在殷墟的商人按各自的“族”相聚而居，死后也聚葬一起。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社会组织，直到近代才逐渐受到现代文明冲击而解体。

金秉模（前左二），韩国考古学家。

2005年9月，受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他以联合国专家的身份，于“申遗”前夕专程考察了殷墟。金秉模先生对殷墟的价值和申遗准备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2006年7月，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殷墟申遗意见中，金秉模先生的考评报告是重要依据。（常俭传 提供）





3000年前的甲骨文，正是汉字的前身。汉字造字所依托的基本造字方法均见于甲骨文中。今天绝大多数汉字，不过是历史上几经改革之后，逐渐演变过来的。（录自殷墟申遗文本）

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是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明清北京城就是典型的“中轴线”布局的例子。殷墟洹北商城的发现，将“中轴线”布局的城市营建制度追溯到了3300年前的商王朝。不仅如此，我国华北地区普遍采用的“四合院”建筑样式，早在商代已经普及。位于洹北商城内的一号商代建筑基址，长170余米、进深约90米的四合院，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确认，殷墟遗址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六条标准中的四条：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与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他们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从而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

世界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报告的原文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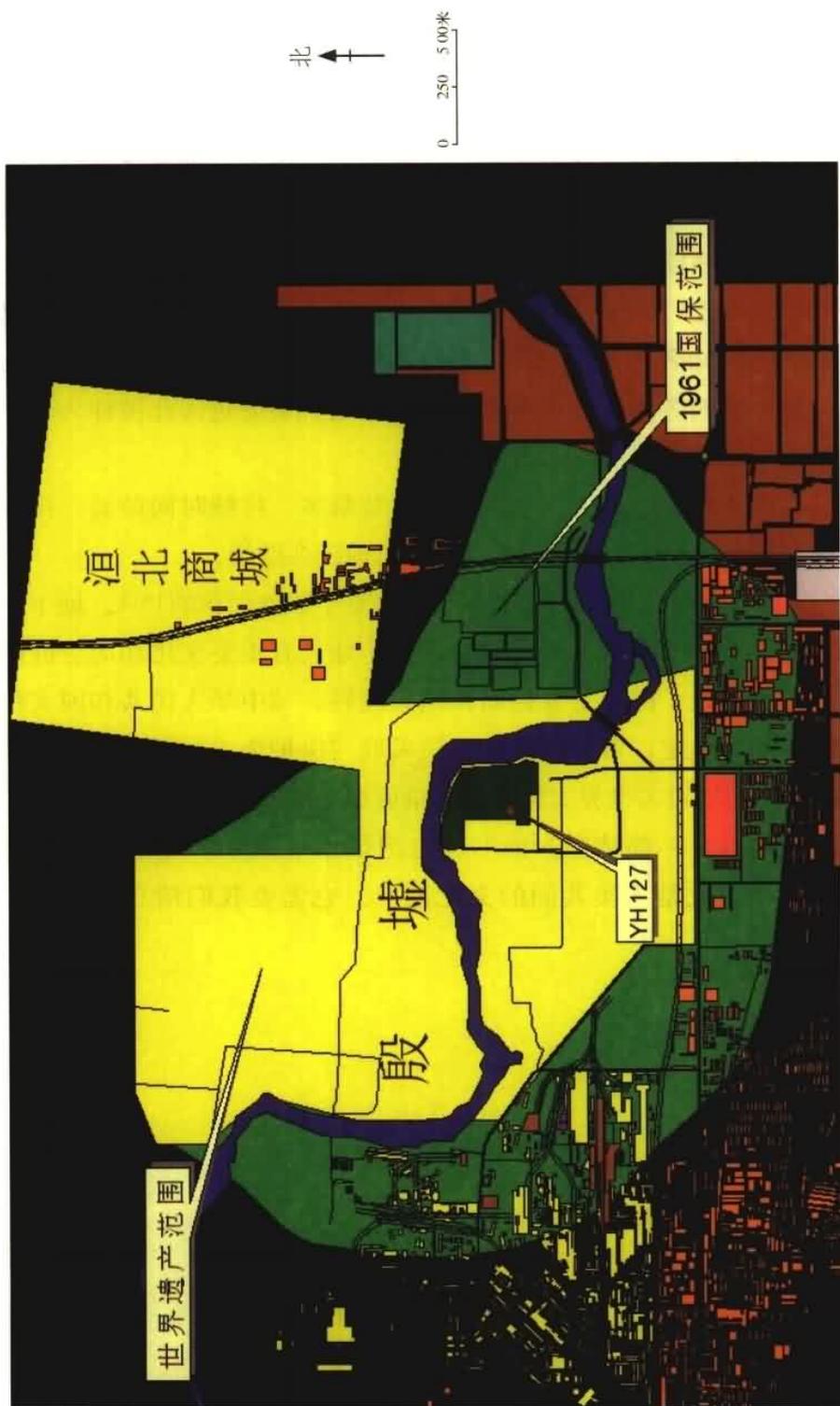
(ii):Yinxu, capital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exhibits an exchange of important influences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China's ancient bronze culture,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writing.

(iii):The cultural remains at Yinxu provide exceptional evidence to cultural traditions in Late Shang Period, and are testimony to man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and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solar and lunar calendar system, and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systematic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in oracle bones.

(iv):The palaces, ancestral shrines and the royal tombs of Yinxu are outstanding example of early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y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establishing the early prototypes for Chinese palace architecture and royal tomb complexes.

(vi):The material remains discovered at Yinxu provide tangible evidence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Chinese writing and language, ancient beliefs, social systems, and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are considered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significance.

资料来源：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材料（WHC-06/30.COM/8B; Paris, 20 June 2006.）。



作为中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在1961年公布的保护范围基础上，参照新的考古发现以及遗址的保护现状，划定了强制性保护范围。该范围已在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备案，受国际条约的保护。中国作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缔约国，有兑现自己保护和管理好殷墟承诺的义务。图中YH127为1936年发现的最大甲骨埋藏坑，一次性出土契刻商代文字的卜甲1.6万余片。（唐际根 绘）



濒危或已经消失的特有文化现象，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重视的遗产内容。商代的大规模“杀祭”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杀祭”并非商文明所独有（中南美的玛雅人也曾热衷杀祭），并且显然算不得什么光彩面，但商王朝动辄成百上千人的“杀祭”规模以及“杀祭”方式的繁复程度，的确是不能轻松一笔淡然忘却的。

殷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缩影。据统计，半数以上的中国知名考古学家曾在殷墟工作。殷墟田野工作中所创造的方法被带到各地，并在考古作业中应用。殷墟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

作为我国众多古遗址中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遗址，殷墟的发掘工作目前还在继续。

目前殷墟遗址所揭露的面积约占整个殷墟面积的15%。地下还埋藏着无数的宝藏。对于殷墟这样一处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遗址来说，决不是发掘面积越大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于古遗址应该采取“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殷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更是需要悉心保护。

殷墟是一部精彩的地书。它记录了中国3000年前灿烂的青铜文化。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需要我们精心阅读，共同关注。



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



盘庚迁殷，山高水险，千里迢迢，历经的种种磨难。事关国家复兴，大家义无反顾。（唐川府 提供）

中国历史上有个商王朝

据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约500年。

据传，商王朝的第一位商王名“汤”。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一个被称为“亳”（今河南郑州或偃师附近）的地方建国，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办法，前后共有31位商王。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大约到公元前14世纪晚期，第20位商王“盘庚”迁都至“殷”，直到公元前1046年为逐渐强大的周人所灭，商朝都邑不再迁都。

遗憾的是，早期文献中有关商王朝的记载过于简略，通常只有寥寥数语。记录商史内容最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总共也只有区区2000余字。谨慎的学者认为，文献所载内容可能会存在

史記卷三

殷本紀第三

殷契，^{〔一〕}母曰簡狄，^{〔二〕}有娥氏之女，^{〔三〕}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四〕}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五〕}賜姓子氏。^{〔六〕}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殷本紀第三

九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般，民不遷，有居，率爾來，遷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割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自先王有服，格謹，天命茲曠，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爾木之有由，隳天其水，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聽乃心，無傲從廉，古我先王，亦惟用任，勸人其政，王播告之，惟不置，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庸子弗知乃所說，非予克，故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親之，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顧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長，或壽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替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知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益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矧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蹙，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邇任有言曰：人惟求舊，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暨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邇爾勞，予不掩爾善，矧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吳子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威，惟汝衆，邦之不威，惟予一人有佚，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盡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尚书》和《史记》都保存有关于商王朝的部分史料。

《尚书》年代很早，据说成书于西周时期。书中有多篇短文谈到商王朝。其中的《盘庚》篇分上、中、下三篇，记述了商王朝第20位国王盘庚迁都于殷的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编撰。年代晚于《尚书》。《史记》中的《殷本纪》，集中将商王朝的历史作了概括，提供了有关商王朝王世、都邑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

误记或虚记。而对于某些极端的人来说，商王朝的文献都有必要以怀疑的眼光去审视。

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存在过，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王朝？这个古老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怎样构成的？主宰和管理它的是些什么人？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有没有饥荒？有没



有战争？有什么发明创造和艺术成就？又有什么宗教信仰和奇风异俗？

这些谜团的谜底，直到考古学家系统发掘安阳殷墟之后才逐渐得以揭开。

殷墟的发现

殷墟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京广铁路从遗址东部穿过，南来北往的旅客途经安阳时，可凭窗眺望遗址全貌。

殷墟的发现，需从安阳小屯村出土“龙骨”的传说谈起。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开始有人移居这里。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只有几百年。

清末以来，小屯的居民们常常在耕作中从地下挖到一些碎骨片。开始时他们并不在意，将这些碎骨片随手丢弃。19世纪末，当地村民间忽然传出一个神话，说是这些碎骨其实是所谓的“龙



商族人以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来占卜。

左：商人用过的牛肩胛骨，1991年小屯南地出土；右：商代龟腹甲，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



小屯是明朝年间才有的一个居民点。起初仅仅只有数户人家。随着人口增加，至清末时，小屯村已达数十户。人们在附近土地中耕种时，常常从自家的庄稼地中翻出龟甲或兽骨。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商代遗物，错当成“龙骨”，并以讹传讹多年。甲骨上的文字也曾一度被世间忽视。

骨”，原本可以治病。于是人们纷纷将这些碎骨片收集起来，或留作己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究竟有多少“龙骨”被挖走、卖掉、碾碎、甚至最后被人糊里糊涂地吞进肚里，谁也不清楚。

1899年，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偶患虐疾，差人到北京城内的达仁堂药店购药。购回的药中，有一味即是“龙骨”。



王懿荣是个细心人。他亲自察看买回的各味中药时，发现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一些碎甲片或骨片上竟契刻有符号。王是金石学家，他的古文字知识使他很快意识到这些“符号”的重要性。他一面差人前往达仁堂药店购回更多的“龙骨”，一面开始研究这些“符号”，结果认定这些符号是商代文字。由此，他成为甲骨文的第一位发现者，



王懿荣，山东烟台人。晚清学者。曾官居北京国子监“祭酒”（据说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校长）。他是第一位辨识甲骨文为商王朝遗物的学者，由于他在甲骨收藏方面的贡献，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不仅是第一个收藏甲骨的学者，同时也是当时最大的藏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悲愤自尽。他的收藏后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鹗。这是收录在刘鹗所编中国最早的一部甲骨学著作《铁云藏龟》中的龟甲卜辞，其原藏者就是王懿荣。



“一片甲骨惊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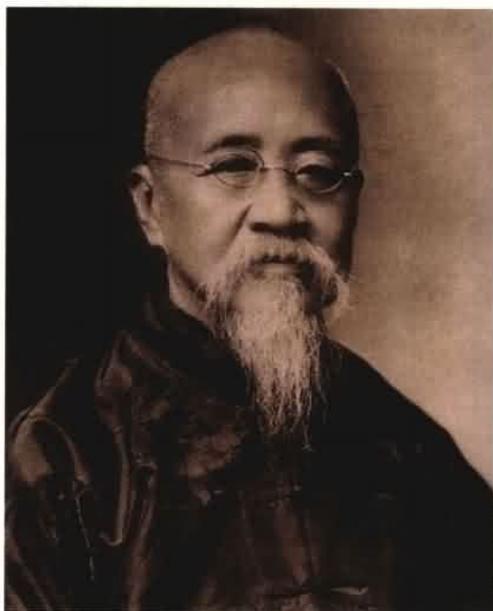
该片卜骨可能是所有殷商卜辞中最著名的一片。它于1973年出土于殷墟小屯村南地。虽然残破，但品相端庄大方，形状甚至有些像甲骨文中的“骨”字写法。其上有甲骨卜辞93个。所记为商王田猎事。国家邮政局为纪念殷墟发掘和甲骨卜辞出土，曾以该件卜骨正式向全球发行纪念邮票。许多学者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常以此片卜骨作为封面。

同时也是第一位甲骨收藏家，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据说与王懿荣差不多同时，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也发现了这种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学者刘鹗、罗振玉、端方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加拿大人明义士、日本人林泰辅等。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





罗振玉：继王懿荣之后的甲骨收藏家。曾任清皇室“南书房行走”。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由他派人访得甲骨卜辞的真正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在殷墟研究的历史上贡献巨大。

第一位发现甲骨文字的学者	王懿荣	1899
第一批重要甲骨收藏家	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美）方法敛、（英）库寿龄、（德）威尔茨、（加）明义士、（日）林泰辅	1899 — 1903
第一部甲骨文著录	刘鹗《铁云藏龟》	1903
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作	孙诒让《契文举例》	1904
第一位查明安阳小屯为甲骨出土地的学者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	1908
第一位从甲骨文中辑出商王世系的学者	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1917

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直到1908年（另说1910年），罗振玉派人细心查访，始知甲骨出土于“滨洹之小屯”。因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是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10余年以后的事。



第一部甲骨文著录。

《铁云藏龟》，刘鹗著。刘鹗，字铁云，也是晚清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

从史影到信史：商王朝是怎样被证明的

甲骨文发现初期，虽然人们初步判断其为商朝文字，但却读不通契刻在甲骨片上的句子。1903年，近代著名小说家刘鹗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田刘鹗字“铁云”，故将其书定名为《铁云藏龟》。他刊行的甲骨大部分是王懿荣的收藏（王死后，刘从其后人手中购得），目的是希望有人对甲骨加以考释，读懂这些古老的“天书”内容。刘鹗以小说《老残游记》名世，而《铁云藏龟》则确立了他在甲骨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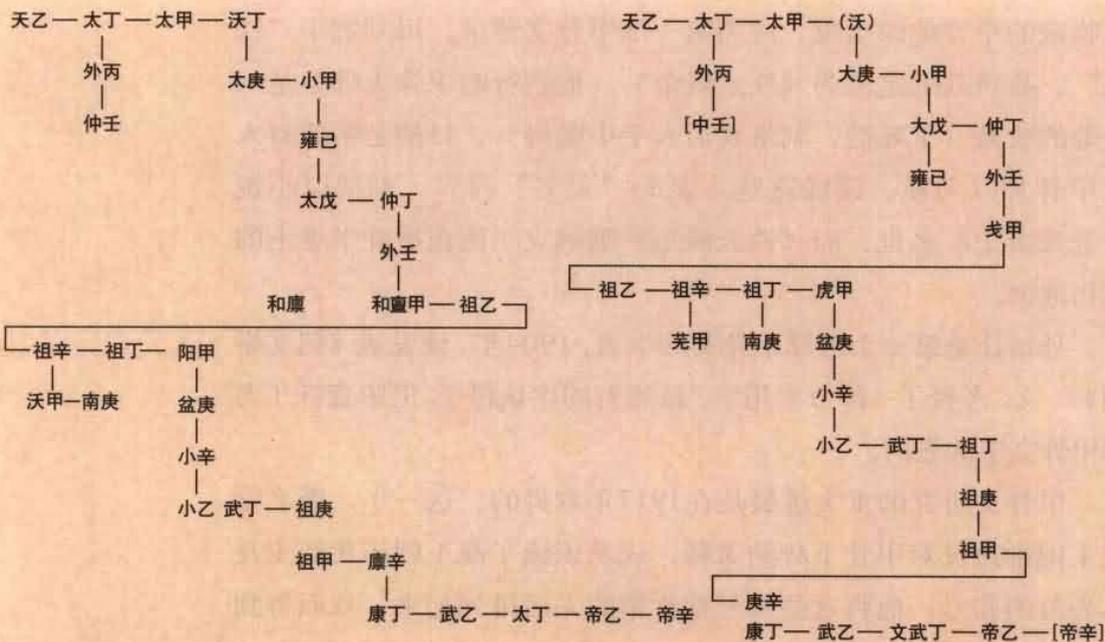
孙诒让是第一个考释甲骨文的学者。1904年，他发表《契文举例》一文，考释了一部分常用字。虽然有的字认错了，但毕竟开了考释甲骨文字的先河。

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进展是在1917年取得的。这一年，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释，成功识读了商王朝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庙号。他将这些庙号按称谓的先后排列起来，从而得到





王国维：字观堂，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师。曾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著名词学家、史学家。所著《观堂集林》享誉学术界。1917年，他发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首次从甲骨卜辞中成功辑出商王朝历代国王的世系，并与《史记·殷本纪》相对照，运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确认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真实性。他与罗振玉共同在甲骨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关二人的甲骨学研究，并称“罗王之学”。



《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王世系和参照甲骨卜辞修订后的商王世系对照表。

一份商王世系表。

令人称奇的是，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获得的这份世系表，与《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朝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惊人地相似。仅个别先公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

王氏的这一发现证明《史记》中有关商王朝的记载绝不是凭空杜撰的，商王朝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

据《史记》记载，西汉名将项羽曾与章邯盟于“北蒙”，按史家注释，这里的“北蒙”即商王盘庚所迁的都邑“殷”所在。另据一部失传已久的古书《竹书纪年》记载（该书虽已失传，但有学者从其他书籍中对该书的“引录”进行辑录，因此书中的部分内容仍可读到），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后，“殷”作为商代都邑存在了273年。

一个消失已久的古老王朝，第一次有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见证。

殷墟的考古发掘

长期萦绕耳畔但却只能将信将疑的商王朝一旦被作为真实的历史存在肯定下来，这个王朝遥远模糊的身影便更具吸引力。社会各界纷纷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商王朝研究的进展。作为商王朝甲骨文出土的安阳殷墟遗址自然万众瞩目。

20世纪20年代初正值西学东渐的高潮，经蔡元培、傅斯年等一批学者的努力，西方考古学知识逐渐传播到中国。至20年代末，学术界发掘殷墟的呼声越来越高。设在南京的中央



董作宾：字彦堂，著名甲骨学家。1928年10月13日，他作为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位代表前往殷墟，领导了殷墟的首次考古发掘。其主要成就在甲骨学领域，著有多种甲骨学著作。最著名的有《殷历谱》。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该所学者董作宾至安阳小屯作实地考察，为正式发掘殷墟作准备。1928年10月，董作宾在安阳拉开了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1929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曾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李济到达安阳，亲自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1930年，梁启超的次子、同样留学美国并受过专门考古发掘训练的梁思永也加盟到殷墟发掘队伍中来。

1928年开始的发掘工作至1937年因日本入侵华北而告一段落。这十年间前后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集中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附近。这15次发掘成果显著，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



李济（左）：湖北钟祥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于1926年与地质学家袁复礼考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

韶文化遗址。后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1929年前往殷墟组织发掘，是殷墟考古发掘的主要领导人。著有《安阳》（英文版，后译中文）、《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考古论著多种。

梁思永（右）：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次子。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1930年主持过山东城子崖考古发掘。1931年参加殷墟田野工作。在殷墟发掘期间，取得两大成就。一是在安阳后冈确认“三叠压”文化堆积现象，首次确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三种文化的地层关系。二是主持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的发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梁思永考古学论文集》。



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掘现场：
小屯村附近的发掘。（历史语言研究所 提供）

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其出土物包括数以万计的陶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获得甲骨24918片。其中1936年发现的编号为YH127的大型甲骨埋藏坑，一次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

殷墟的古代遗存，实际并不仅限于商王朝时期。梁思永先生领导的考古发掘，在洹河南岸一名为“后冈”的村庄附近，发现了明确的“红陶文化”、“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相叠压的现象，后证实这是一种“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三种物质文化在地下的埋藏关系，考古学称为地层叠压关系。后冈发现的这样一种地层关系，后来被称为“后冈三叠压”。它表明殷墟一带除殷商文化堆积外，还有更早的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后冈三叠压的发现，被视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考古钻探。

在考古人员调查地下古代遗迹的种种手段中，有一种被称为“铲探”。所用工具被称为“洛阳铲”。“洛阳铲”曾经是盗墓贼发明的盗墓工具。考古学者将这种工具利用起来，使之在田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洛阳铲是垂直操作，铲头扎入地下后，可从地下深处提取一段半圆形柱状的土样。通过观察土样，即可判断地下是否埋藏有古代遗迹。例如如果土样坚硬而且分层，便很可能是古人的建筑夯土，如果颜色混杂且疏松，则可能是古人的灰坑或墓葬的填土。

1950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启动中断了10余年的殷墟发掘，并在小屯附近设立考古工作站（该站1979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达数十年的田野发掘中，殷墟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截至目前，共清理殷代

房基数百座，灰坑（含窖穴）数千座。确认并发掘了多处晚商时期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作坊5处，制骨作坊至少4处，烧制陶器的陶窑场1处，玉、石器加工场所1处。先后于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发现大型甲骨埋藏坑，进一步丰富了商代的文字资料。此外，还清理殷代墓葬和祭祀坑10000座以上、车马坑近100座，并在30年代发掘大型夯土基址的外围发现大量居民点。各居民点内房基、灰坑密布，还有道路穿行其间。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安阳设立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专门负责殷墟的田野勘探与发掘工作。

1961年，国家遴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毫无悬念入围。

田野发掘。

田野发掘是考古学研究最基础的环节。为了控制地层，考古工作者通常在发掘范围内分割出10米×10米或5米×5米的方格，称为探方。每个探方通常由1名考古队员负责管理。如果探方内发现有古代的房屋、灰坑或墓葬，则各自单独编一个“单位”号。出土文物依“单位”登记。有了探方，复杂的地下古遗迹便成为可有效控制并系统记录的对象。文物也容易找到各自的“家”。





考古地层学。

地层学是考古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原理是：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和遗物，会在地下形成不同的地层或遗迹单位，由于堆积过程中的自然顺序，这些地层或遗迹单位之间便具有相对的年代关系，即被叠压或被打（挖）破的地层堆积或者遗迹单位一定早于叠压或打（挖）破其的单位或者地层。考古学家在田野操作中，最重视的便是这种地层关系，唯恐搞错了地层。因为错误的地层会引起年代关系的混乱，进一步的研究即无从谈起。

照片所示为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获得的一组地层关系：A是3000年前的古地面；B是商族人迁入后所形成的地层（考古学上也称文化层）；C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商族人在既有文化层上夯筑的房基（表明有人直接将房子盖在这一地点），图中可以观察到用黄土夯打的房基面在剖面上是不连续的；M1和M2是两座墓葬的剖面。正是这两座墓葬打破（切入）了房基C并将其连续的夯层分割成三段造成了房基的不连续。

通过细致的地层观察，考古学家可以获得该地点的“遗址形成过程”：这一带原本没有人烟，大约3000年前的某个时候，商族人开始在这一带活动。又过一段时间，商族人在这里建起了房舍。房舍废弃后，这里变成了墓地。其中两座墓葬挖在房基之上。

除了研究地层关系外，考古学家当然还会从这些地层或遗迹单位（房基、墓葬）中收集各种遗物，如碎陶片、木炭、烧土、动植物标本等。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均相信1961年划定的殷墟保护范围基本上就是商代晚期都邑的范围。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考古工作大大改变了“殷墟”的概念。

1997年，中外学者共同在安阳洹河流域展开区域考古调查，该科研计划在进行到第三年时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回报：1999年冬，一座埋藏在地下的规模宏大的商城被钻探出来。

这座新发现的商代城址位于河南安阳市北郊，因地处洹河北岸，被定名为“洹北商城”。城址略呈方形，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遗址有重叠。四周已确认有夯土夯筑的城墙基槽，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2150米。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方向北偏东13°。宫殿宗庙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宫殿区内现已发现数十处夯土基址。其中规模最大的基址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宫殿区的周围分布有大面积的居住址。其中西北部的居住址经过局部揭露，清理出大量房基、水井、窖穴。居民点周围也发现一些墓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是常驻殷墟的考古发掘机构。1958年设立。最初驻王裕口村，1959年迁至小屯。该机构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殷墟范围内的田野考古工作，整理出土文物并出版公布研究报告。



洹北商城的发现改写了传统的“殷墟”概念。城址内发现的遗物、建筑遗迹以及相关地层关系和碳十四年代数据等，表明这是一处年代略早于过去所知的“殷墟”范围内的主要遗迹和遗物的城址。学者们推测这一城址与以小屯为中心的传统殷墟所在，是一前一后的商代都邑。

2006年，新发现的洹北商城与传统的殷墟一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范围。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植物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

商朝逐渐从传说中的史影成为信史。



洹北商城发现之后，传统的殷墟平面图被重新改版。新平面图描绘出商王朝中、晚期两大阶段的文化遗存。略去密集分布的墓地，现已探明的居民点和经过发掘的众多手工业作坊，呈现出3000余年前洹河两岸一派繁荣景象。

叁

三千年山水传奇



殷墟西部胜景。

殷墟西行约20余公里，即见山峦起伏。这里是太行山东麓。

3000年前，商王或许曾带领臣仆在这一带行猎。养育殷商文明的洹河也从这一带发源。（荆志淳 摄）

与几乎所有的重要遗址一样，殷墟也依偎着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这条河流就是洹河。它发源于太行山深处，自西北行，再折向东南，最终注入卫水。

洹河源头附近是发育的石灰岩地貌。刀劈斧削般的峡谷，形象地描绘着什么才是真正的粗犷。从山麓前伸的低丘，犹如太行张开的双臂，将洹河揽在怀中，形成一个箕形盆地。

殷墟，正在盆地的出口，是面向着东部的一望无垠的平原。

今天的洹河河谷，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海拔高度由西部的130米逐渐降至殷墟附近的80米左右。3000年前的商代，这种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更为显著。当时除洹河之外，黄河在

安阳东部自南向北流经，漳河在殷墟以北约20公里处自西向东流经。南部还有淇水。这三条河流再加上洹河，构成安阳地区的主要水系。据甲骨卜辞资料，这些河流均与殷墟地区的商人活动有关。卜辞中，黄河名“河”、漳水名“滴”（shāng）、洹河名“洹”。其中洹河与殷墟关系最为密切。今京广铁路以西洹河段，史前时期以来并无剧烈地貌变化，地面堆积有较厚的早期全新世黄土。但京广铁路以东洹河段，约在东周时期发生过大幅度的河道变迁。有迹象表明，东周以前，包括商代及史前时期在内，洹河出安阳盆地东缘（今京广铁路一线）后，是流向东南的。除河道南北两侧堆积有东西延伸的条带状早期全新世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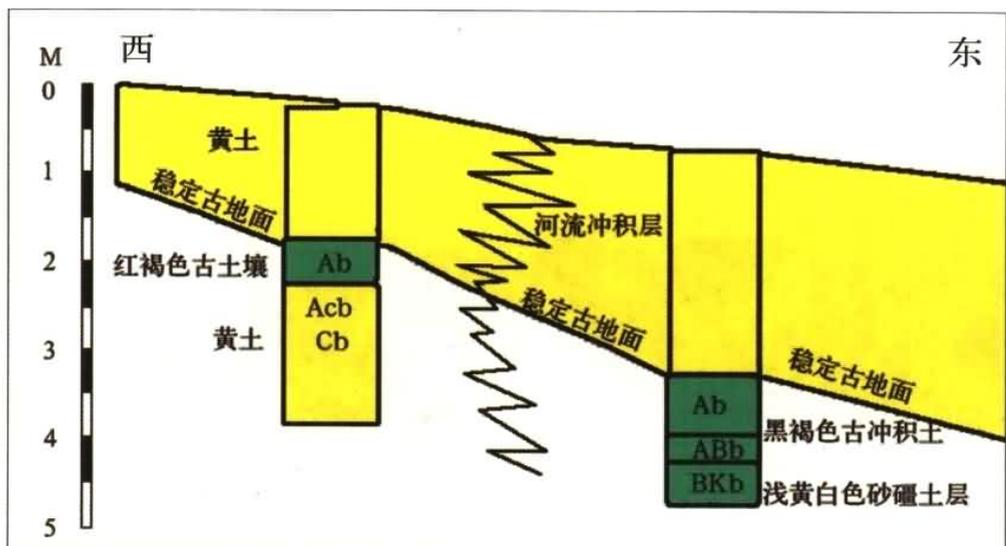
平原沃野。

尽管西行20公里即是太行山余脉，但洹河中下游的地貌却相对平缓。





殷墟坐落在洹河中游的一个箕形盆地的口部，往东是一望无际的豫北平原。



明代安阳地方志《邶乘》以“西北高而东南下”来描述安阳的地势。考古工作者钻探所得的这张安阳地区地层剖面不仅证实了安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并且表明，在3000年前的商代，东南与西北方面的高差更为明显。商代以前的人们，便生活在这样陡缓的古地面上。（荆志淳 绘）

外，其余地段，包括现今洹河所经地区，当时地势较低，地面堆积主要是一种黑色土壤。

殷代安阳地区的气候，与现在相比偏于温暖和湿润。当时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 2°C 左右。一月份气温比现在高 $3-5^{\circ}\text{C}$ 。这一说法的证据来自殷墟出土的大量求雨卜辞、动植物标本，以及记录在土壤中的磁化率信息、植物孢粉及其他信息。

黄土在气候冷干或温暖的影响下，会发生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表现为含超微磁粒多少的变化，即冷干气候下磁粒减少，而温暖气候下磁粒增加。研究者曾从殷墟西部的一处遗址采样进行测试，得到一个距今约5000年至2500年左右的磁化率变化曲线图。显示出商代晚期气候正处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

殷墟的甲骨卜辞中，与卜雨有关者占相当高的比例。很多是卜问下雨会不会酿成灾害。可见当时的雨水总体上是较为丰沛

土是考古人员的重要研究对象。图为科研人员在洹河下游分层取样，以获取有关商代地貌以及气候的信息。考古人员将采集的土样按地层编号，分装成多份，然后进行孢粉分析，同时测定出土样的年代，以了解古代植被。



甲骨文中的占雨卜辞。

商族人认为，降雨是由神灵决定的。向神灵祈求，可预知未来某个时间是否会下雨。左：癸卯卜，今夕雨（癸卯这天占卜，问今天傍晚天是否会下雨）。右：口卯卜，今日雨？不雨？其雨（口卯这天占卜，今天会下雨？不会下雨？）。



的。有时甚至威胁到居民安全。

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也透出或多或少的气候信息。小屯村及与小屯村隔河相对的侯家庄一带，曾多次发现象骨和象牙制品。如1931年小屯发现一件大象的牙床，1934、1935和1978年西北冈王陵区先后三次发现大象骨架。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出猎获象的记录。

辛未王卜，贞田畝往來亡災。王占曰：吉。獲象十，雉十又一。

这是在“辛未”这天，商王亲自卜问外出打猎是不是会遇到灾祸。占卜之后，王观读卜兆发现是吉祥兆。果然，后来打猎收获了10只象、11只雉鸡。

象属热带动物。上述有关象的记载及象骨的考古发现，说明今豫北地区很可能有野象生存。殷墟发现的其他动物骨骼中，还有丰富的哺乳类动物骨骼。牛骨和牛角是殷墟遗址中十分常见的动物标本。近年的抽样鉴定表明其中主要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象。

是黄牛。但水牛似乎与黄牛共存，而且数量很多。古动物学家杨钟键从1937年以前所获资料中，据说辨出水牛1000头以上。这些水牛也可能是野生的，但同样属生长于温暖的水网地带的动物。殷墟遗址中还出土有獐和竹鼠的骨骼标本。獐虽亦见于黄土高原，但更多地生活于沼泽、灌木丛中。竹鼠喜欢竹林，现代以四川最多。因此总的来看，商代安阳地区的环境，颇似今天的长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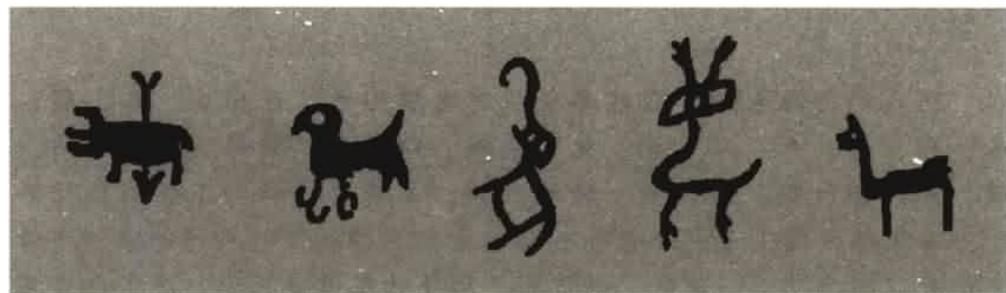
晚商时期殷墟附近的动物，据鉴定可分为三类：一类如肿面猪、麋鹿、獐、鹿、狸、鼠、獾、虎、竹鼠、兔、狐、猴、象等，属“野生而土著之动物”；一类如犬、猪、羊等，当是家畜；另一类有鲸、扭角羚、獾等少



商族人的动物雕刻艺术品甚多，其中也包括一种野生水牛在内。图中所选的玉石雕刻的水牛，或立或卧，憨厚传神。水牛的存在，暗示当时的气候比今天的安阳地区更为温暖湿润。

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中所见野生动物图像。

甲骨文的大量象形字的存在，使得我们今天见到了3000年前的一部分动物形象。包括鹿、马、大象、猪、鸟、龟、鱼等。





商人的玉器表现了自然界数十种禽兽形象，包括虎、象、熊、鹿、猴、马、牛、羊、狗、兔、蝙蝠、鹤、鹰、鸚鵡、鸬鹚、雁、鸽、燕、鹅、鸭、蛙、鱼、螳螂、蝉、蚕等。安静却不失威猛的卧虎、蓄势待发的玉兔、警觉聆听的回头鹿，都包含艺术的创意。甲骨文中“陷鹿”、“获鹿”的记载。历年的殷墟发掘中，鹿角也是常见的出土动物骨骼之一。甚至宫殿宗庙区附近即可能有专门豢养珍奇异兽的场所。宫殿宗庙区附近发现的动物骨骼，物种有褐马鸡、雕、猫头鹰、丹顶鹤。商王朝的贵族似乎很喜欢奇珍异兽。

数几种，应是“自外搬运而来之动物”。前两类，均可视为晚商时期安阳附近的动物种属，它们构成当时当地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殷墟出土的鱼骨也多是产于当地的，如鲤鱼、青鱼、草鱼、黄颡鱼、赤眼鳟等。

安阳以南辉县韩村境内中全新世古沼泽沉积物的孢粉研究，以及殷墟以西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中的孢粉研究为复原古植被提供了线索。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样品中共获得31个类型的孢粉，计乔木11个属，灌木及草本14个科、属，蕨类5个科、属或纲。这一孢粉谱的总体特点是木本花粉居多，草本其次，蕨类孢子植物最少。其中传播距离通常为数公里的栎、榆、椴、胡桃、枫杨等阔叶树花粉，

反映了盆地周围低山丘陵上分布有偶含常绿栎的落叶阔叶林植被。蒿、藜、禾草的花粉属原地播撒花粉，显示的是盆地草原植被的面貌。这些孢粉随着时间而发生类型和数量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木本花粉大约在相当于西周早期阶段明显减少，而喜干凉的蒿、藜等草本科花粉与卷柏孢子的数量增加；或许反映了商代一度温暖适宜的气候在西周时期逐渐转为干凉。辉县韩村中全新世沼泽沉积物中的孢粉所反映的情况与姬家屯遗址类似。此外，姬家屯遗址下伏生土中偶尔会发现今主要分布在中亚热带的山核桃和可分布至北亚热带的常绿栎花粉。

研究者还从殷墟收集到一批植物种子。经鉴定除粟、小麦、黍等农作物种子外，其他有蓼属、莎草属、菟丝子属、藜属等植物种子。此外还发现狗尾草、马齿苋、李属种仁（杏仁或山桃仁）以及其他草本植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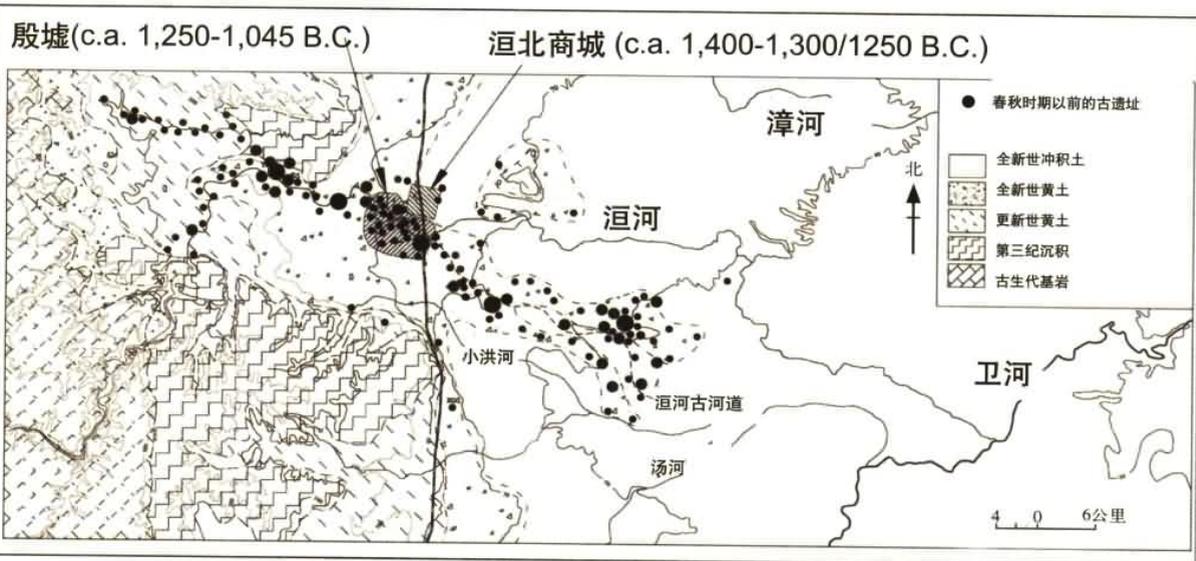
商王朝时期的竹编。1990年从殷墟郭家庄一座编号为M160的墓葬中出土。该墓的墓主人称为“亚址”。在商代，以“亚”冠于名前，表明此人生前曾在商代军队中担任过要职。该竹编或许暗示商代安阳地区曾有竹子生长。



其中莎草属、蓼属等均属产于温带或热带，生长在潮湿的沼泽地、水沟或田间路边的草本植物。商代安阳一带应有竹子出产，1990年在安阳郭家庄一座大型殷墓中发现一只以细竹篾编织的小竹篓的残片；动物群中獐与竹鼠的存在，也可视为商代殷墟附近产竹的佐证。

优越的自然环境，正是3000千年前商朝人演绎迁都传奇的重要原因。

殷墟附近的古地貌与古遗址分布。今天的洹河，在京广线以东向东流去。但商代的洹河，曾经顺从安阳地区的地势由西北流向东南。其时洹河的两岸分布着诸多的商代居民点（所标点的遗址包括部分非商代遗址）。人类的生存对水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荆志淳 绘）





跨时空回溯

种系与族源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玄鸟，通常理解为“黑色的鸟”，又被许多学者解释成燕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说，商族的祖先曾经是鸟的后裔。由于《诗经》并非真正的商代文献，很多人以为“玄鸟生商”是后人附会出来的故事。殊不知，甲骨文常见的描述商朝先公“高祖王亥”的“亥”字，每每顶着一只鸟的图像。

既然“王亥”是商朝人心目中的高祖，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朝人确实相信他们的祖先与鸟有关，甚至商族人就是鸟的传人。



不少人以为《诗经》的成书年代乃在西周以后，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高”这个美丽的传说仅仅是后世人的附会。殊不知甲骨文中，商族先王“高祖王亥”的“亥”字头上却总离不开一只鸟。

看来，其实是商族人自己将其种族起源的命运与“玄鸟”联系起来。图中带阴影部分是“高祖王亥”的“亥”字。

商文明的主人

美丽的神话并不能真正解决商族族源的问题。

商人原本来自什么地方？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黄种人，还是像有人推测的那样，是欧洲大陆过来的白人，抑或与古代高加

索人种有着某种渊源？解答这一问题，需要依靠考古发现的人骨标本。

殷墟出土的人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出自中小型墓葬，另一类出自王陵附近的祭祀坑中。

李济早年曾根据商代人头骨体质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指出祭祀坑中的死者总体上具有现代华北人的同类特征，但由于某些测量值的变异幅度过大，因而也可能包含有异种系的成分。稍后不久，一名美国学者也公布了他对殷墟祭祀坑人骨的看法，他认为其中可能包括现代华北人、蒙古人和欧洲人三种类型。甚至还有学者测量后认为，殷墟祭祀坑中的人骨可划分为5个种族类型，即古典类蒙古种、海洋类黑种、高加索种、爱斯基摩种和暂时无法认定的“小头小脸”类型。这三项研究都倾向于认为殷墟祭祀坑中埋葬的有异种系的民族。

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主张同种系说。美国的一位牙齿人类学家根据牙齿形态特征建立的系统类型与种族的演化关系，认为殷墟祭祀坑人骨的牙齿系统更近于现代华北人的。因而主张他们起源于华北的蒙古人种。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测量和分析了40余具祭祀坑中出土的人头骨数据后也认为这些青铜时代头骨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华北人头骨之间没有重要的差异，因此主张殷墟遗址的中国人应属于蒙古人种。一些中国学者分别根据殷墟祭祀坑头骨的颅顶间骨出现情况、头骨脑容量大小测定及铲形门齿出现频率的调查，也倾向于同种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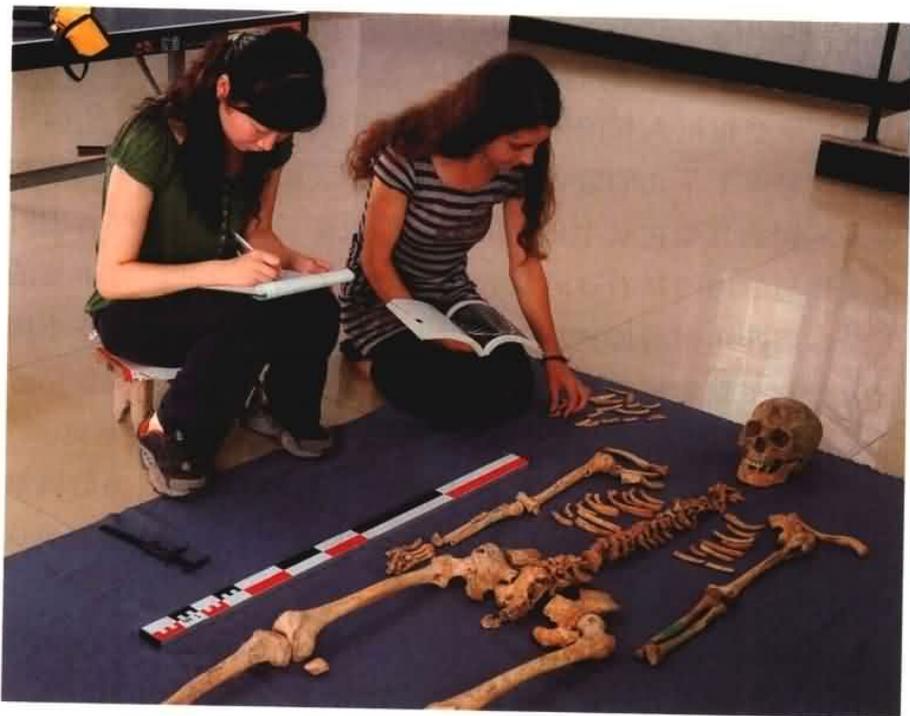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于同意同种系说。即认为殷墟祭祀坑头骨可能包含着同属蒙古种支系下的东亚、北亚和南亚类成分，而以东亚类的成分占多数。

杀殉在祭祀坑中的人骨，可能是商王朝从周边地区掠来的平民或战场上虏获的战俘，不能代表真正的商人种系。研究商人种系的最好材料莫过于殷墟王陵大墓主人的遗骸，因为他们是商王朝的国王。遗憾的是，没有这样的人骨标本。不过，殷墟发现的



大量中小型墓葬中的人骨对判定商人种族属性及其来源同样是有意义的。

据对中小墓人骨测量特征的统计学分析，其形态变异大体上没有明显超出同种系水平。如果与现代亚洲不同地域蒙古种类型比较，中小墓头骨的一般特点与东亚的种族类群更接近。中小墓也有一部分头骨具有某些与蒙古人种北亚类群相近似的混合特征，如很宽的面，较低的脑颅等。有学者观察到这批人骨往往都伴出较多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因此推测他们可能代表商代王族的种族形态。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事实上，殷墟发掘的墓葬基本上出自家族墓地。只要是同一墓地中的墓葬，其随葬



考古工作者在测量研究殷墟人骨。

谁是甲骨文的主义？最直接的材料便是考古发掘出的商代人骨架。虽然死去的商人不再说话，但科研人员通过体质测量、观察、同位素分析，仍然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大量的信息。比如他们的种族年龄、性别、病理和饮食。



小型玉人。

小型商墓中出土的人形玉雕，同样传递了商族人种的许多信息。

所有商人制作的具有人体特征的面具或其他人形艺术品，皆可以视为商族人对自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描述。来自这些艺术品的直观特征，表明商族人属于蒙古人种。用专业术语来说，是蒙古人种东亚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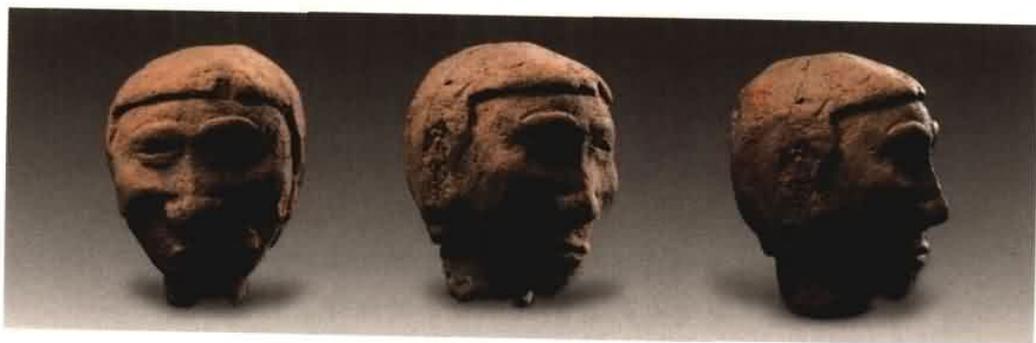
品的多寡与人种无关而由墓主人的地位或其控制的财富所决定。同一墓地中随葬品少的平民墓与高级贵族墓其实同为商族成员。不大可能出现同一“族墓地”中富者是北亚类型，另一部分是东亚类型的情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学术界开始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研究商人的种系问题。研究者通过提取殷墟人骨上的古DNA片段，来考察人种的归属。这项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





青铜人面像。殷墟王陵区M1004号大墓中出土的青铜面具概括了许多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斜缓的前额、扁平的面部、高高的颧骨、低宽的鼻梁。类似的商代人像造型在殷墟已经多次出土。



这枚核桃般大小的陶塑人头，2003年出自殷墟的一处考古工地。他似乎在说：你好！我是商朝人“子商”。你看我，发丝齐整，五官端正。模样还不错吧。额头宽平、浓眉、深目，面颊突出，鼻宽凸起，嘴唇饱满，这可是那个时代男子的标准相貌啊！2003年我第一次来到你们的世界，是考古学家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叫孝民屯的村庄发现了我，当时我已经在地下沉睡3000余年了。听说在我之前，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到你们这里来过，不知道现在他们藏到哪里去了。我还依稀记得他们的模样呢。

虽然是关于人种的研究，但除体质人类学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如物质产品的研究)同样可以提供“鉴别”人种的信息。70余年的殷墟发掘所积累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应该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商人的生产、生活和习俗。例如甲骨文就是一个典型的独立

的文字系统。尽管从一些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文化与周边邻近地区的交流，但其主体是一种具有浓厚中原史前文化根基的独立发展的文化。内中几乎没有欧洲文化或非洲文化的影子。殷墟遗址中曾出土数十件雕有当时人像的石质或玉质圆雕以及陶塑作品。部分铜器上有时也可见到半浮雕的人面或头像。所有这些直观的人物形象，均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形象。与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结果完全一致。这些人形或人像作品，无疑是商族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身形象的描绘。他们所反映的体质特征，应该代表了真正的商族人。因此商族人的确应该是同种系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不可能是其他人种，尤其不可能是欧洲人或非洲人。

商人用于束发的骨簪千姿百态。

商人不分男女都束发，故而留下了大量的骨质发簪，又称发笄。在考古发掘现场，发簪多见于居址。如果墓葬中见有发簪，通常位于死者头颅后部。这正是商族人使用发簪的反映。发簪样式也随着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变化。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商人立国前其祖先曾在哪一带活动，即“商族发源地”问题。

通过考证各种文献，目前已将“商族发源地”限定在两个地区：豫东或豫北冀南。

基于豫东地区的大量田野调查，人们发现在商代立国以前，甚至立国后一段较长时间内，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商文化明显不同，或者说看不到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与后来的商文化之间有传承关系。因此商族发源于豫东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曾采用“假设—验证”的办法，以假定商族发源于豫东为前提，在河南东部的商丘、虞城、柘（zhé）城等地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和发掘，结果同样发现该假定无从证实。

豫北冀南地区作为商族发源地的另一个可能地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愈来愈多的考古材料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北磁县下七垣、邢台葛家庄和河南安阳梅园庄等地点出土的一批遗迹

和遗物。以这批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与包括殷墟在内的商王朝诸都邑中发现的遗存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此有学者直接将其命名为“先商文化”。

如果商族起源于豫北冀南地区的说法能够成立，则商人创造商王朝历史的过程或可简单描述如下：商人各部族原居住在太行山以东今冀南豫北地区。约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人南下消灭夏王朝（部分学者认为夏王朝的存在尚需考古资料进一步认定），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商王朝早期曾将都邑设在今河南郑州或者伊洛河流域的偃师附近，历经近100余年的稳定和扩张后，商王朝可



项上风景。

商朝人的爱美之心与今天无异。这串管饰发现于1975年的一座中型墓中，是死者生前饰品。



商族人立国之前，曾在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活动。这一带发现过一批考古遗存，其典型遗址以河北磁县下七垣为代表，被称之为“下七垣文化”。下七垣文化的主体可能是商族人立国之前的遗存。这批陶器以带颈的肥袋足陶鬲 (lì)、口部有绳切纹的深腹罐以及鼓腹的平底盆、浅腹平底盆为代表。一些学者径直将“下七垣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能步入一个内乱比较频繁的时期，多次迁都。公元前1300年前后，商王盘庚将都邑迁徙到安阳殷墟一带，从此政局重新走向稳定。殷墟作为商王朝最后一个都邑延续250年以上（据古代文献《竹书纪年》记载为273年），直到公元前1046年前后为西周攻陷。

研究人的来源，除去古代人骨的体质测量和提取遗传基因的办法外，还有一种普遍受到考古学家欢迎的技术。这种技术被称为锶同位素法。

锶同位素法的原理，基于人体与生长环境的关系。人在其生长过程中，需要从环境（特别是水）中吸收各种元素并将其保存在体内。这些被吸收的元素中就包括锶。人的牙齿外表有一层珐琅质。有趣的是，每个人在其青少年时吸收在牙齿珐琅质内的锶同位素不易变化。假定某人成年后移居他处，并在他处生活相当一段时间，他体内其他骨骼内的锶同位素水平可能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但其牙齿珐琅质内的锶同位素水平仍然基本维持不变。换句话说，他的牙齿珐琅质中的锶同位素水平，“记录”着他少年时代的环境。因此，采取古代人骨上的牙齿标本（通常取下颌后部槽牙），可以测试出死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古代人骨资料的不断丰富，在探讨商族人起源这一问题上，锶同位素技术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商族人的身高与寿命

殷墟的田野发掘现场，每当有古墓清理，总能吸引众多的人驻足观看。观看静静地躺在腐烂的棺椁中的商人骨架，许多人啧啧赞叹：古代的人身材高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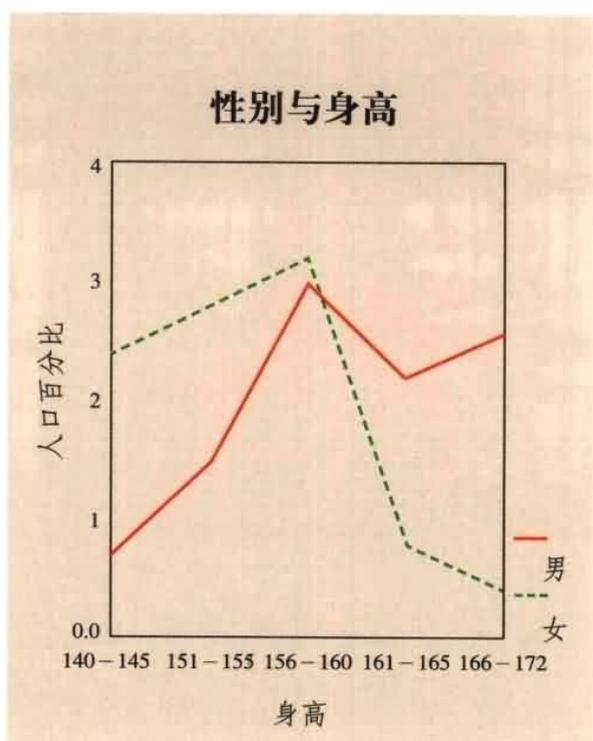
三国的吕布、关云长，均身長丈外。难道古人果真比今天的人高吗？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觉。我国战国秦汉及其以前，一尺的长度短于今天的一尺。古时的一丈，远不如今天的十尺。商代墓葬中的人骨架看起来高大，其实是死者尸骨腐烂后伸开的脚掌骨

和趾骨影响了我们的视觉。根据历年发掘的资料统计，埋藏于殷墟各基地的殷人平均身高实际上矮于现代中国华北地区的男女平均高度。

商族人的寿命是否很长呢？商族人的平均寿命可以通过殷墟人骨的死亡年龄作出估计。体质人类学家曾对殷墟出土的172具人骨作出鉴定，结果发现：包括未成年个体在内的男性平均年龄

身高 (厘米)	性别		总计
	男	女	
140-144	1	4	5
145-149	1	3	4
150-154	3	3	6
155-159	6	8	14
160-164	8	5	13
165-169	4	2	6
170-175	4	0	4
总计	27	25	52



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误解，即很多人认为古人比今天的人长得高。这是由于古代的一尺比今天的一尺要短得多的缘故。例如战国至汉代的一尺仅相当于今天的23厘米。“身長八尺”也不足1.85米。研究者通过统计，得出了商代男女的平均身高。其中女性身高多在1.64米以下，以1.55-1.59米为峰值。男性身高虽然不乏1.65米甚至1.70米以上者，但多数在1.55-1.65米之间。



是33.2岁，女性为29.4岁，男女合计，大约有83%死于青年、壮年到中年期（14—55岁）。其中超过半数死于壮年到中年期（约24—55岁）。死于青年期（约14—23岁）的比例也相当高，约占21.2%。而且，女性死于青年期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死于老年期（约大于55岁）的则很少。如以成年个体统计，男性平均死亡年龄约34.8岁，女性为30.3岁，两者相差约4.5岁。与史前时期比较，商代平民人口的低寿命状况并无明显改观。依旧没有逃脱“高出生、高死亡、低寿命”的命运。

伍

国家与社会

商族人组建了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地下考古资料透出的种种信息表明，商王朝的横向组织系以血亲为纽带，以氏族或其分支为基本单元，纵向结构则阶级分化明显，表现出多层社会等级。其国家机器以商王为核心，运转的是一套有效的官僚体制。这是一个以血亲关系为经、等级关系为纬、具有多个层级管理体制的社会。

社会组织中的宗族结构

商王朝本质上是一个宗族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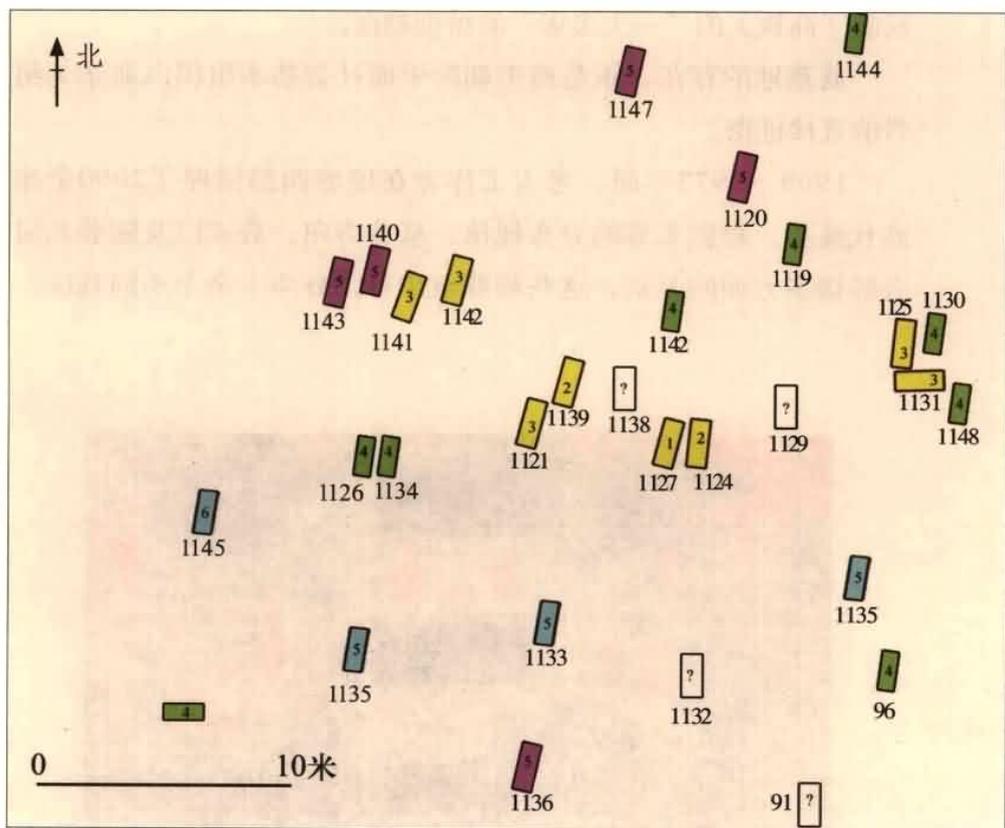
《左传·定公四年》提到周初分封时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上述文献中的“氏”即是“氏族”。如果《左传》记载属实的话，所谓“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即是说商王朝的民众是以“族”作为水平分野的。

商人的这种族的结构，得到考古资料证实。

1928年以来，殷墟范围内已经发掘墓地数十个。这些墓地有独立空间，表现出“成群分布”的特点。仔细观察，每个墓地中的墓葬又集聚为大小不同的小群，而每小群墓葬几乎都可以发现一些左右并列的成对出现的“对子墓”。

“对子墓”不仅空间上并排接近，而且墓葬的形制、规模往往差不多，下葬的时间虽有先后，但相差也不会太过久远，甚至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也显示出密切的关系。据鉴定，“对子墓”中的死者，大多是一男一女。故有理由相信这些“对子墓”中的死者极大可能是亡故的夫妻。因此每一小群墓葬，可以看成是某一个家庭的墓地。如果只有一组“对子墓”，则系小家庭，如果包含多组“对子墓”，则可能是一个复合家庭或大家庭的墓地。而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墓地，应该是某“族”或其分支的墓地，考古学家将其省称为“族墓地”。商代墓地中有时也可见多墓并列或呈“品”字型结构的三墓并列结构。这类结构比例不大，可能



发掘殷墟范围内的商代墓地，常常见一些成对分布的墓葬。这些墓葬空间上并排分布，形制、规模差不多，下葬的时间虽有先后，但相差也不会太久，甚至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也基本一致。学者们将这些墓称为“对子墓”。据鉴定，“对子墓”中的死者，大多是一男一女。他们生前可能是夫妻。对子墓往往出现在一些小的墓群中。因此每一小群墓葬可以看成是某一个家庭的墓地。如果只有一组“对子墓”，则系小家庭，如果包含多组“对子墓”，则可能是一个复合家庭或大家庭的墓地。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墓地，应是某“族”或其分支的墓地，省称为“族墓地”。（图中各墓所标注的阿拉伯数字是通过随葬品排列出的墓葬下葬次序。数字越小，下葬时间相对越早，反之越晚。）



反映了商族人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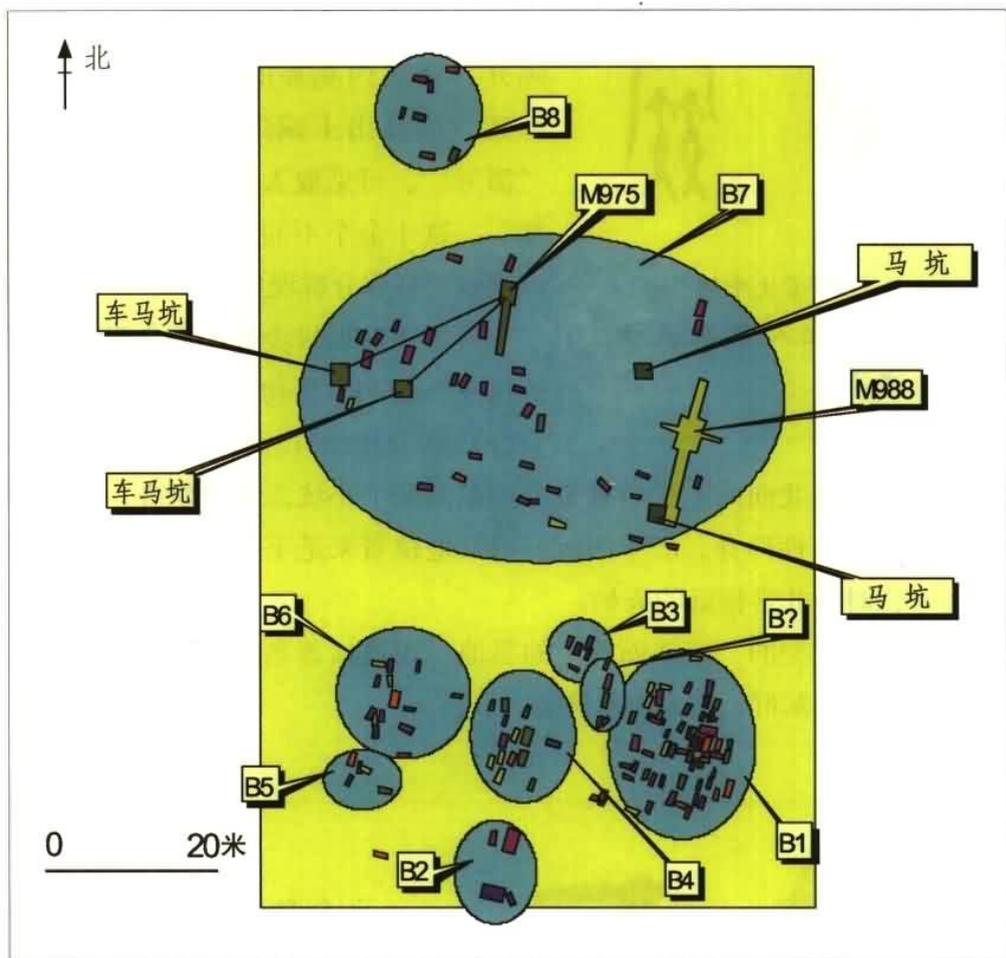
族墓地的存在，正是商王朝的平面社会基本组织以血亲为纽带的直接证据。

1969—1977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部清理了2000余座商代墓葬。根据墓葬的分布规律、墓葬方向、葬式以及随葬品组合等诸多方面的差别，这些墓葬至少可以分为十余个不同墓区。



上：2004年考古人员在殷墟发掘一处商族人家庭墓地。可见一组“多墓并列”埋葬的现象。

下：2006年考古人员在殷墟清理一处商族人家庭墓地。



聚族而葬。

殷墟墓葬具有“成片分布”的特点。这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单元的反映。图中B表示以家庭为单位由几代人形成的墓地。

若干家庭为基础的墓地又组成一个更大的单元，而且每个这样的大单元都有带墓道的大墓。这些大的单元，便是族一级的墓地。1999年发掘揭露的殷墟刘家庄北商代墓地中，成片分布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些成片分布的小群墓地是大、小不同的各个家庭逐年形成的。他们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墓地，这便是族一级墓地。反映了商族人聚族而葬的特点。





甲骨文中的“族”字，指人聚在旌旗之下。

各个墓区占据的茔地与其他墓区相对隔开，墓区内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基本一致，而且出土铜器上往往具有相同“徽号”。可见殷人死后确系“聚族而葬”。这十余个不同墓区或墓地，都可以观察到墓葬分群现象。

殷墟还发现极少数的同穴男女合葬的例子。1970年代初曾发现一座同穴男女合葬墓 (M2686)，该墓墓底的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土梁将墓室分成东西两个小坑。男性俯身，埋于东坑；女性仰身，埋于西坑。男女地位看来是平等的，应是一对死亡时间非常接近的夫妇。

典型的“聚族而葬”的墓地，还包括著名的殷墟后冈墓群、郭家庄墓群、刘家庄墓群等。



出自殷墟墓葬中的青铜器，时常可以见到一些难以识读的符号，他们是铜器铭文中的一大类，古文字学家曾经称之为“文字画”。据多年考证，这些符号原本是商代一些氏族的“族徽”。这也反映了商代社会以“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重要特征。



“旗”字和“旃” (zhān)。

商王朝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等级社会。

这种严格的社会组织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其中之一便是旗帜。在同一旗帜下，可以是“族”，或者其他社会单元。

社会成员的贵贱等级

同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这一点上没有贵贱之分，但宗族结构中的成员本身则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等级。

卜辞中的“王族”，是商代宗族社会中地位最高者。“王族”以下是“子族”，亦即王的同姓宗族。再往下是异姓亲族，即与“王族”或“子族”有姻亲关系者。最底层的是其他臣服于商王朝的异姓族。

这种等级关系，不仅可以验之于甲骨文，还可以验之于考古材料。普通“族邑”中的“族宗庙”与商王宗庙相比，差异明显。商王的宗庙处于殷墟宫庙区中心，普通的族宗庙位于普通邑聚。商王宗庙规模宏大，普通的族宗庙相对较小。商王宗庙举行的祭祀活动远较族宗庙隆重，因此王族宗庙前留下大量祭祀坑，其中有人坑、兽坑和车马坑。普通宗庙除基址中发现有奠基坑外，基址前通常没有成片祭祀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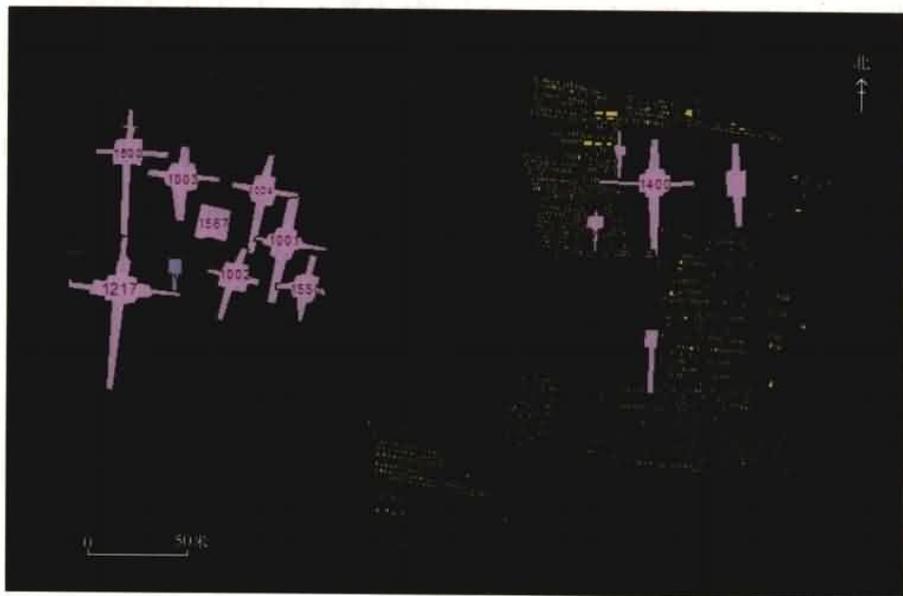
等级差别还反映在同宗族内的不同分族之间或同一分族内的不同家族中。

在殷墟后冈，带墓道的墓葬主要集中于后冈冈顶的西南部，其附近的竖穴土坑墓面积也相对较大。而分布在该批墓葬以东及以南的其他成组的墓地中，墓葬面积明显较小，体现了同族中不同家族间的等级关系。

宗族结构是一个动态结构。新老家庭的更替，家族的裂变分解，导致宗族结构不断变化。大量见于甲骨文中的所谓“子族”，是指部分未继承王位的亲子从父王的王族中分出后自己建立的。

社会成员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阶级。商代社会中的阶级，生动地反映在埋藏习俗中。而集中体现阶级差别的常常是墓葬的形状、大小、随葬品的数量以及墓葬中是否有殉人。





殷墟王陵鸟瞰。

殷墟王陵区埋藏着至少9位商王。这是中国迄今能够完全证实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王陵。尽管历史上这些陵墓全遭盗扰、随葬品多已失窃，但他们巨大的体量，不由得让来访者赞叹：他们是倒扣在地下的金字塔。

殷墟发现的墓葬中，至少有9座是属于商王的。这些墓葬埋在殷墟附近地势最高的洹河北岸的“西北冈”，独自形成专门的“王陵区”。其中8座墓葬都是带有4条墓道的大墓。另1座墓葬据推测本来也应该有4条墓道。该墓可能是“亡国之君”商纣王的墓，殷都被攻陷后，纣王自焚，他的墓葬也就没有完成，仅留下



生前为自己开凿的墓室。

9座王陵在历史上全部被盗墓者洗劫过。然而从劫余遗物中仍可看出原来都埋藏着极为丰富的随葬品。除未完成的一座外，所有王陵都伴埋有大量殉人，有的还有陪葬墓。殉人通常被埋在墓穴内或墓道中。其中一座王陵，数十个人头整齐地“排列”在墓葬的南墓道中。残忍之态，赫然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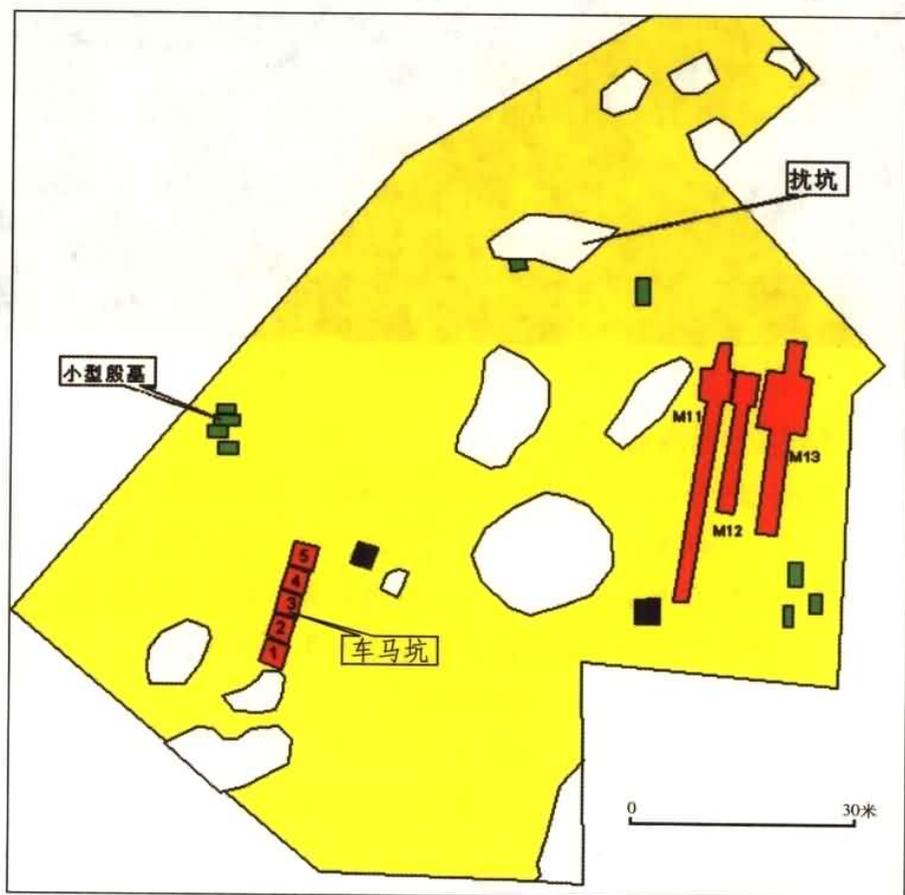
商王的配偶被称为“妣”（bì）。某些地位显赫的“妣”以及在商王朝担任过重要职位的重臣死后，也被埋入带墓道的大墓中。不过，他们的墓葬最多只能有2条墓道，墓室相对略小。这种墓也有众多的殉人，随葬品很丰富。

商王朝社会组织中的“族”皆有“族长”，甲骨文中称为“尹”。“族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死后，常常埋入带1条墓道的墓葬中。墓内也有较多的随葬品和殉人。

与“族长”们地位相近的是一些被埋在大型长方形墓室中的墓主人。这种墓葬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或者更大一些。死者包括立过重要战功的将领，有时也包括商王的重臣甚至有过较高地位的女性，如“妣”（bì）。著名的妇好（商王武丁的“妣”）和将军“亚止”的墓就是这种墓。

普通的商代贵族和一般的富有阶层死后也以长方形墓室埋藏。这类墓葬面积在3—10平方米之间，没有墓道。墓中常以青铜礼器随葬，少数有殉人。





殷墟发现的大墓，特别是一些带两条墓道或一条墓道的大墓，如果分布在王陵区之外，通常都是商王朝某些“族尹”（族长）及其配偶的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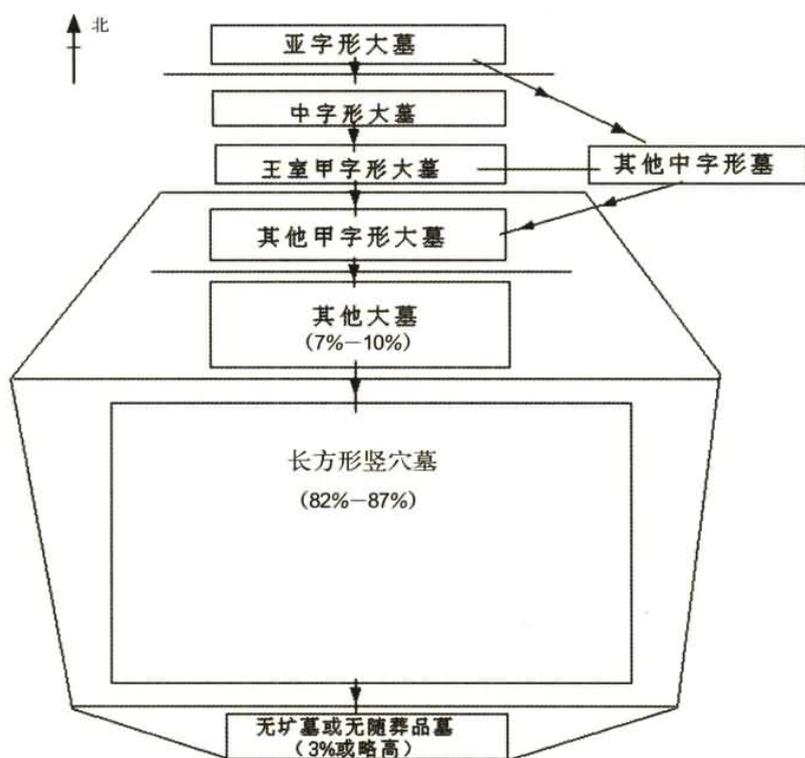
族长们的墓葬不仅体量硕大，而且附近往往有车马坑墓葬。

图中东北部的三座大墓应系商代的族长及其配偶的墓（均已被盗）。西南部的6个小方坑是他们的陪葬车马坑，坑内保存了完整的马车。

商代社会中的平民约占全部社会成员的80%以上。甲骨文中称之为“众”或“众人”。他们大都埋在面积在3平方米以下的长方形墓坑中。通常用单棺落葬，没有槨，极少见殉人。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少数随葬有兵器，偶可见觚（gū）、爵等铜礼器。

平民以下可能还有一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他们死后一般被随意挖坑埋葬。既无棺槨，也无随葬品。这种墓在殷墟墓葬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说明奴隶并不构成商代的主要社会基础。

商代社会的等级制度，还强烈地反映在不同的族墓地之间。



商王朝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处在社会最高等级的是商王及其王室重臣。社会地位仅次于王室成员者，是占总人口7%—10%的中、小贵族。然而，商代社会的基本力量是平民。他们以族为单位生活，死后葬入同一墓地。他们死后用单棺葬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通常随葬少量陶器。统计这些墓葬，可了解他们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大体是占总人口的82%—87%。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一批以无墓圻、无随葬品的死者。他们约占人口总数的3%或略强。





甲骨卜辞及甲骨文中的“众”字：商人称其平民为“众”。

普通的殷墟族墓地，只有为数不多的带一条墓道的墓葬存在，有的族墓地甚至没有带墓道的墓葬。后冈墓地先后发现带两条墓道的墓葬5座，带一条墓道的墓葬1座。表明后冈一区族墓地所代表的商族，地位明显高于一般族墓地所代表的商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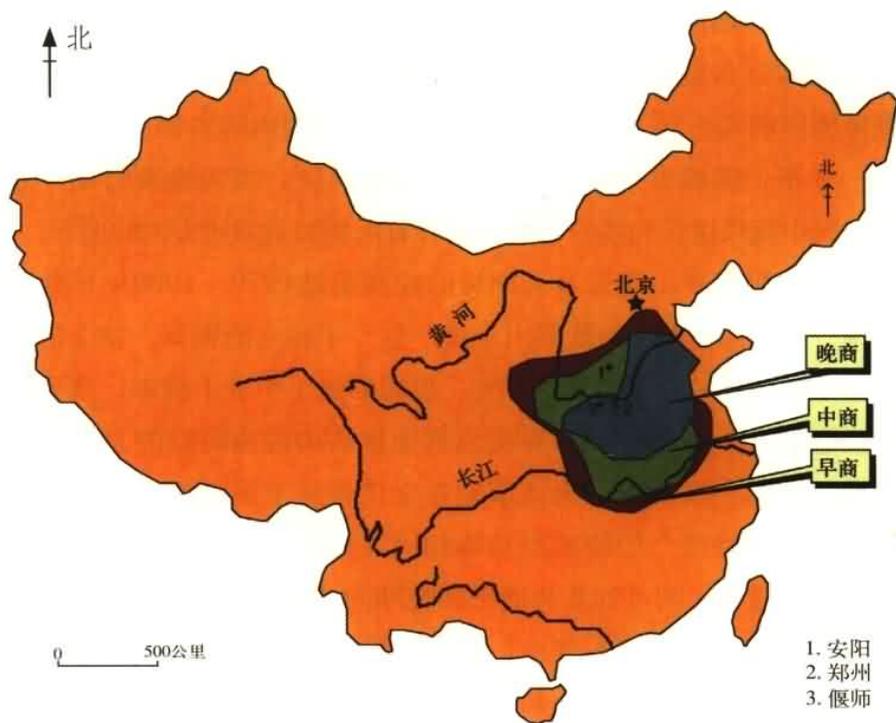
商王既是王族的总族长，也是亲族的总族长，同时还是殷墟类型以外其他晚商文化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共主，商王拥有行政、司法、军队、刑罚等至高无上的权力。

外服内服与官僚体制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商王朝的控制范围，只能从商文化遗存的分布入手，但这一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疆域常常可以超越文化分布。有时有的地方并不属于商文化分布区，而该地政治上却已归附于商。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很可能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疆域”。按目前的认识水平，只能从总体上将文化分布的进退变迁与政治势力的消长作同步理解。

殷墟时期，商王朝在南部两湖境内及关中西部地区失势，可能表明商人在该地区丧失了成片的疆土。东部地区（主要是山东境内），商王朝的政治影响有所加强，继续保持着进取势头。或对疆土有局部开拓。从甲骨卜辞反映的情况看，晚商时期，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为保存东部的疆土，曾连续用兵于东方，与东夷、淮夷发生武装冲突。

殷墟及其周围地区是商文化的核心地域，周边地区商文化的发展步调基本取决于殷墟类型的发展变化。这一以殷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应是商代国家结构“内服外服制”的反映。即商王朝的疆域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商王朝直接控制、被称为“内服”的王畿(jī)区和王畿以外由诸侯和众多方国组成的“外服”区。



商王朝曾经控制的地域范围。

根据物质文化分布情况来观察一个王朝的控制地域有一定难度。很多情况下，物质文化分布与政治控制地带不会重合。然而这种方法有助于判断某支考古文化的影响所及。“商文化”便是以商代各时期诸都邑物质文化为基本内涵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虽未必与商王朝实际统治地域重合，但差别也不至于很大。假定商王朝控制的范围与上图大体一致或相去不远，则商

据周初文献，武王伐纣之后，曾于原商代王畿区设“三监”管理。故周初“三监”的地望，当反映商代后期王畿的范围。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地为三国，诗邶（bèi）、庸、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三监具体地望，学术界虽有不同见解，但所论皆不出今河北中南部，河南大部，以



及山东局部地区。这一范围，基本与考古学所确认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分布地域相一致。因此殷墟类型所反映的是商代晚期王畿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即所谓“内服”范围内的实物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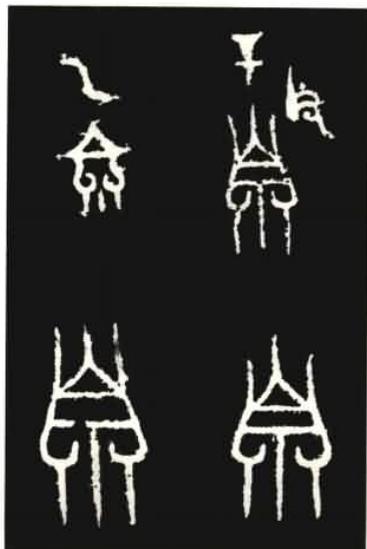
分布于殷墟类型以外的晚商文化诸类型，当为晚商时期“外服”区中商代诸侯和部分与商王朝有着臣属关系的诸方国的遗存。

位于河南罗山蟒张乡天湖村的晚商墓地1979—1980年曾数次发掘。墓地约有41%的墓葬出土带“息”字铭文的铜器。在全部所得铜器中，铭“息”者竟达65%。殷墟的武丁甲骨卜辞中，曾见有涉及息族者。因此，学术界将该墓地推认为殷商时期的息国贵族墓地。从出土器物看，天湖墓地在文化性质上属晚商文化的一个类型，文化特征与殷墟类型总体相同又略有区别。既知其为封国或者方国遗存，则可知其为商王朝晚期的“外服”部分。

商王朝国土的基本部分，即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始终未发生变化。但王畿以外的疆土却表现出较大的变化。中商晚期开始显现的商文化“地方化”趋势，或许反映了商王朝“外服”诸侯或方国脱离商王谋求自主的历史背景。

商王以下，是由内服官员和外服官员组成的官僚系统。

商代的内外服制度，西周王室文献曾有记载，如《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



河南罗山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息”字铭文。

从地理上看，河南罗山天湖商代墓地距商王朝的都邑并不远。以商代晚期商王朝的文化影响力度而言，天湖墓地恰处在商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墓地中发现一批遗族墓，墓中所出铜器中，多见同一个字。学者们大都认为是“息”字。同时认为罗山一带，正是与商王朝相距不远的方国“息”国所在地。

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西周王朝时期的青铜器“大盂鼎”铭文记载，康王谓：“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田（甸）……”这里的“边、侯、田”即指商王朝“外服”地区。

内服官员，即直接在商王身边效命的官吏。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即是带2条或1条墓道的殷墟墓葬的墓主人。或者还包括一部分大型长方形墓的墓主，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伊尹、仲虺（huī）、伊陟、傅说（yuè）等总领国家政务的官员。甲骨卜辞和一部分青铜器铭文中，也提到一些内服官员的职位：如亚牧、“多工”，以及一部分自称为“臣”的官员。

殷墟历年发现的墓葬中，有一部分墓葬出土带“亚X”的青铜礼器，而且伴出大量青铜兵器。如郭家庄M160号墓，不少铜器都铸“亚址”铭文。墓中出土铜兵器达200余件。可知墓主生前确为一名商代重要武官。

晚商时期还有一类被称为宰或寝的宫廷内务官员。1980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M539号墓出土的铜器中有“寝出”铭文，有棺有槨，还有殉人。随葬青铜器86件，其中礼器14件。可见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系在小屯宫殿区内负责商王或诸妇起居的官员。

商代的外服官员，即“大盂鼎”铭文说的“殷边侯田（甸）”。他们是王畿以外地区的诸侯或臣属方国的首领。考古资料所证实的殷代外服方国遗址有息国、薄姑氏、崇国、丙国、薛国、孤竹国等。

据统计，目前所知卜辞中称侯者35位、称伯者40位、称子者185位、称男者近10位。商代诸侯一部分是由王族子弟或功臣受封而成，如卜辞中的子郑、子宋、子商、禽子、唐子、盟子；一部分为臣服于商的异姓方国，如犬侯、周侯、攸侯、侯虎、杞侯、止伯、而伯等。

商王可随时命令诸侯从事某项活动，可以直接向他们索取各种物品，也可以在诸侯国内从事经济、军事活动。

商王朝的国家运行机制，兼具行政和宗族两方面的特点，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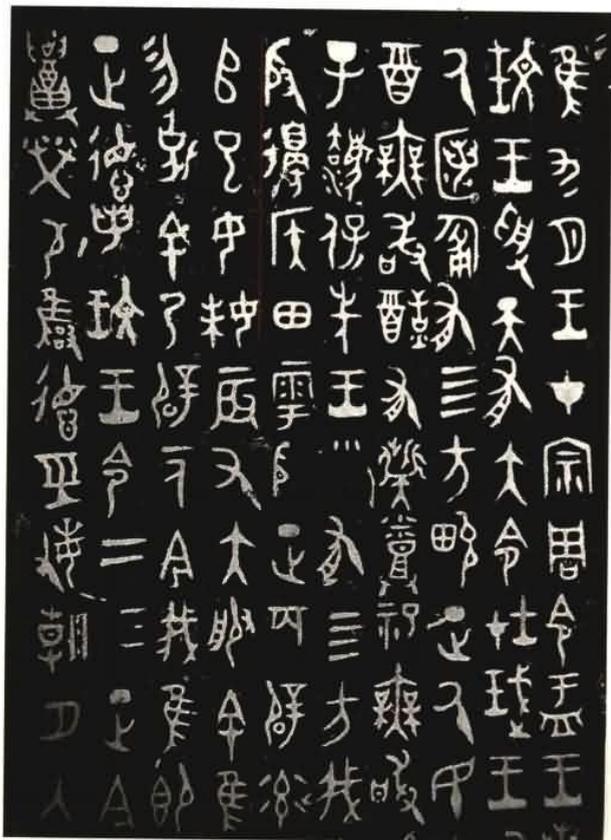


者常常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商王的政令，可能需要通过宗族系统方可最后实施，例如商王征集军队，是以族为基础的。所以晚商各族墓地中，男子墓常常随葬兵器，可能与他们生前曾作为战士出征有关。

礼是商王用以治国的另一种工具。礼的运用，一方面在宗族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强化等级制度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复杂繁琐的祭祀仪式。商人死后，不仅落葬时伴有一系列复杂的祭仪，而且在族邑中还设有平时祭祀祖先的宗庙。在宗庙中举行祭祖活动，在晚商社会中不仅十分频繁，而且相当隆重。因此，宗庙在商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宗庙是宗族关系的象征，因此它又是凝聚各族，进而维系商王朝统治的一个核心设施。

“大孟鼎”铭文。

我闻殷坠命，惟
殷边侯田（甸）……其
“侯田（甸）……”与
《尚书·酒诰》：“越
在外服，侯甸男卫邦
伯……”所载相映证，
表明商王朝确有内服、
外服之别。





家在洹上

农业与定居生活

农业是商代特别是殷墟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决定了殷人的村落式定居模式。

按照考古学家的研究，如果不考虑洹北商城阶段的文化遗存，殷墟文化可分为早晚四个阶段，分别称之为殷墟第一、二、三、四期每一期大概相当于数十年。洹北商城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故洹北商城阶段的遗存被划定在“中商”时期，即商代中期，又细分为洹北商城一期和洹北商城二期。相对而言，殷墟文化各阶段有更多的居民点被发掘过。各居址内部的结构也更为清楚。

商人称居民点为“邑”。由于当时的“邑”是按宗族关系形成的，考古学家喜欢将他们的“邑”，也即村落称之为“族邑”。至于作为商王朝王都的殷墟，商人自称为“大邑商”。“大邑商”实际上由诸多的小型族邑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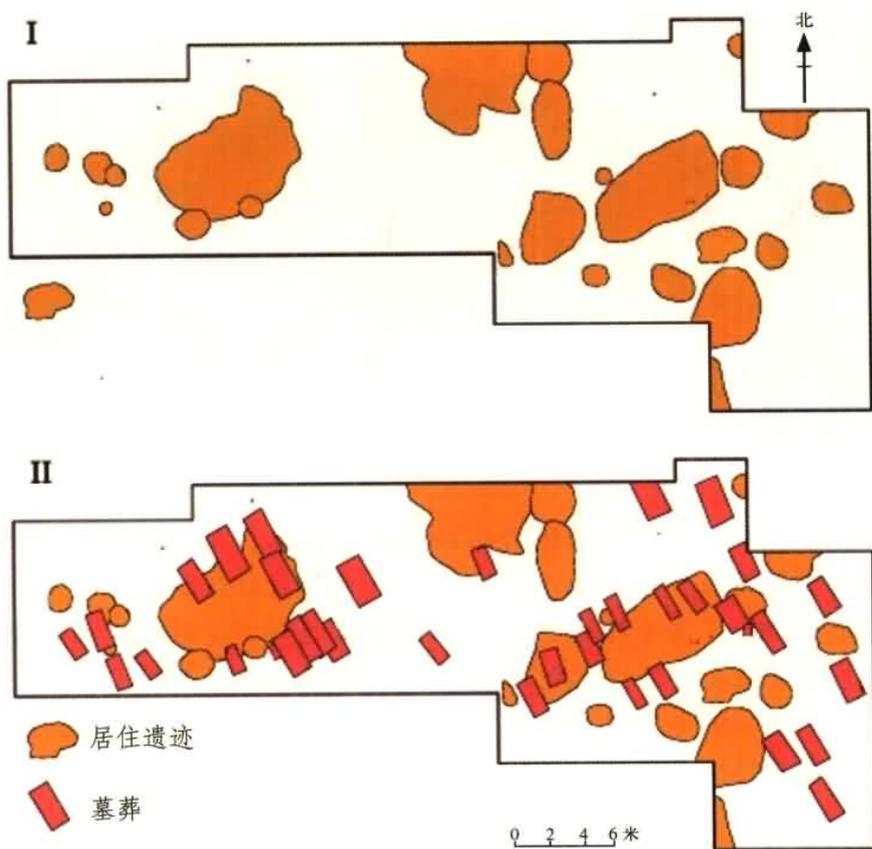
殷墟文化第一期的时候，“大邑商”中的居民点主要集中在宫庙区的邻近地区，如大司空村、后冈等，全部范围可能不足4平方公里。到第二期时，居邑数量明显增加，至少在6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居民点。至第四期时，密集居住的范围扩大到10平方公里以上。

单个的居邑，面积未必很大。离洹河较远者一律凿井取水。由于还没有机会整体发掘一处商代居邑，有关基内部布局还无法完全掌握。考古发掘中可见到密集的房屋、窖穴、巨大的不规则蓄水坑以及连接房舍的道路。

位于今天安阳小屯村北部的宫殿宗庙区是整个商都的核心，地势较高，东、北两面有洹水相绕，西北部是若干大深坑连成的低洼地。西南有石子和碎陶片铺成的道路连接西部其他居民点，南部是一片宽广的开阔地，更有道路通向南方。宫庙区内，以夯土为基础的建筑相比而立。

宫庙区中的几处最大型的建筑基址均发现于中部（略偏东），其中一部分建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即商王刚刚迁都于“殷”的时候。宗庙建筑恰恰建在宫庙区中心，可能建都之初已考虑了宫庙区内的建筑格局。

20世纪30年代发掘时，曾于宫庙区内发现保存较好的水沟遗



殷墟的布局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些居民点后来成了墓地。一些曾经是墓地的地段，若干年后又发展成了居民点。期间的变化过程可以得到考古发掘证实。2002年考古队员在殷墟宫殿宗庙区西部临近洹河处发掘，即见证了这里由早期居民点发展成为晚期墓地的过程。图中不规则的黄色覆盖区域年代较早，是商人的居住遗迹，如房址、灰坑等；而规则的长方形，是商人的墓葬。（荆志淳 绘）

迹。这些水沟与建筑基址相关联，可能属当时的排水系统。宫庙群的西南部发现类似祭坛的遗迹。

王陵区位于洹水北岸的西北冈高地，与宫庙区遥遥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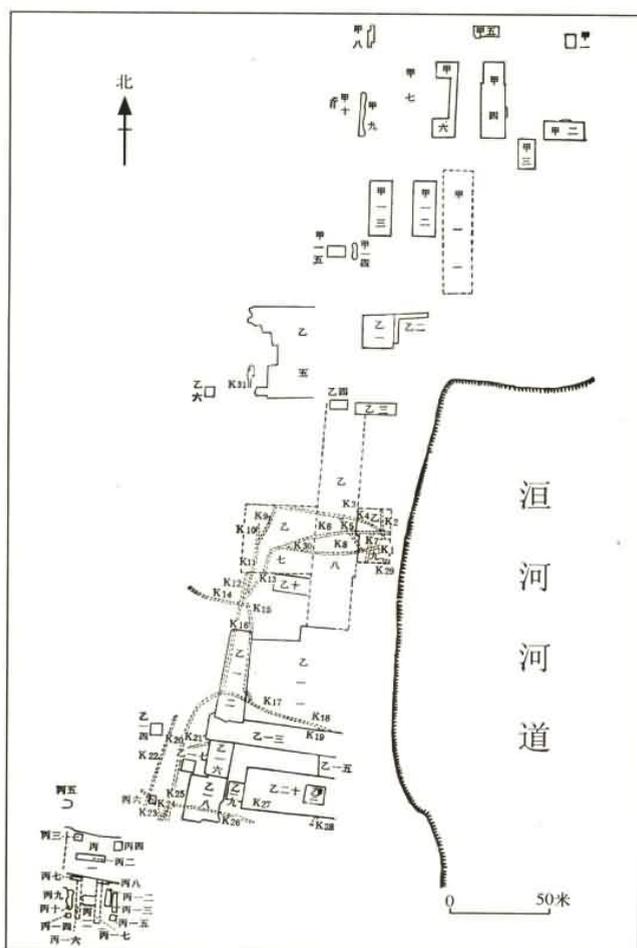
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的乙二十建筑基址，是20世纪30年代发现并发掘的。该基址规模巨大，当年发掘时仅仅清理了建筑基址的西部。近年经过钻探，考古学者进一步了解到，该处基址很有可能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封闭式四合院的北部正殿。2005年，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与安阳市人民政府依据基址的柱网结构，参照甲骨卜辞以及青铜器方彝的器盖样式，在原址局部复原了这处规模宏大的基址。

该基址规模宏大，内有墙，外有廊，顶部为两面坡，是商代较高规格建筑常见样式。

小屯村附近发掘的一座建筑基址，可能即当时的一处“宫”即宫殿。该基址位于乙二十基址的东南部约80米，它实际上是一组由南、北、西三排房基组成的大型建筑群遗迹。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修建于商王武丁时期。

宗庙是供奉并祭祀其祖先的场所，其结构不以居住为目的。其中乙组编号为“乙七”的建筑基址即是一座宗庙。该遗址位于宫庙区中部，面积不小于1100平方米，有7座和12座葬兽坑分别打破基址、压在基址之下；叠压在基址之下的可能是修建基址时的奠基坑，打破基址的或为基址修建之后某种祭祀活动留下的遗迹。“乙七”基址以南，发现大批成排分布的小葬坑。

一般的族居邑址中可能也存在宗庙性质的建筑。这类宗庙建筑与王室宗庙类似，在族邑布局中占据最显要的位置，规模较



殷墟宫庙区内的三组建筑基址。

向东流淌的洹河在小屯村东北折而南流，形成了洹河道的一个漂亮拐弯。殷墟宫殿

宗庙区即坐落在这个弯内。这里地势较高，洹河之水从宫殿宗庙的北部和东部潺潺流去。今天的这个局部，已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保护。这片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地面之下，究竟埋藏着多少个商王朝的建筑，由于尚未全面发掘，无从确认。

1930年代，第一代考古队员来到这里发掘时，但见遍地都是建筑夯土。仅就当年的发掘所及，当年这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考古队整理出53处基址，分为甲、乙、丙三组。

甲组即位置最北部的一组，乙组在中部，南组指西南部的小型建筑基址。按照当年发掘者的解释，甲组是住人的，乙组范围内修建了排水系统，是宫殿和宗庙建筑所在，丙组则可能是祭坛一类的建筑。这些解释多少带有推测的成分，但乙组中的第七号建筑基址作为一座宗庙建筑，基本得到了学术界公认。这处建筑的前部庭院内，发现了大量祭祀遗存。

小屯宫庙区内的建筑当然远不止这53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考古钻探中，乙组乙二十基址的南部、丙组建筑群的东部和西部，均发现大量建筑遗存。

(右：宫殿宗庙区内乙组基址范围内的水沟遗迹。)



大、规格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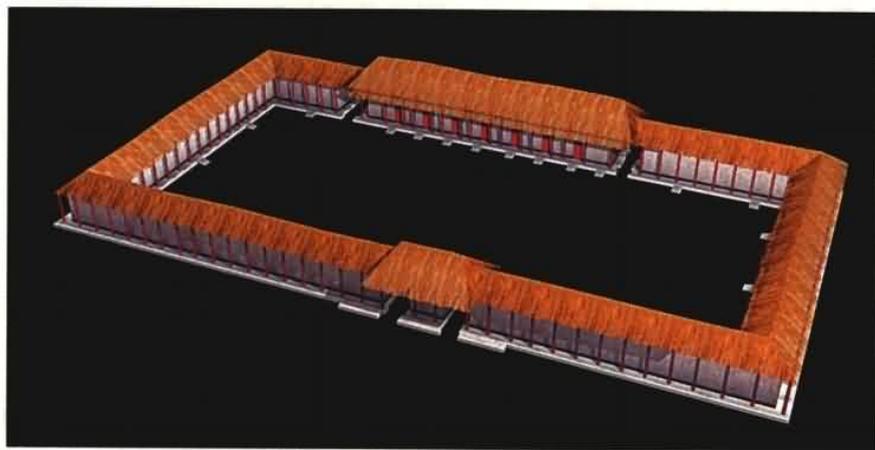
祭坛是另一类礼制性建筑，形制为夯土筑成的高台。甲骨卜辞中“坛”字往往与先辈称谓或方位联用，如“祖丁坛”、“父甲坛”、“南门坛”等，可见坛的功用为祭祖而设。最初发掘殷墟时，于小屯宫庙区发现过若干方形建筑，这些建筑面积较小，多数不足10平方米。且基础上不见础石，很可能是祭坛遗迹。

居住建筑中，贵族住宅皆属地面建筑，大都呈四合院模式。

洹北商城发现的一号建筑基址即是一处展开的“四合院”。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座宗庙建筑，但其建筑形式代表了商代高等级建筑的格局与技术水平。

一号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宫殿宗庙区南部。平面呈“回”字形，四周是建筑物，中间为庭院，是典型的四合院结构。整座建筑东西全长约173米（东部依据钻探资料）、南北宽85—90米（南部门塾和北部主殿宽于其他部分）。总面积（包括中部庭院面积）近1.6万平方米。方向为北偏东 13° 。从已经揭露的基址西部判断，基址的建筑物部分由门塾（包括两个门道）、主殿、主殿两旁的廊庑、西配殿、门塾两旁的长廊组成。预计尚未发掘的基址东部还应有东配殿。主殿位于基址北部正中。保存下来的殿基高于当时地面约0.6米。主殿南北宽约14.4米、东西总长度当在90米以上。主殿上柱网结构清晰，可明显看到殿面上一字排开的9间正室（仅指已发掘清理的间数）和正室外围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宽度约3米。正室墙体大部分以双木柱为骨，墙体可能系土坯垒砌，也可能为版筑（倒塌的墙体堆积中可看到少量版筑夯土，大部分为土坯，难以分辨）。各正室面积基本一致，面阔约8米，进深5米左右。每间正室都向南开门。与门对应的是通向庭院的台阶。有多少间正室即有多少个台阶。这是迄今发现的所有商代建筑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原其本来面貌（特别是地表以上结构）的一处基址。

商族人在建造比较重要的建筑过程中，都伴有祭祀活动，因而夯土中会留下埋有儿童的瓮棺或其他祭祀遗存。1997年，殷墟西部黑河路发现的一座商代四合院式建筑，即在其“庭院”内发现18座“瓮棺葬”。所谓瓮棺葬，是将小孩杀死，装入摔碎的



这是一座被埋藏在地下长达3000年的商代四合院。照片内的吉普车，成了这座建筑的绝好比例尺。2000—2001年间，考古队花了两年时间，才清理了它的西部约三分之二。整座建筑东西长170余米，南北宽85—91米。南部朝外封闭，朝内是长长的走廊。两座宽广的门道与庭院内相通。北部是巍巍的正殿，显著高于庭院的地面。正殿有面积相等的房间一字排开，周围以廊柱环绕。西配殿也明显高出庭院。东配殿尚未发掘。

在中国建筑史上，四合院是建筑物中的国粹。北京四合院早已闻名遐迩，但若不是殷墟的发掘，又有谁会识得3000年前的四合院呢？



陶瓮、陶罐或陶盆之中，夯打在建筑的夯层内。这是一种极其残忍，但又有着“久远历史”的恶习。早在商族人建立商王朝之前，这种习俗即已经存在。

殷墟宫庙区内已清理的百余处建筑基址中，多数应属贵族住宅。殷墟宫庙区外围的族邑遗址中，也发现部分贵族住宅，相对宫庙区内供王室贵族使用的住宅而言，其规模略小，但通常仍在

这便是洹北商城一号基址南庑两个门道中的一个。门道正中间原来埋有一根门槛，发掘时门槛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道长长的深沟。门道两侧是高出地面的台基，原本显然设有门房。台基边缘的方木条痕迹证实了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注意到，所有倒塌在门道内的建筑残块全都呈红褐色，可见这座建筑是被一把大火烧毁的。烈焰之下倒塌的墙体，带着余温，甚至将门道内的地面也烤成了姜红色。

令人惊讶的是，洹北商城范围内，不仅仅一号基址毁于一场大火，其他已经发现的商代建筑也同样是被火烧掉的。这是一场文献中只字未提的大火，但却暗示着背后发生过一起重大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把大火？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





这是不折不扣的“三通”式陶水管。1970年代出自殷墟西部的一处商代居邑（居民点）中。

排水管的使用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到商王朝时期，许多居邑内都修建了排水设施。三通的使用，是商族人建筑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时代，屋内采光全凭太阳的恩赐。为了充分享受阳光，商族人会给房屋装上宽大的门，在墙壁上开凿窗户，给墙壁抹上白灰。甲骨文中的“向”字和在殷墟考古地层中采集到的抹有白灰的墙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追求光明的商民族。





这种青铜器被古董商人称为“小庙”。考古学家称之为“方彝”。其盖像房屋的屋顶。屋顶中间还有一条脊，可能是商代建筑的屋顶样式。

左：1983年殷墟大司空村663号商墓出土，通高27.5厘米；右：1995年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商墓出土，通高25.5厘米。

50平方米以上。

平民住宅在规模上无法与宫庙建筑或贵族住宅相比，但体现出形式多样的特点，通常以地上建筑为主，也有半地穴建筑和“穴居”。地上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30平方米，多数只有10余平方米，通常作长方形或方形，单间和多间并见。

地面建筑要先夯好地基，使房屋修筑在高出周边的高台上，以保持排水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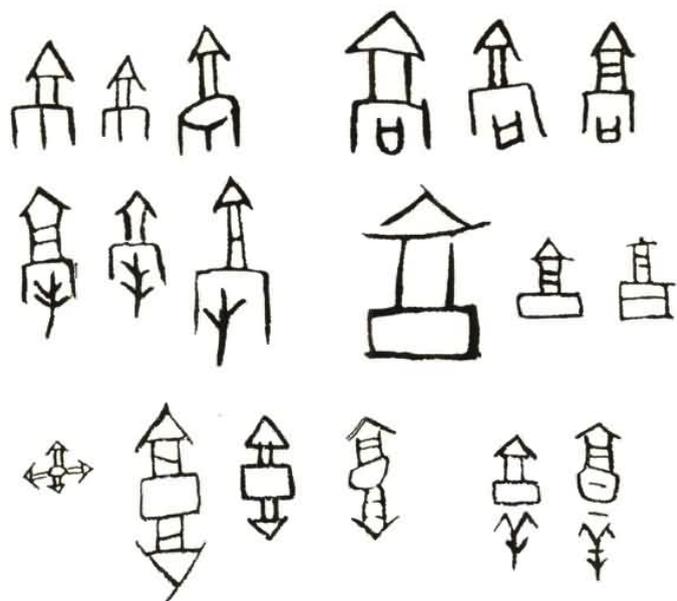
历经3000余年沧桑，商代建筑的屋顶部分早已不复存在。但甲骨文中的一些文字，却替我们保留了不少商代建筑地面以上的信息。

甲骨卜辞所见殷墟建筑类别有“邑”（居民点）、“宗”（宗



甲骨卜辞中，有不少与建筑形式有关的文字。如安、室、宗、向。

屋内有女子为“安”，屋内有神主为“宗”。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字都带有一个斜坡形屋宇。表明商代建筑主要是两面坡式的形式。



与商代建筑有关的另一类甲骨文字。文字学家将这些字释读为京、亳、高、墉、享等字。这些字不仅仅记录的是商代建筑屋顶部分的两面坡形式，而且表明多数建筑有高高的台基作基础。



双层屋顶，建筑学上称为“重屋”。重屋上再插上一杆旗，建筑更显高贵和富丽。

甲骨卜辞和商代金文中的这几个字，反映了另一类建筑形式的存在。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素来钟情的亭、榭类建筑，在商代已经问世。

庙)、“宫”(宫殿建筑)、“室”(活动室)、“寝”(居室)、“家”(居所)、“圜”(监狱)、“坛”(祭坛)、“塞”(要塞)、“廩”(仓廩)、“京”(高台建筑)、“墉”(城垣)等。

这些文字不仅显示出商代有高台基式的建筑，还有类似我国南方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建筑的屋顶，则几乎都是两面坡式的斜坡屋顶。这样的屋顶结构，还可以从一部分殷墟青铜器获得直观证据。殷墟青铜器中有一种礼器，考古学家称为“方彝”，过去的古董商则称为“小庙”。称之为小庙的理由，是由于方彝



的盖看上去完全是一座建筑的屋顶。

半地穴建筑和地穴建筑也以长方形较多，另有圆形和椭圆形的，通常只是单间或者单间分前后室，面积都不大，一般10平方米以下。“穴居”更多情况下是作为“工房”使用的。

考古发现的商文化遗址，均是定居农业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位于洹河河畔，近年沿洹河流域展开的区域考古调查表明，殷墟以西的商代聚落，全部分布于洹河上游水资源丰富、土壤发育较好的箕形盆地内。殷墟以东则多位于当时的河道近旁。商代遗址的此种分布规律，应与农耕需要有关。商代的炊器类陶器，习见者有鬲（lì）、甗（zèng）等，此类器用以烹煮和蒸熟谷类食物。商代的盛贮器，器形极大。殷墟出土的一些贮存粮食用的大型陶瓮，容积近百立升。考古发现的大量商代晚期酒器，也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

甲骨卜辞中有关年成的占卜，占雨、告秋的记录，以及围绕农业生产而制订的农业历法，均显示了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

《尚书》之《汤誓》、《盘庚》、《酒诰》、《无逸》等篇，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商代农业耕种已是普遍的生产方式。如《尚书·盘庚》篇中，盘庚直接提到：“若衣服田力稼，乃亦有秋。”《尚书·酒诰》中，周公对殷遗民说：“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孝养厥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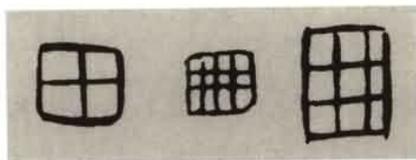
据考证，甲骨卜辞中提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地百处以上。其中有的仅言方位，如“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东方”“西方”、“北方”等。有的则有具体地名，如“京”、“长”、“戈”、“永”、“龙”、“卫”、“雀”、“商”、“噩”、“云”、“古”等。

农业的生产管理由专门的官吏负责，甲骨文中称为“小籍臣”和“小刈臣”。

己亥卜，贞令吴小籍臣。（《合集》5603）

己酉卜，贞令吴省在南廩。（《合集》9638）

两片卜辞连在一起解释，可知“小籍臣”吴是掌管耕作之事的臣僚。吴作为“小籍臣”，曾外出省视仓廩。



甲骨卜辞中的田字，如同将土地以土垄整齐分割。

现今洹河中下游地区地面1米以下所见的黑土，也曾是商族人耕作的土地。

卜辞中还有“小刈臣”，从字形即可知是掌管收割之事的臣属。

除设专门的农业官吏外，商王还随时派遣其他官吏参与农业管理活动。这种活动称为“省田”。省田，即了解土地状况。据学者统计，甲骨文中有关“省田”的卜辞多达187版，238条。可见商王对土地管理的重视。

卜辞中还有“土田”的记载。土田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土地丈量。丈量土地也是一个重要的管理环节。



涉及具体农事活动，如垦地、作畎（沟洫）、耕籍、施肥、审视收成以及刈割收获等，商王也专为差遣安排。除组织管理，颁布命令外，商王还亲自参与农业管理和其他农事活动。

贞王勿往省黍。（《合集》9612）这是卜问国王是否不需要察看黍的年成。

甲子卜，王禾。（《合集》19804）禾即年成。这是商王参与农事活动的记载。

当然，日常农事活动，更多的是由商王派遣官吏，再由官吏负责组织生产者实施。故卜辞中留有农业官员组织生产的记录。

小臣令众黍。一月。（《合集》12）这是说一月份“小臣”命令平民从事种黍的农业生产。

商代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邑人”，即平民。可能还包括少量所谓的奴隶。

邑，是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邑人”实质上是商代各宗族的“族人”。由于商代宗族往往包含有若干家族，而家族又由若干家庭构成。因此作为商代农业生产基本力量的邑人，又是不同家族或家庭的成员。家族或家庭是商代晚期农业的独立耕作单位。

甲骨卜辞中，占问年成的卜辞极为丰富，通常以“受年？”或“受禾？”的问句形式出现。年即年成，禾本意是粟，但用于占卜时可能是作为粮食的统称。

左（由右往左读）：贞我不其受年。意即：卜问，我们是否有个丰年？中（由上往下读）：南土受年。意即：卜问，南部地区是否会是个丰年？右（由上往下读）：甲辰贞其登黍。意即：甲辰日卜问，是否征收粮食黍？





尽管甲骨文中的“禾”字被许多学者解释为“粟”，但如果没有考古学家提供的实物证据，所谓粟是商族人主粮的说法仍然还停留在“合理推测”阶段。1997年，殷墟考古人员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浮选法”的技术，从商代的一座垃圾坑中，成功用水冲洗出小米和小麦颗粒。

小米去皮前称为粟。因而找到了商族人食用粟和麦的直接证据。（上图：小米；下图：麦粒）

商代虽然以家族或家庭为耕作单位，但农业活动未必可以完全自决。商王可以通过发布命令引导生产，甚至直接将一个或者若干个族邑的成员组织起来集体垦荒耕种。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众人”从事农业劳动的记录。

“众人”是商人对社会自由民的通称或泛指。其主体实际即商代各“族邑”的劳动成员。由商王直接统领的众人，被称为“王众”。（《合集》26879）如五族其雉王众。但多数情况下，邑人组织起来后由贵族或官员统领。

由商王或官吏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通常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很可能是在商王的田庄或贵族的采邑进行，抑或具有服徭役的性质。因此族邑成员外出劳动过程中不辞而别的逃亡现象时有发生。

口口卜，贞众作籍不丧。[其丧]？（《合集》8）这是卜问如果命令“众”从事农业活动，他们会不会逃亡？



另一部分农业生产者可能是奴隶。他们在甲骨文中被称为“仆”和“圉”。

中国农作物种植具有悠久的历史。史前时期，粟、稻、黍、小麦均已成功驯化并普遍种植。殷墟时期的主要农作物种类包括粟、稻、黍、麦、菽等。

粟，甲骨卜辞中称“禾”，是殷墟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甲骨文中大量卜问“受年”和“受禾”的记录，二者相加占全部“受年”卜辞的72.8%。据学者研究，这是由于禾的种植量比其他作物大得多，卜问是否“受年”，实即主要卜问“受禾年”。只有卜问其他某种谷物年成时，才在“年”前加谷物名。如“受秣年”、“受来年”等。卜辞“年”字字形如人负禾而归。以“禾”表示“年”，本身即表明粟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基本农作物。

将卜辞中“禾”理解为粟，是由于“禾”的字形具有聚而下垂的穗，与粟的实形相同。考古发掘曾于殷墟遗址中找到过碳化粟标本。

殷墟以粟为主要作物，古代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史记·殷本纪》提到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周本纪》中也有相关记载。

有学者认为，殷墟时期种植的粟，当已有不同的品种。甲骨文中有一字从禾从数小点或小圆圈。有研究者认为该字可隶定为“秣”，实指粟中上品，即黏谷子。卜辞中祭祖常以谷物，谓之“登”。据学者统计，卜辞所言“登”谷祭祖中，言“登秣”者最多，达34次，而登麦类和黍类却分别只有11次和4次。以主要农产品中的上品来祭祀祖先是合乎常理的。

甲骨文的一部分象形字，表现的正是农作物的形象。图中的四个字，从左至右分别被古文字学家释读为禾、麦、黍、年。禾即粟，麦即小麦，黍可能是高粱，年指年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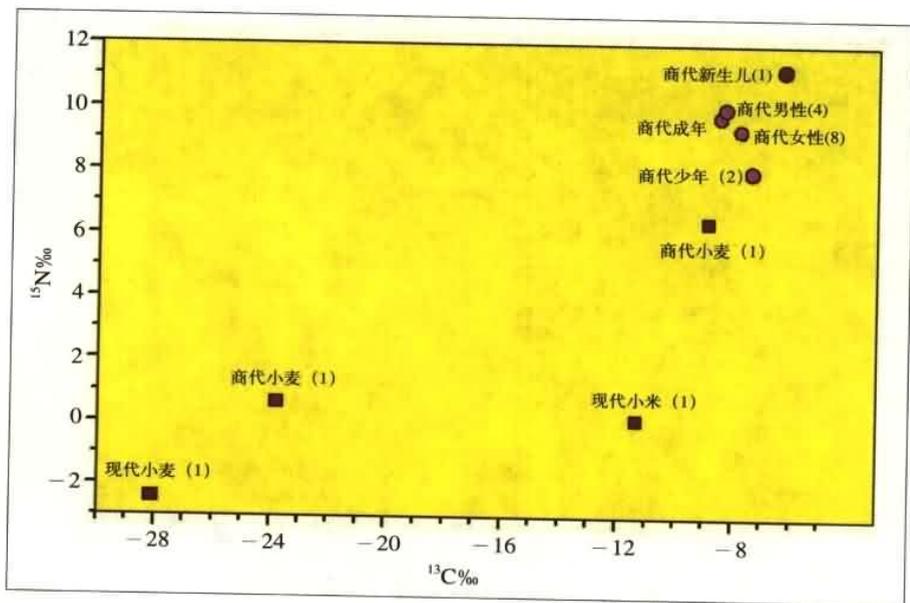
安阳附近地区，现在仍然有不少地方种植粟。粟的穗形，与甲骨文中的“禾”字几乎是一样的。这是2008年8月初在安阳西部林县拍到的长势良好的粟。（唐心为 摄）

黍即今天北方的黍子，去皮叫大黄米。是殷墟时期较普遍种植的另一类重要农作物。河北邢台曹演庄和藁城台西等中商遗址中曾有黍的实物出土。甲骨卜辞中屡见“受黍年”的记载。黍的字形为散穗结构，但有字旁从“水”与不从“水”的两种写法。有学者认为黍字从水者应为黏黍，属黍的优质者。不从水者为普通黍。

麦的种植也很普遍。卜辞中屡有“告麦”的记载。尽管对于“告麦”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但“告麦”的“麦”为农作物麦子则为学术界共识。卜辞中还有商人“食麦”的记载。

稻同为当时重要农作物。





食性分析。

除了从遗址中寻找小米实物证据外，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帮助了解商族人是否以粟为主粮。

这种办法在考古学中称为“食性分析”。其中最有效的食性分析办法是通过测定人体骨骼中碳十三和氮十五的量，并与古代或现代小米或小麦中的同种元素量相比较。利用这种办法，考古人员检测了商代成年男女人骨架中的碳十三和氮十五含量，并同时与商代及现代安阳所产小麦和小米中的碳十三和氮十五相比较，可以清楚看出，商族人骨骼中的碳十三和氮十五含量更接近小米。不仅人骨如此，甚至商代牛骨中的碳、氮微量元素也如此。此项研究，从科学角度证明商人的确以小米为主粮。

卜辞中有“丁酉卜，争，贞呼甫秬于妣，受有年。”辞条，有学者认为“秬”即商时期的栽培稻。

殷墟时期，商王朝仍然统治着广阔的地域，其统治范围内应有许多地点适于种稻。妣地可能即为其中一处。商时期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的确可以种植水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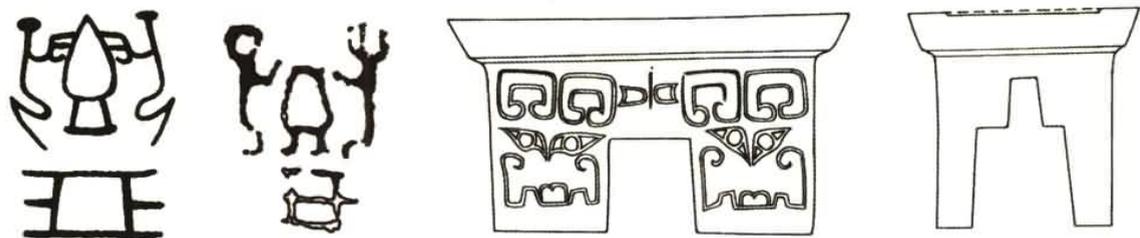
菽是大豆的古文。殷墟时期已经种豆，尚无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卜辞中有一字被学者释为“菽”。据学者统计，“菽”字

在《诗经》中曾6次出现，表明西周时已普遍种植大豆。由此推测，殷墟时期种植大豆是有可能的。

关于殷墟是否种植大豆和高粱，尚待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殷墟时期的农作物种植，不同地区可能种植不同的主要作物。如始地以种稻为主。麦字，后来用以指地名，或者该类地点以产麦著名。

商代的农业水平，还反映在发达的酿酒业上。殷墟发现的商墓，但凡死者有一定身份，都会随葬一套青铜酒器，至少是一觚



商王朝时期没有桌椅。

一位曾经在古埃及和伊拉克研究过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到殷墟观察了一部分人骨，发现商族人的膝盖骨和趾骨上都有明显的疤痕。于是“惊讶”地问中国学者：“商代没有桌椅吗？我断言他们是跪在地上生活的。否则他们的髌骨和趾骨上不会有如此明显的磨损。”这位学者没有说错。事实上桌椅出现在中国是晚唐以后的事情。商代人们的确跪在地上生活。殷墟出土的铜器上，许多图像都是人们跪在地上生活的描写。例如两个人分别蹲在一堆东西的两侧，旁边平摆着一副抬舆。表现的或许正是收获粮食的场景。然而跪地生活并不意味着商代没有类似桌子一类的东西。不过当时的“桌子”应该有别的名称，或许像汉代一样称为“几”或“案”。这是1950年代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中出土的石案。推测商代日常生活中的案可能比后世的桌子更为低矮。



一爵。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常常以陶质的觚、爵替代。酒的酿造，是以粮食为基础的。由此可知商王统率的是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

除了粮食作物外，殷墟农业生产还至少包括麻类作物的种植。

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殷墟时期麻织品。殷墟后冈圆坑中曾出土成束的麻绳和麻布片。殷墟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表面上都黏附有麻布痕迹。妇好墓中部分铜器上的麻布包裹痕迹经鉴定，属麻织物的至少10例。

殷墟还可能已经种棉。考古学家在整理1936年殷墟发现的著名甲骨坑H127中的出土甲骨时，发现至少有65片甲骨片上黏附有纺织品痕迹，经鉴定其中包括“棉纤维类纺织品”。这一推测如被进一步证实，当为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成就。



商族人嗜饮。

西周武王伐纣成功后，总结商王朝亡国原因时，即将酗酒列入其中。考古发现证明，商族人爱酒之事不虚。绝大多数商族人身死之后，别的可以不随葬，酒具却是要带到阴间的。相对贫困的平民，哪怕使用一套象征性的

冥器（专门给鬼制作的器皿）也好。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者来说，随葬酒器的多少，更是身份的标志。

在各类酒器中，觚和爵又是最核心的酒具。1件觚加1件爵为一套。随葬3套或3套以上者，多为王族成员或者诸族的“族尹”（族长）。

左：爵。1986年大司空村29号墓出土。高21厘米。

右：觚。1986年大司空村29号墓出土。高28厘米。



商族人可能用板栗树叶泡酒。

从殷墟的一座商族人墓中，考古人员发现死者随葬了一批青铜酒器，包括通常所见的觚和爵，也有斝(jiǎ)、卣(yǒu)等只有较高级别的贵族才能使用的礼器。当他们提取斝和卣时，却发现这两件商族人用来盛酒的铜器中，装填了厚厚的一层树叶。工作人员将树叶送到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检验，植物学分类学家看过后，认为是板栗树的叶子。(左：铜卣；右：板栗树叶)

与史前时期相类似，殷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木、蚌、骨器为主。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商代尤其是殷墟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过去有学者误认为当时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实则不然。

殷墟农具的功能划分是十分明确的。其垦地农具有耒(lěi)、耜(sì)、耨、犁；中耕农具有锄和铲；收割农具则有镰与刀。

耒为带“歧头”的起土农具。卜辞中的“耜”字有耒的象形，如人执耒而耕。该种农具首部分叉，青铜及石质均不易如此



加工。推测应以硬木制成。因此考古发掘中也未见有耒的实物出土。但一些殷墟墓葬和灰坑中，分叉工具留下的双齿痕迹并不鲜见。殷墟小屯西地灰坑H305的坑壁即留有齿距8厘米的起土工具痕，大司空村H112的分叉齿痕间距4厘米左右，孝民屯灰坑H116起土工具的分叉齿痕间距约5厘米。这些分叉的双齿起土工具，应都是耒的痕迹。

耜又称为耒。是一种既可起土，也可翻土的农具。殷墟时的耜多数木制。不少墓葬或灰坑的周壁留有耜的痕迹。

耨有石质和青铜两种。这时的耨都是条形，尚无战国秦汉以后流行用的双齿或多齿形耨。青铜耨一般带有釜(qióng)以便于安柄。殷墟不仅发现有铜耨或石耨的实物标本，还发现有铸造铜耨用的陶范。1984年重新发掘传出司母戊鼎的大墓时，曾于墓道填土中发现宽4厘米、残长13.4厘米的残断石耨。

犁耕可能起源于史前时期的中国南方。目前作为商代犁耕的实物证据发现不多。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有2件青铜犁。其形近三角形，中部隆起，后带三角形釜。1件釜部正中有对穿，长9.7厘米，肩宽12.7厘米。推测商王朝已推广犁耕。

铲作为中耕农具，主要用途是除草。甲骨卜辞中有字释为“耨”(nòu)，被认为与以铲割草有关。目前发现的铲有石铲、骨铲、青铜铲等。

镰作为收割农具，考古出土实物最丰富。通常为石质和蚌质。安阳殷墟20世纪30年代初于小屯发掘时，从7处窖穴中共获石镰3640件。其中一处窖穴中整齐地排放着444件。商代遗址出土的蚌镰数量也极多。如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出土的蚌镰，加工出锋利的弧刃。其劳动效率当不亚于石镰甚至更高。

考古学中刀其实是侧刃较长的工具的泛指。其质料有石、铜、骨、蚌、陶等。多数刀都不是农具而是手工工具、兵器或者日常生活用具。但殷墟时期有一种形制较小的半月形或长方形刀可能是作为农具使用的。安阳殷墟及洹北花园庄遗址出土过部分此类石刀。据一些研究者推测，这种刀可能是用来摘取禾穗的收割工具。



商代被称为青铜时代,但农耕中仍然使用石器、骨器。

其时冶铁术尚未发明,在人们的想象中,当时青铜器应该被大量使用到农业之中。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即使到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青铜器似乎主要用来制造以祭祀为目的的礼器和以战争为目标的兵器。虽然在农业领域中青铜器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用于耕种和收获的仍然是石器。殷墟遗址中,特别是殷墟外围的居民点中,偶尔才会发现青铜农具,而石器则常常被大量发现。从耕作用的石锄到收获用的石镰等,一用俱全。



殷墟时期的农业生产，仍是“靠天吃饭”的农业。受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制约很大。比如卜辞中就有辞条说：

贞今秋禾不遘（gòu）大水。（《合集》33351）这是卜问农作物是否会遇到洪涝灾害。

甲骨卜辞中有关求雨的占卜更多。

但尽管如此，人们在农业耕作过程中，已获得许多大量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包括农时方面的知识及耕种技术。

商代历法已有闰月设置，并且月份有大小之分。这是为使月份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回归年相调剂，使四时与月份相配，以不误农时。

卜辞中有“告芴”一词。按古书《说文解字》的解释，“旧草不芟新草又生曰芴”。故告芴应是垦耕前了解田地草木情况，以便清除备耕。

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有关“衰田”的记录：

癸卯[卜]，宾，贞令禽衰田于京。（《合集》9473）这是说在癸卯这天卜问是否应命令禽到“京”地衰田？

关于“衰田”，学术界有多种理解。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作“垦荒”解。据研究，殷墟“衰田”并非仅指开垦生荒，也包括熟荒的垦作。因此当时可能存在“熟荒农作制”农业。即视情况将已垦田地抛荒，数年后再行耕垦，以休息地力。

商代农业十分注意播种前田地的翻耕和整理。“耜田”可能即是翻耕和整理田地的记录。

整地还包括打垄作沟。卜辞中“作大畎”，以及“尊田”、“作龙”等记录反映了这两个农业生产环节。

甲骨卜辞中还有涉及商代农业生产过程中中耕除草、灌溉、治虫的一些线索。

殷墟农业已属施肥农业。卜辞中有“屎”字。释家多以为该字与施肥有关。

庚辰贞翌癸未屎西单田，受有年。十三。（《合集》9572）这是卜问是否要为西单地区的田地施肥。

殷墟家畜畜养已甚发达。牛、羊、猪、马皆以栏厩圈养。肥粪可能来自家畜。



牧野原本牛羊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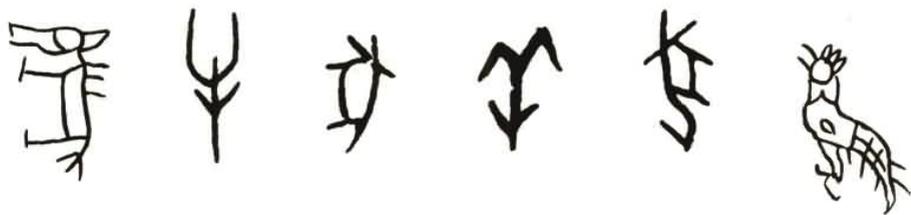
畜牧业

西周击灭商王朝的最后一仗，据说在“牧野”展开。作为地名的牧野，原本并非战场，而是牛羊奔跑的商族人放牧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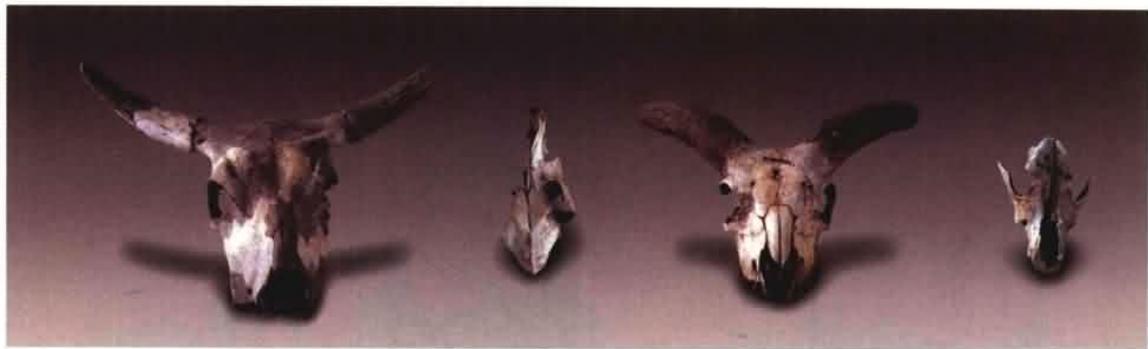
殷墟文化层中每每有大量动物骨骼，包括马、牛、猪、羊、狗和鸡。1986年发掘花园庄东南商代废料坑，出土大量兽骨，其中包括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料。许多墓葬中以狗、猪、羊肉随葬。腰坑中及填土中则普遍以狗作为殉葬的牺牲。牛、马则既用来殉葬，更用于祭祀。

甲骨卜辞中，与畜牧业相关的文字同样包括马、牛、猪、羊、狗和鸡。

商代使用牛羊之盛，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毫无疑问进入了一个“六畜兴旺”的时代。



甲骨文中牛、羊、猪、狗、马、鸡六畜的写法。为我们保留了商代畜牧业的重要记录。



考古发现的家畜骨骼通常有三种出土环境。一是居址内，骨骼以牛、羊、猪、鸡骨为多。二是祭祀坑中，主要是马、牛、羊，偶尔会有猪。三是墓葬的墓室内，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犬，而且墓葬内的犬又集中发现在腰坑内或填土中。反映商族人食用以牛、羊、猪、鸡为主，祭祀以马、牛、羊为多，犬比较特殊，似用来与主人相伴生死。

马用于代步。迄今殷墟已出土完整马车近百辆。但与车有联系的发现，仅占马的总发现的一部分。殷墟还有许多单独埋马的坑，即马坑。

殷墟的成年马，通常高约140—150厘米（测其前肩）。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M175号车马坑中的两匹马中保存较好的一匹高145厘米，而1972年殷墟孝民屯车马坑M7中的两马的前肩高也在140—150厘米之间。

马虽然高贵，但商王朝的畜牧业中，牛的数量却可以肯定大大超过马的数量。养牛的规模由两方面推知。

卜辞中的祭祖记录中，用牛的数量通常最多。

丁巳卜，争，贞降咎千牛。不其降咎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



商族人献给亡故祖先的一条羊腿。

车马坑中的马首以及墓葬中的马衔、马鞭与挂缰钩：殷墟的历史发展到第三期，特别是第四期以后，族长一级以上的贵族墓，基本都开始用马车陪葬。即使没有马车，也会在墓葬中用一些车马具，表示死者有车马陪葬的意思。等级高的贵族，马车是经过精心装饰的，甚至马头上都有精美的饰品。

下左图：殷墟西区发现的车马坑马头局部；右上：后冈殷商墓葬中出土的马衔；右中：大司空村商墓出土的车手赶车系在腰上控制缰绳的带钩；右下：苗圃北地商墓中出土的驭手赶车用的青铜马鞭握柄。



在商人眼里，拥有马与拥有马车一样是高贵的象征。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常常向祖灵献马。马的骨骼因此会保留在祭祀坑中。不仅殷墟王陵区大量马坑发现，就是在一些家族墓地中，也常常可见静静躺在地下的马匹。



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一座商代牛坑。对考古学者来说，发现类似的屠杀多匹牛祭祀神灵的现象，并不奇怪，他们关心的是，杀祭在该坑中的牛是在祭祀谁？为什么在此而不是别的地方祭祀

这条卜辞可读成：丁巳天，贞人争占卜是否要杀1000头牛和1000名人牲用以祭祀。

口口卜，争，贞燎鬯百羊、百牛、百[羌]。（《合集》40507）

这条卜辞是说是，某一天贞人争卜问，否要用燎祭的方式，献给（祖先）100头羊、100头牛、100名羌俘。

这些大规模用牛、羊、甚至人来祭祀，得到了考古发现证实。

当时的牛包括水牛与黄牛两种。但商人驯养的主要是黄牛。许多商族人的居民点中都出土有黄牛骨骼标本，牛角更是十分常见。

卜辞中有“黄牛”的直接记载：贞燎东西南卯黄牛。（《合集》14315）这是贞问是否需要东、西、南诸方向燎祭并劈杀黄牛。

猪在卜辞中称豕或豚，也是商朝人大量圈养的家畜。甲骨文中狗称为犬，也十分常见。其中有1条卜辞将狗、羊、猪三种家畜一并列为祭品：

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

二十犬，二十羊，二十豚

三十犬，三十羊，三十豚

五十犬，五十羊，五十豚

（《合集》29537）。这样的卜辞意义非常直接，无需解释。



商代铜器铭文中有一些生动图像，虽然字不可释读，但意义十分明朗。本图上边一字，为一手执刀，作屠猪之状；下边一字，为双手伸出，从圈中抓取一豕（豕本意为小猪）。今天安阳附近农民养猪的方式仍然是圈养，恐怕与3000年前发达的商代养猪业区别不大。（张晔 摄）



商人畜养的家禽还有鸡。

殷墟墓葬中，鸡是常见的祭品。清理墓葬时常常可见有鸡骨盛于陶质随葬品内，比如说陶豆中、陶簋中。

从殷代墓葬经常出土的玉雕鹅、鸭形饰品看，殷墟时期也可能饲养有鹅、鸭。

除了我们常说的六畜和一些小型动物外，喜欢冒险和善于寻找刺激的商族人还曾经尝试养象。殷墟多次发现象的骨骼标本和象牙。但可证明“商人服象”的是1978年发现的1具幼年亚洲象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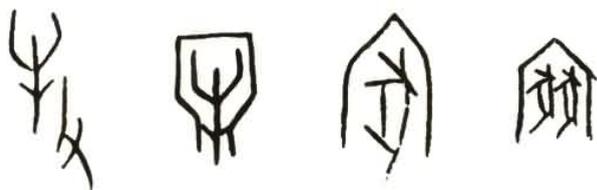
商人还或许还曾经驯养鹿。殷墟卜辞中记载商王出猎时，常有获鹿数百的记载。



殷墟晚期的随葬品中，以陶盘取代早期的陶豆，用以向死者的亡灵进奉食品。陶盘中所盛食物多是肉食。如大司空村的一座殷商墓葬中，陶盘与盘内的羊骨一起出土。



这是1978年发现于殷墟王陵区西区祭场西南部的祭祀坑M35。坑长2.4、宽1.68、深1.8米。内埋1象1猪。象体高1.6、长2米。经鉴定为一头幼年亚洲象。该象的颈部系有一枚硕大的铜铃。铜铃系在幼象的颈部，表明该象是人工驯养的。



甲骨文中，“牧”、“牢”二字均为会意字。“牧”乃

一手执鞭作赶牛之状；“牢”字指牛、羊或豕（有时可两只以上）被圈在栏中。由字及意，可证商族人断然已有将圈养牲畜的畜牧业。

丁卯……狩，正，……擒获鹿百二十二……（《合集》10307）

卜辞虽然有所残失，但大意还是清楚的。它记录了占卜者于“丁卯”这一天占问狩猎的事，后来擒获野鹿122头。

与甲骨记录相对应的是，殷墟遗址发掘中也发现大量鹿骨。

商族人的畜产品，有三种常见用途：食用、祭祀、制造骨器。

祭祀也是食用，只不过享食者是神灵。墓葬中的肉食盛于豆、簋、鼎等食器或炊器中。

商代畜牧业，既是食用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制骨业的需要。大概祭祀也是刺激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殷墟时期的畜牧业，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畜牧业由各宗族或家族成员来完成的。从铜器铭文及甲骨卜辞可知，畜牧生产的主事者或管理者被称为“牧”。称呼有“亚牧”、“牧正”、“多马亚”、“马亚”、“马小臣”、“多马羌”、“多马羌臣”等。负责专门饲养或看管家畜的劳动者则称“牛正”、“牛臣”、“豕司”、“司羊”、“司犬”。大凡牛、羊、马、猪等牲畜是主要的圈栏动物。



一个有趣的问题：商族人吃狗肉吗？

殷墟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约半数墓葬在棺木之下，大体死者的腰部开设一坑。考古人员称之为腰坑。腰坑内，多达90%以上的情况都会埋狗1条。据研究，其功用相当于唐宋时墓葬中放置铁牛铁猪，乃“作牛豕之相状，以御二龙”。换句话说，是用来为死者抵御来自地下的滋扰的。有时候，商人也会将狗埋在填土中。可能是商人在死者落葬后期，将死者爱犬殉葬给死者。贵族死后，甚至会在腰坑内和填土中同时给死者殉狗。商族人的居民点很少发现残剩的狗骨。这些迹象表明，商族人可能并不食犬。照片所示为一座商墓中棺材底部的腰坑以及腰坑内的狗骨架。



铜器铭文中，曾有一人豢养多只爱犬的图像。人犬寻欢之情，溢于画面。因此我们常常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困境：如此看重人犬之情的商族人，为什么又残忍地随意杀戮抓捕回来的外族俘虏呢？

“牧”管理着一批具体从事畜牧活动的劳动者。羌族是西北民族，善于畜牧业。故当时的畜牧业劳动者主要来自于被俘的羌人。

畜牧官吏要定时向商王朝报告牧情。商王本人对畜牧情况也十分关心，时常亲自过问，有时商王则派员视察畜牧生产。

据卜辞研究可知，当时已设置专门的牧场。

卜辞中有“南牧”、“北牧”、“左牧”、“右牧”及“牧”字前带地名的其他牧场名。又有“牧鄙”一词，即牧地的边沿地带。《史记·殷本纪》载，昔时周武王伐纣时，交兵于牧野。牧野或正在当时一外牧场附近，或指商族人放牧的开阔之地。

捌

百工竞艺

门类众多的手工业生产

殷墟的手工业门类众多，包括青铜冶铸业、玉石业、制陶业、制骨业、牙角蚌加工业、漆木业、纺织业、酿酒业等。有学者认为，《左传·定公四年》提到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所言都是以职业为氏的商人，如陶氏为陶工、索氏为绳工、施氏为旗工、樊氏为篱笆工。如此说可信，则当时实际的手工业门类要远远多于考古实物资料的观察结果。因此甲骨文中出现了“百工”一词，以统称当时门类众多的手工业生产。

青铜铸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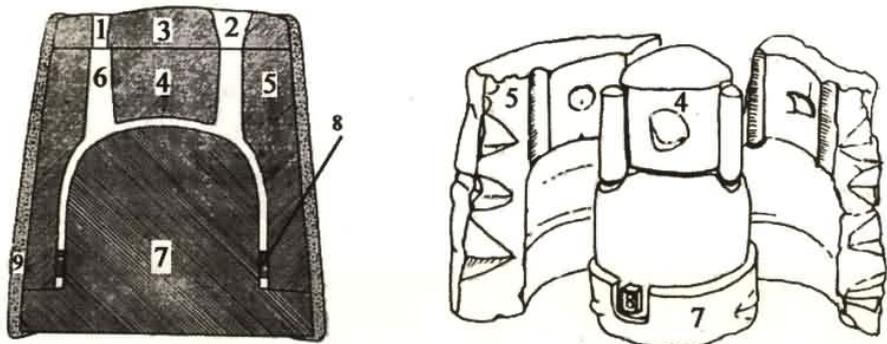
殷墟没有发现冶炼铜或铅、锡的遗址。铸铜的原料系直接从矿山运来的已经炼就的锭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在殷墟清理出的5处铸铜器作坊，则表明殷墟的铜器多数是就地浇铸的。

铸造一件铜器，要经过下述工序：

取土→淘洗→舂和（添加砂粒、植物质）→练泥→陈腐→由模制范（制取花纹）→铸型的干燥、焙（bèi）烧和装配（将陶范装配在一起并预热）→合金的熔化（与铸型的焙烧和装配大体同时进行）→浇注成形→铸后加工（打磨等）。

殷墟铸铜工业所使用的块范法的块范装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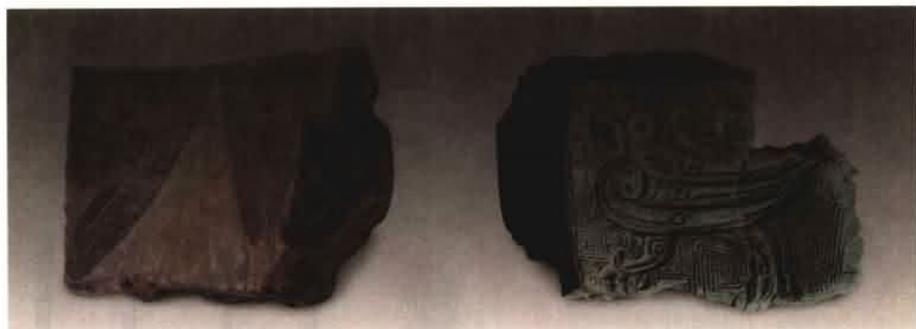
- 1.气孔 2.浇口 3.浇口范 4.顶范 5.腹范 6.鼎的铸型
7.鼎腹泥芯和底范 8.鼎耳泥芯 9.草拌泥





商代工匠制造铜器时，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制“模”（想要铸造的铜器样子），再从“模”上制“范”（从“模”上脱下的器物外形）。这

便是“模范”的由来。2000年，殷墟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1件手形器。或许一位商代工匠用自己的手做了一次“模”，它的原型，很可能是一位商族人的手臂。



陶范雕刻得越精美，铸造出的铜器就越精制。

铸造铜器的过程中，整个过程中90%以上的时间都在准备陶范。

与人们的想象大不相同的是，铸造铜器过程中花费时间最长的并非浇铸，而是浇铸之前的复杂的准备过程。铸造很可能只占整个过程中的十分之一时间。

以多块陶范装配来铸造铜器，又称“块范法”。块范法又包括浑铸法和分铸法两种技术。器形较简单的器物如圆鼎、觚（gū）、觯（zhì）等通常一次铸成，器形较复杂的则先铸好部件，再二次、甚至三次铸成。前者称为浑铸法，后者称为分铸法。



一般来说，铜容器都是倒着浇铸的，铜溶液冷却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芯，再用砺石修正磨光，即可得到一件新铸的青铜器。但烧铸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技术设备。首先是溶铜工具，包括小型坩埚和比坩埚更大的熔炉。

殷墟的5处铸铜作坊中，经过较大面积揭露的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两处。两处遗址都设在距洹水很近的地方，为的是解决用水和取沙的问题。其中苗圃北地铸铜作坊还发现引水的人工渠穿行其间。

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位于小屯宫庙区东南约1公里处，范围在10000平方米以上。现已做过多次发掘，证明是一处殷墟文化一至四期均在使用的较大作坊。遗址分为居住区与生产区两部分，居住区位置偏西，生产区位置偏东。

制范、制模的遗迹主要是一种用料礞石粉铺成的工作场地，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1—2米。料礞石面铺得较薄，最厚的

雕刻的奇迹原来是简陋的工具来完成的。骨制的刮刀，可帮助获得粗略的泥范，而精美的花纹却由这些细长的青铜剔刀来完成。然而工具仅仅是工具，想到未来的成品为的是献给祖先神灵，工匠无比虔诚的内心世界，是青铜器充满狰狞和诡异的真正源头。



殷墟发现的残炉壁：这种弧形的厚炉壁，可能是商族人化铜时留下的。它可能

不是直接化铜的熔铜坩埚，而是燃烧燃料为坩埚提供温度的熔炉残壁。



上：这种陶器，考古学家戏称“将军盔”。其特征是敞口，极小的平底，厚胎，而且胎内夹粗砂。它可以装比较重的东西。敞口、小平底又使得它易于倾倒。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它是用来化铜的坩埚，也有学者推测它是承接高温铜水以浇铸铜器的“浇铸包”。曾有1件“将军盔”内壁粘有铜渣，表明它确与铸造铜器有关。



下：陶范法铸造铜器，会在器物上留下范缝。商代青铜器的底部，往往可以看到范缝。考古学家们称之为“范线”。现代的仿古铜器，多数都是用失蜡法做的，因此看不到范线。

也只有0.12米。但地面较硬，有的还用火烧过。发掘过程中，这种场地伴出陶范和陶范泥坯。

陶范的烘烤有单独的工作间，这种工作间通常作长方形，面积不大，有时只有6—7平方米。地面以料礓石掺黄土筑成，烘范炉呈椭圆形，有炉膛、火道、烟道。附近有时会发现经过烘烤的陶范。

铸铜的浇铸间为一种类似“工棚”的建筑。有的建于地表，有的工作面低于地面，作半地穴式。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曾发现一处浇铸间，平面呈方形，东西长3.3米，南北宽3.5米，工作面低于地表0.4米；中间尚遗留有一个长1米以上的方形陶范，四角各有一柱洞。

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中还发现了熔铜工具、铸铜工具、制范工具和修整铜器的工具等。





商代青铜器容器中，酒器占了绝大部分。爵是用来温酒的，觚则是直接用来将酒水送进嘴中。其他诸器，包括尊、方彝、斝、甗、卣等，按照古人传下来的说法，都是用来装酒的“盛酒器”。但在祭祀祖先的礼仪中，他们可能还有不同的分工。

孝民屯村西铸铜作坊只做过小规模发掘，出土了一批陶范、熔炉残块、铜渣、木炭等，其中内范多是工具和武器范。据分析，该作坊是一处建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续至第四期的以生产武器和工具为主的作坊。孝民屯东铸铜作坊与孝民屯西作坊相隔约200米，二者也有可能原本是同一作坊的两个小区。近年的发掘表明该作坊的规模不小于苗圃北地作坊。

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早于宫庙区的建筑基址，可能早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遗存。



殷墟青铜器纹饰：
殷墟的铜器器表大都有复杂的花纹，主要分为三类，即写实或半写实的动物纹、怪诞动物纹、几何形花纹。写实或半写实的动物纹有鱼纹、象纹、蝉、牛头等；怪诞动物纹占花纹

装饰的大宗，其中常见的有夔（kuí）纹、饕（tāo）餮（tiè）纹等；几何形花纹如涡纹、菱形纹、乳钉纹等。

殷墟出土的铜器如果按器类划分，容器类有鼎、甗（yǎn）、觚、爵、尊、方彝、斝（jiǎ）、甗（bù）、卣（yǒu）、壶、盘、簋（guǐ）、豆、盂（yú）；乐器类有铙；工具类有刀、削、斧、铍（bēn）、凿、锥、锯、钻、刻刀、鱼钩、铲；兵器类有戈、钺（yuè）、矛、大刀、镞、胄（头盔）；车器类有车軛（è）、车策、弓形器；其他杂项还有多钩形器、铜镜等。

迄今殷墟出土铜器总数在6000件以上。如果以数量划分，兵器是大宗，约占全部出土品的2/3，容器约占1/6，工具、车马器及其他杂器占1/6。

玉石加工

1975年，安阳小屯发现一处专门的玉石器作坊，证明商王室拥有自己的玉石器加工场所。这处玉石器加工作坊位于殷墟宫庙区内，主体是一处地穴式房址和一处半地穴式房址。

地穴式房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95米，东西宽2.5米，深3米。室内三面有高约1.3米的烧土壁台，可以用来堆放玉料和琢玉



工具。工作面用厚约0.17米土铺垫而成，加工平整并经烧烤。工作面下还叠压着一座祭祀坑，内埋一具被肢解的人骨。为保持室内干燥，西、北、东三面墙壁的下部都有防潮用的木炭。房址内出土了600余件圆锥形石料，260余块长方形磨石（残块），部分玉、石雕刻品以及少量的原始瓷器。

半地穴式房址平面近方形，西壁扩有一耳室，面积约5.3平方米。工作面用黄褐色土铺成，西南角有一片烧土面。房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石璋残片，以及一些制作精巧的小型玉石雕刻品、绿松石、蚌器、铜刀、铜铍（zú）等。

殷墟玉器绝大部分属于软玉类。一般认为新疆和田是殷墟玉料的主产地，但也有学者认为，除新疆和田外，还有一部分产于今河南南阳独山、新密和浙川。普通石器的原料取材广泛。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一批石器经鉴定以板岩、辉绿岩、石灰岩较多，其他还有砂岩、黝辉石、玉髓、缟（gǎo）玛瑙、蛋白石、蛇纹石、绿岩、流纹岩等二十余种。60年代殷墟出土的石器，鉴定结果则有板岩、石英岩、大理岩、砂岩、辉绿岩、玄武岩、流纹岩、绢云片岩等。

多数玉器的色泽呈绿色、黄褐色、白色或棕绿色，其次为灰色或黄色，只有极少数黑玉。研究表明，殷代制玉已经有了一套从选料、开料、造型、钻孔到琢纹、抛光的完整工序。

殷墟玉器中许多是玉料、半成品，甚至废料。一些小型玉器即利用边角料加工成型。殷墟玉器中还有大量改制器。

开料似乎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硬质条状或片状工具加解玉砂

殷墟发现的部分制玉过程中留下的玉废料。

左：切割废料；中：钻孔废料；右：切割废料。





半圆形玉料对开后做成的一对鱼形玉饰。

反复推磨切割。这种方法适宜于器形较厚，玉料能够承受琢磨时产生的振动而不至破碎。另一种开料方法是砣具切割。此法适宜于器形很薄的玉器。

殷墟的多数片状器应是经过两边对切成片的。典型的例子是有中脊的玉戈或矛，经过两边对切，中部结合处正是中脊。这样，既节省了工时，降低了损坏的危险，同时也恰好留出了显示其锋利的中脊。有些器物，由于两边对切时未掌握水平，以至于对切错位，而在器物中部留下一道凹槽或台面。

殷墟时期的钻孔技术已相当成熟。从器物上可见到两种钻孔方法。

其一是程钻。这种钻孔一般孔径较小。如果器形较薄，多是单向程钻，与解玉砂磨擦时间的不同，造成孔径一端大，一端小，呈漏斗形；如果器形较厚或较长（如玉管），则多是两面对钻。由于两端钻孔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很容易在中部交错。

其二是管钻。这种钻孔一般孔径较大。对于器物较薄者，多单向钻。对于器物较厚者，则两面钻。同样，由于与解玉砂磨擦时间的不同，一面钻孔的剖面呈梯形。而两面钻孔的剖面则两端大，中部小，有的在中部还留有对接未打磨的断碴。较大的管芯





商人以其精湛的钻孔和磨制工艺，生产出许多精细的产品。这些玉棒用途不明，但他们具有匀细的穿孔和光洁细腻的表面。

玉料还可被制作成其他物品。最典型的即是环、璧、琮类器物的管芯料用来制作圆形穿孔饰物。

殷墟玉器表现纹饰有三种基本手法：单阴线刻、双阴线勾彻和阳线表现。每一种图案造型都是由这三种基本形式加上镂空、钻孔、浅浮雕等构成。



商人的双阴线雕刻纹饰法被大量运用到动物玉雕上。玉鸟的腹部系以单阴线雕刻，但背部纹饰均是双阴线手法刻就的。

单阴线刻又分两种刻法：一是用硬锐的工具以手工推琢，二是用小型勾砣勾划出。后者勾出的阴线宽窄均匀、深浅比较一致。许多玉器系以阴线刻出纹饰，特别是蝉的双翅、鱼的鳃和鳍，普遍采用此法。其他一些小玉器上也有采用此法刻纹的。双阴线指的是两条匀细并行的阴线。双阴线勾彻手法在殷墟玉器中应用得最为

普遍。由于双线间距甚近，在视觉上给人以阳线的错觉。作为殷墟玉器上的主要纹饰，多用于凤鸟类动物的双翅。

阳线即线纹凸起于器物表面，是殷墟玉器表现纹饰的另一种手法。它通过把线纹以外的部分琢磨减地而成。这种纹饰相对于阴线纹来说费时、费力。

殷代玉匠还通过镂空、钻孔、浅浮雕、减地突显局部等手法来表现各种动物造型的眼、口、角、脊等部位。钻孔法一般用于各式动物圆雕的嘴的表现。减地法更多地见于表现鸟、兽类动物饰品的眼球、犄角、眉等部位。特别是形体较小的器物，其眼球多是通过四周减地的方法来显示。

商代玉器还有一种铜、玉结合制成双材料复合制品的工艺。一些学者称之为“金玉同盟”。这种制品主要是带锋刃的器物，如玉援铜戈、玉援铜矛等。

殷墟玉器总数约3000件，可分为礼器、工具、日用器、兵器、杂器等。

礼器类包括琮、璧、环、璜、玦、圭、璋等；工具、日用器类有斧、铲、铤（bēn）、觿、刻刀、纺轮、耳勺等，这一类别还



商人制造了大批铜、玉复合制品，以兵器最为多见。这种铜、玉巧妙结合的技术，学者喜之为“金玉同盟”。



应包括簋、豆等容器在内；兵器类有戈、矛、戚、钺等；玩赏器和装饰品则包括各种动物形圆雕、片浮雕和各种几何形玉饰（将玩赏器与装饰器归为一类，是因为二者很难分开。动物圆雕或浮雕可能是用来玩赏的，但这些玉器上往往带有穿孔，而且大都器型较小，佩带在人身上），常见的有笄（jī）、坠、串珠、扳指；其他还有棒形器及龟腹甲等。另外还有一些废料。

饰品是殷墟玉器中的大宗，约占总数的30%。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玉刻刀一类兼做饰品的小型工具。若加上这一类玉器，饰品比例可能接近40%。而各式饰品中，鸟形饰最多，其次是鱼形饰。二者约占玉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将柄形器视为礼器的一种，则殷墟玉器中仅次于饰品的是礼玉，约占23%。如不包括柄形饰，则不到8%。但一部分玉质兵器可能用作仪仗，因此仍然可以认为与礼仪有关的殷墟玉器数量仅次于装饰品。可纳入兵器类的玉器，包括戈、矛、戚、钺诸项，约占16%。包括刻刀在内的玉质工具，则只有不到10%。如果不计刻刀，还不到5%。因此玉质的工具总的来说只占很少比例。

如果不以分类为基础，而从总体上统计，动物形玉饰是最常见的玉器品种，总比例高达22%（其中鸟6%、鱼5%、兔3%，其他



商人制造的玉兵，多半是象征性的。他们没有实战功能，却是拥有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从左至右：玉戈、玉矛、玉戚、玉钺。）



商墓中出土的玉璧与玉环。

动物形玉饰8%)。其他诸种类的玉器要少得多。较多见的有柄形饰17%、戈10%、刻刀7%、璜5%、戚4%、环2%、笄2%，其他均在1%以下。

玉器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有关。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我们估计约90%的商代小型墓葬中是没有玉器随葬的。反过来，凡是中型或大型墓，死者必以玉器随葬。上述提到的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原来曾随葬多少玉器已无从知道，但仅劫余品即十分丰富。有理由相信，商王大墓如果不被盗，其中的玉器定然比妇好墓中随葬的玉器更多。

玉器的材质因用玉者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大墓中的玉器质地明显优于中、小型墓葬中出土玉器。大墓中的玉器通常匀净、光泽鲜艳。而小墓中的玉器往往有杂斑。礼器中的璧、璜、环一类玉器，比较集中地出土于大墓中。



玉器的使用还反映死者的信仰或其他观念。殷墟玉器许多出自墓葬主人的口中。这类玉被称为“琀”。用作“琀”的玉器包括鸟、兔、虎、鱼等动物雕刻，也包括小玉戈、柄形器、小玉琮，甚至还包括一部分残片和废料。有的墓主人嘴中的“琀”还不止一件。部分玉器是在墓主人的手中发现的。如97黑河路M196的墓主



商墓中出土的玉璜。



商墓中出土的玉蝉和水滴形玉器。这类流线型的玉制品，是商人爱玉习俗的反映。



商人雕刻的玉鸟，姿势、神态各不相同。垂尾鸟和收羽鸟皆各异其趣。



玉鱼是商人玉雕产品中的另一大类。他们将刻刀做成玉形。刻刀是随身携带的物品。故以穿孔作为鱼嘴。拴线后即可系在身上。

人手中握有1件龟腹甲造型的玉制品。

石器多属实用性生产工具，殷墟迄今已出土的石器达5000件以上，器类有斧、斨、凿、钻、刀、镰、铲、锤、杵、纺轮、网坠、磨石、弹丸、门臼、调色器等。装饰器和艺术品则有牙璧、璜、笄、珠以及各种动物透雕和圆雕。

殷墟还出土有一批宝石器，主要是绿松石或孔雀石、玛瑙、绿晶制成的镶嵌片；也有少量动物造型的艺术品，如妇好墓出土的孔雀石龟、孔雀石虎和绿晶猴。

陶器烧制

殷墟所获遗物，以陶器最多。在考古活动中，他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野外发掘获得。

包括普通泥胎陶、白陶、硬陶和釉陶四类。



普通泥胎陶器，按其质料可分为泥质、夹砂二类。泥质陶一般都经过精心淘洗。于陶土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砂粒即成夹砂陶，以此可改变陶土的成形性能，增强其受热能力。夹砂陶土用于制作炊器。

瓷土与普通黏土型的陶土不同，它是一种以氧化硅和氧化铝为主要成分而氧化铁含量极低的地下土。殷墟发现的白陶、硬陶和釉陶是用瓷土烧制的。



这是商族人刚刚迁至殷墟不久时，位于苗圃铸铜作坊附近的一个居住点发现的陶器。器类包括（从左至右，从上到下）蒸煮兼用的甗、煮食用的鬲、蒸食用的甑、汲水用的圜底罐、盛熟食用的簋、盛粮食用的深腹平底盆、贮存用的直口大罐。



原始瓷器与硬陶。殷墟陶器中，有三类特殊陶器。其中白陶为贵族所珍爱。据研究，一部分白陶是采安阳附近的瓷土烧制的。与白陶同样珍贵的是釉陶和硬陶。釉陶又称原始瓷。所谓原始瓷，是因为其胎为瓷土，并且表面挂釉所致。殷墟出土此类器物不多，器类仅限于豆、尊等两三种器类。一些学者根据其器形特点，认为殷墟原始瓷是从长江下游传来的。1992年殷墟新安庄M149出土的瓷豆釉面均匀，已具备很高的品质，完全可以称得上瓷器。硬陶的胎质为高岭土（瓷土），但表面无釉。其质地较薄，吸水率低。目前仅仅发现于少量贵族墓中。可见也为珍稀之物。学者多以为硬陶来自长江中游地区，但考古学家曾在殷墟王裕口村采集到硬陶残片。如果殷墟出土硬陶残片，则不排除商族人曾在安阳本地生产硬陶。

就殷墟白陶、硬陶和釉陶（原始瓷）所做的成分分析及硬度、吸水率实验，反映出几种特殊陶器之间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区别。硬陶与釉陶成分最接近，但硬陶所含氧化铁略高于釉陶。白陶与硬、釉陶的差别相对大一些，其主要成分氧化硅含量略低于硬、釉陶，而氧化铝含量高于硬、釉陶。至于物理性能，多数白陶的硬度在4°以下，吸水率在5%以上。硬陶与釉陶的硬度在5°左右，吸水率在3%以下，多数不足2%，因此硬、釉陶比较适合贮存液体。白陶美观华丽，但就其实用性而言不及硬陶和釉陶。





用陶器制作成青铜礼器模样，称为“仿铜陶礼器”。殷墟的晚期，用陶器仿制铜器的情况逐渐增多。这一现象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些学者推测是由于邢邑地区的青铜原料紧张所造成的；另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殷墟晚期随葬器“冥器化”同步，是由于商族人对鬼神不似以往虔诚的结果。也有学者仔细研究了“仿铜陶礼器”的器物类别和形态，认为“仿铜陶礼器”多数情况下都是“重食组合”（以食器为主要随葬品）与商族人传统的“重酒组合”区别明显。因此“仿铜陶礼器”在殷墟的出现，可能标志着商王朝已经失去了政权。留在安阳的“殷遗民”（失去国家的商族人）在西周王朝的统治下，改变了商俗而从周俗，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由“重酒”变成了“重食”。

陶器的制法，一般使用轮制、模制、泥条盘筑、捏制等技术，大部分陶器上遗留有制造时留下的痕迹。许多陶器是通过综合使用上述技术完成的。如殷墟的弦纹陶簋，下部以模制成型，上部则用泥条盘筑并通过转轮制成口沿；圈足也由轮制而成，然后安接于簋的底部，安接前要在簋底部先开出浅槽，以便加固器底与圈足的牢度。

白陶的制法与普通陶器类似，但器表必作精心修磨，装饰也更为讲究。据观察，白陶上的花纹多是在陶坯晾干后刻上去的；刻纹前都经周密设计，花纹的各个单元采用对称、连续等方式构图；主纹和辅纹层次分明，整体装饰效果十分美观；几何形纹样较多是白陶装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考古人员为研究商代日常陶器作准备：清洗陶片、给每块陶片写字、拼接陶片、复原陶器。





陶器记录了丰富的古代信息，是研究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考古材料。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陶器甚至成了考古学的核心材料。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考古学研究就是陶

器研究。近年，以动、植物遗存为对象的微观考古学研究（如同位素分析、骨骼DNA提取、饱粉分析等）发展迅速，但陶器类型学分析仍然是重要的基础研究。

硬陶的装饰手法比较特殊。无论殷墟还是其他地区所出硬陶，器表都保留大面积空白，仅在器物的局部地方如甗的肩部或豆的柄部饰以弦纹或者指甲纹、小方格纹等简单纹饰。

釉陶主要通过挂釉方式装饰器表。晚商釉陶的釉色多是深浅不同的绿色，如淡绿、黄绿、深绿等。多数釉面较光亮，但有的不够均匀，甚至有流釉现象。

如果从功用上划分晚商陶器的类别，大体可以作如下归纳：炊器（如鬲、甗）、食器（如簋、豆、孟）、酒器和水器（如觚、爵、尊、壶、卣、甗、觶）以及其他盛贮器（如罐、盆、瓮）等。另有诸多特殊用途的陶器，如作为建筑材料的陶水管、作为铸铜时盛装铜液的“将军盔”、生产陶器时拍打陶坯的陶垫和制陶印模、捕捞用的网坠、洗浴用的陶爽瓦，与书写或绘画有关的调色器、纺织用的陶纺轮、乐器陶埙以及作为艺术品或者玩赏器的各种陶塑人物、动物造型等。

陶器，尤其是白陶、硬陶和釉陶，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广泛交流，部分陶器甚至是活跃的商品。部分殷墟墓葬中，曾出土一种颜色白而泛黄、质地坚硬、胎很薄、吸水率极低的圆腹硬陶甗（bù）。许多证据表明，这种硬陶甗很可能是某个时候从长江中

游地区通过某种途径传到安阳。1993年，安阳小屯宫庙区正南不远处发现一座商代晚期贵族墓，墓中出土了一对釉陶豆，釉面均匀，釉色为泛绿的浅黄色，俨然是成熟的瓷器。虽然目前尚不能排除这一对瓷豆是安阳本地烧造的，但不少学者推测，他们更可能是从长江下游某个地方流入到商都的。

考古学如何研究一种器物，诸如陶器的产地呢？最简单的手段是观察器物的风格。例如殷墟出土过一种显示出某种“瘿裆”

考古类型学。

“类型学”是考古学家分析陶器的基本方法。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建立在器物形态的基础上。由于技术的进步、审美观念的发展、功能要求和使用习惯的变化，同一种器物在不同时代其形态和花纹也会有所不同。考古学家利用器物的这一特性，



在地层学的基础上，将器物按时间顺序排列出一种器物演变的“序列”。这种序列可以显示出每种器物的流行时间，从而建立起器物演变的一种相对年代标尺，又称为“分期”。陶器在古代用量大，破损率高，而且随着时间的不同，演变的频率也快，因此是一种极具“时间敏感性”的考古科研标本。殷墟作为商王朝长达273年的都邑，长期以来形成的物质文化遗存不可能混在一起研究。所有遗迹和遗物都应在商王朝的年代标尺上找到具体的时间位置。殷墟陶器正是在这一点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类型学经过发展，又延伸到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建立中国古代特别是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作出过重大贡献。





器物类型学与考古学文化分期：“殷墟文化分期”就是根据殷墟居址和墓葬中历年出土文物，用类型学方法排列出来的。如果以陶鬲为代表，则排列结果如上图。图中由左至右排出了殷墟从早到晚不同时期的高代陶鬲的形态演变，显示殷墟时期的陶鬲遵循着档部由高逐渐变低的明显规律。其他文物大抵以同样的方法排定。殷墟文化一、二、三、四期所排出的每种典型陶器的特征，就成为了一种“断代”的标准。即使博物馆内的传世品，参照殷墟文化分期，也能初步断定属商王朝的哪一阶段。无论文物出自何地，只要所出标本的形态一致，即使没有地层关系，也可以判断它是否属于商文化，并在商文化的时间标尺中找到其位置。因此殷墟文化分期具有全国性意义，它为各地同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时间标尺。

特征（即裆部内凹）的陶鬲。在相当于商王朝这个时候，这种鬲大量见于陕西或山西地区。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与殷墟本地风格明显有别的陶鬲是当时从西北地区传入的。

除风格观察外，还有一种常用的科学手段有助于判断陶器的产地。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陶器岩相学或陶器生态学方法。

不同地区的土质、岩石都有其特点，而且不同文化人群对制陶所用的黏土和孪和料的选择也不一样，因此不同地区生产的陶器，其基质和孪和料中的矿物成分是不同的。所谓陶器岩相学方法，是指通过分析和观察陶器的基质和孪和料的矿物成分来判断陶器烧制原料的来源，研究陶器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方式，由此来探讨社会组织、不同区域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其操作过程通常是，选择标本后，将标本用切片机制作出约0.03毫米厚的切片。将切片置于岩石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其基质与孪和料，同时进行单位面积（如平方毫米）内所含某种或某几种矿物的数量统计，以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标本间的基质与孪和料的差别。

这种方法，如果结合传统的器物风格观察法，有时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

不同地点生产的陶器，形态不完全一样。这是分别产自山西（左）和山东（右）的陶器。年代都属于商代晚期。





陶器岩相学分析中，考古人员通过观察显微状态下的陶片矿物构成，了解陶器的原料来源，从而追溯陶器的原产地。

左：宽边鬲残片，右：陶器岩相学分析中的陶器切片显微结构。

殷墟的许多居民点中，都出土有部分宽边式陶鬲，这种鬲在制作过程中，口部被制器者用泥条包在外侧加固，故又称“包边鬲”。从风格上看，包边鬲比较流行于山东西部地区。这种鬲在安阳出土，究竟是安阳的陶工模仿了山东风格？还是他们本来就是山东地区烧制后流到安阳的呢？

研究者专程到“包边鬲”出土较多的山东菏泽地区调查，收集山东“包边鬲”的标本，然后以安阳殷墟出土的“包边鬲”与之对比。研究表明，殷墟出土的“包边鬲”所使用的胎土和屙和料都不是安阳本地区的，而与山东的样本接近。这就表明，所谓“包边鬲”，如果不是通过贸易流入安阳的话，很有可能反映了3000年前的人口流动。而考古发现表明，安阳殷墟出土的“包边鬲”，往往是一些年代最早的商代居民点内出土的。这或许暗示，当初迁都安阳的“殷民”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山东地区迁徙而来的。

有时候，小陶片可以解决大问题。

繁荣的制骨业

商代是尚不懂得冶铁的时代。青铜冶铸虽然早已呈现出一派鼎盛和繁荣，但青铜制品更多地限于礼器和兵器。日常生产领

域，石器、骨器和木器仍然显得比铜器更为重要。

如果不是经年累月的发掘，我们很难想象商代的制骨业会达到何等程度。

殷墟可以确认的制骨作坊至少有4处。其中最重要的有遗址东部的大司空村制骨作坊和遗址西部的北辛庄制骨作坊。二者都位于殷墟一般的“族邑”内，应属殷代宗族制度中族一级的手工业作坊。殷墟宫殿宗庙区附近发现一处大型骨料坑，内出各种兽骨数十万块，而以牛的弃骨最多。该废骨坑可能是一处殷代大型屠宰场，也可能附近存在一处制骨作坊。该作坊可能属王族直接拥有或控制。

制造骨器的材料以牛骨最多，其他还有猪骨、羊骨、狗骨、鹿骨等，偶尔还用人骨。各类骨材中，肢骨使用最普遍。肢骨材



锯和雕刀：商族人的骨制品极其精制漂亮，但制造骨器所用工具却十分简陋。1973年，殷墟西区的北辛庄制骨作坊中，发现一批制造骨器的骨料和半成品。其中部分骨料上还留有清晰的锯痕。同时发现的还有一把青铜短锯和一把平刃的青铜雕刀。正是这些简陋的工具，商族人雕刻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骨制艺术品。刻花骨管便是其中之一。



型较好，骨壁较厚，易于开取和设计。牙类材料通常也取自上述动物，并在制骨作坊中加工成器。

制骨用的工具有锯、刀、钻、凿、磨石、骨尺等。锯、刀、凿、钻一般系青铜器，不过也发现过制骨用的石刀和石钻。磨石一般取天然砂质石料。

殷墟出土骨器数可与陶器等量齐观，大致分为工具、用具、武器、乐器、装饰品、艺术品诸类。工具类骨器主要有刀、凿、锥、铲以及用于制陶或铸铜制范的刮泥器、雕刻器等；用具类骨器有觚形器、皿形器、梳、匕、勺、针等；武器有戈和镞（箭头）两种，数量极大，仅骨镞即已出土20000件以上。目前已发现的骨质乐器实物的只有埙1种，而装饰品则发现了笄（发簪）、珠、环、刻花骨饰等。骨制艺术品主要是人、虎、鸟、蛙以及兽面形象的雕刻品。另有一部分骨器目前尚不知其用途。

制骨作坊中同时还制造角器和牙、蚌器。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制骨作坊遗址中，曾发现角料250余块，鹿角占各类角料中的绝大

骨匕一端有刃，一端可握。商族人吃肉类食品时，它是理想的进食工具。另一种重要的骨制生活用具便是骨针。商族人的纺织业已比较发达，可以生产出不同面料的织物。在非铁器时代，兽骨可能是唯一可以轻易磨出细小的针身和穿线的针孔的材料。衣裳缝纫形成了对磨制骨针的大量需求。





商族人的骨制品中，最抢眼的是装饰品类和艺术品类。骨笄（骨簪子）是所有骨制品中数量最多的，出土总数在2000件以上。我们可以设想，在没有理发概念的商王朝时期，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要束发。骨制的发簪既轻巧又美观。而骨制的配饰，如骨鱼、骨管，也深受人喜爱。商代制骨业的发达，与社会的骨制发簪的广泛需求有直接的关系。

多数。牙制品在晚商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原材料主要是象、猪、獐等类动物的长牙，象牙是最主要的；牙料可从当地获取的动物身上截取。

蚌器的生产仍然属重要行业。考古发掘中常常发现有大量蚌制品，除一部分生产生活实用器或少量武器外，蚌的最主要的用途是制作各种各样的饰物。



商人用过的木工工具。商人能够制造复杂的木器。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车。制造一辆马车，不仅要处理强度高、直径大的木材，而且要处理复杂的榫卯结构和应对较高的木材表面刨光要求。部分商族人的工匠，死后将他们生前用过和工具随葬，给我们留下了3000年前的成套木工工具。商族人的一套常规木工工具，有斧、斨、凿、削刀、雕刀、三棱刀等。



木作与髹漆

殷人普遍使用漆棺或漆椁下葬，车马坑中的马车普遍都髹（xiū）漆，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很普遍。在殷墟西北冈王陵的一座墓中出土的1件圆形漆盘内，发现漆豆7件，并且还发现髹漆的“抬盘”。商代漆器以木器和皮革为胎骨，如木棺、木豆、木盘等。另一座王陵大墓南墓道北段的最下第一层发现有两件“皮甲”，其上用漆涂饰出美丽的菱形和卷枝纹图案。

最常见的兑漆颜色是红、黑、黄、白四色，这也是晚商木棺外表的常见颜色。兑色后的漆常常用来进行彩绘。不少殷墟墓葬中的棺木外表可以看到白地红彩、黑地红彩或红地黑彩的花纹装饰，但图案全形多不可辨。20世纪70年代小屯西地还发现过漆绘

陶片。晚商时期的髹漆业还包括漆器镶嵌工艺，用于镶嵌的材料主要是蚌片、绿松石片、龟片等细小饰物。

木器有工具类的铍、耒，仪仗类的“杆”，用具类的抬舆、盘、豆，置放祭品的案，乐器类的鼓和鼓架，马车、棺槨也属木器类。

迄今殷墟仅发现1件竹器，1990年出自郭家庄160号墓中，系竹篾的底部，篾条均匀、编织细密。

华丽的织造

殷墟曾多次发现圆雕的玉人和石人形象，其中多数都有衣裙。如西北冈1座王陵所出跪坐石人、妇好墓所出的跪坐分尾玉人以及传出四盘磨的箕踞（jù，蹲或坐）石人等，都有华丽的着装。证明商代有着发达的纺织业。

商人习惯以织物包裹铜器来随葬，许多出自殷墟墓葬的铜器的表面都遗留有商代织物的痕迹，经鉴定多为丝织品，有的则属麻织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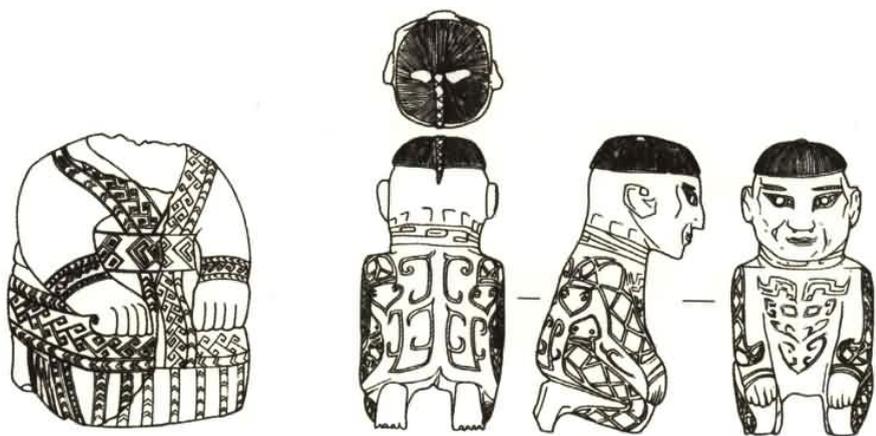


玉器上的
丝织物痕。

商人给死者下葬时，往往以织物将随葬品包裹起来。

一些被包裹的物品表面有时会留下织物的印痕。这件下葬时被折断的玉戈表面即有清晰的织物痕迹。





商代贵族服饰上的华丽图案。

晚商丝织品最常见的织法有三种：一是普通的平纹织，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平方厘米30—50根；二是畦纹的平纹织，经线比纬线多出1倍，细者每平方厘米经72根、纬35根，粗者经40根，纬17根，由经线显出畦纹；三是文绮织，即地纹是平纹组织，而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

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中，部分青铜器的表面印有织物痕迹。据研究可分出5个品种，即平纹绢、朱砂染色的缟、缣（jiān）类和绢类织物、回形纹绮、罗类织物。黏附在妇好墓一件铜器上的麻织品为平纹组织，细密者每平方厘米经22根、纬12根；粗疏者每平方厘米经12根、纬10根。殷墟后冈圆坑也发现过成束的丝线和麻布，其中麻布每平方厘米只有经10根、纬8根。同坑中还发现一块麻布已用一段麻线缝成袋状。殷墟西区发现的彩绘画幔和殷墟武官村北地发现的带几何形花纹的彩绘织物，可能都是麻织品或丝织品。

玖

马车遥伴轻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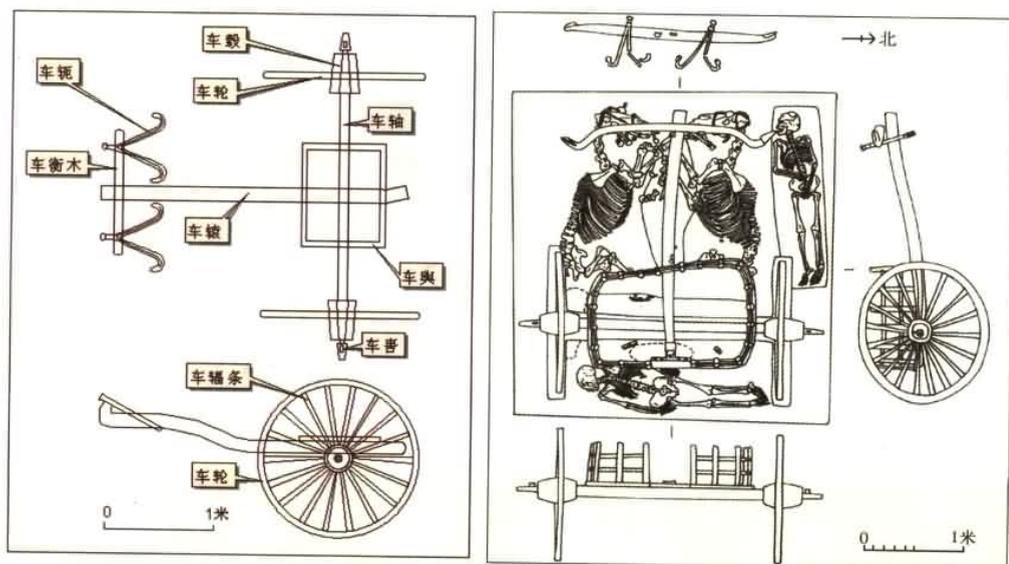
水陆交通

双足行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今天人们以汽车代步，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3000年前的商王朝虽然没有汽车，却是一个依靠马车代步的时代。

商代马车的宽度，如果以两轮之间的距离来计算，通常是2.2—2.4米。这种车都是两马所御。近年发现一条商代道路，路

商族人的马车，高大而复杂。其部件由双轮、一轴、一厢、一辕、一衡所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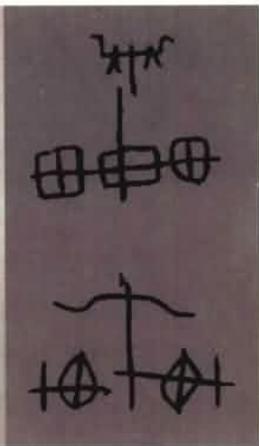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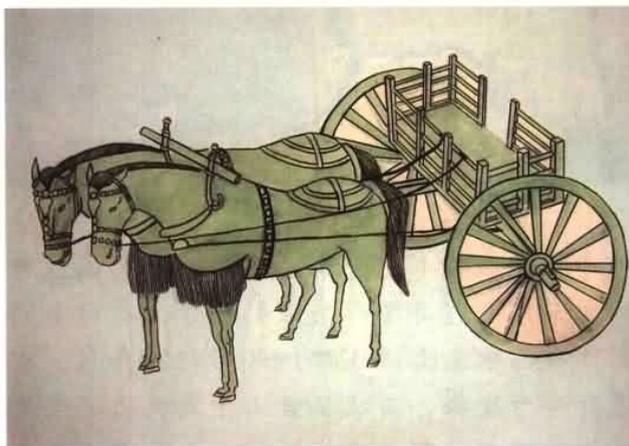
车衡上再套双轭，轭套在马的肩部。驭手驱动马时，马便牵引车衡，从而带动车辕，车辕再拉动车轴，车轴引起双轮运动。整辆车便会前行。车厢又称车舆。架在辕、轴相交的部位，又正好在轴的中心。既平衡，又稳定。从尺寸判断，一辆商车可乘1—2人。双轭的存在，是由于商族人的车由双马驱动。古语有“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说。其中所说的“驷马”，指的是四马驱动的车。四马驱动的车在西周时期已经普遍，后来甚至发展到所谓“天子驾六”。即天子的乘车以六马驱动。商王朝时代是否有四马驱动的车仍然是个谜。殷墟宫庙区的乙七号宗庙前曾发现过四马同坑的车马坑，但由于发掘是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限于当时的发掘经验和技術，没有辨明埋入坑中的是一辆四马驱动的车还是两辆双马驱动的车。





甲骨文中的车字，几乎就是一幅画。它表现了轮、轴、辕、衡，甚至舆（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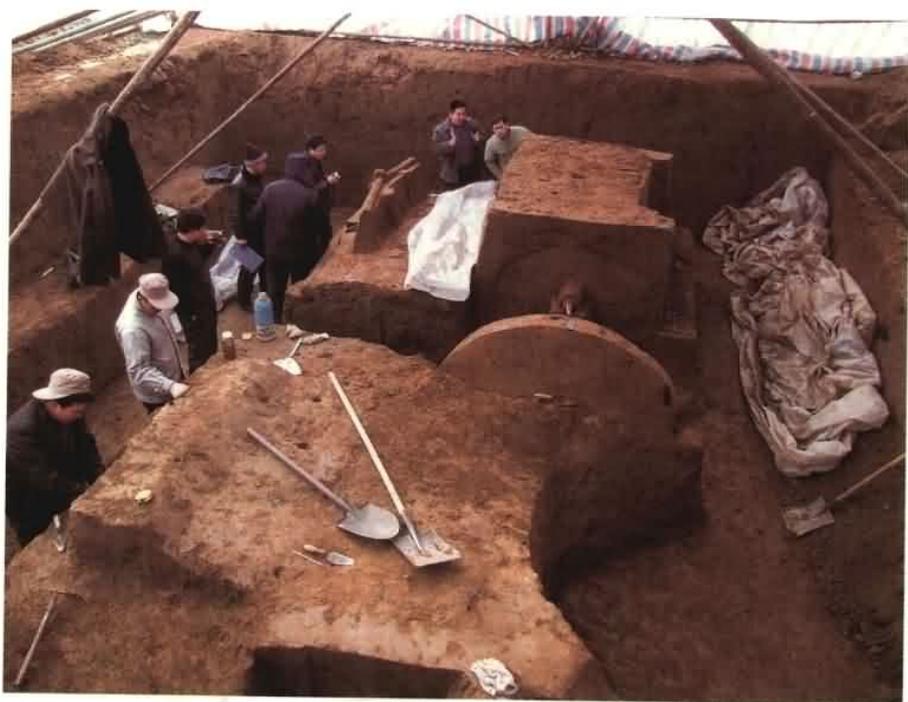
贵族的马车，连马身上都有华丽的装饰。



面有一种轨距只有1.6米左右的车辙。可见商代的车并不仅仅只有一种。

有关商代马车的了解，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的马车都是直衡的。但甲骨文中的“车”字是象形字。学者们在甲骨字中发现，一些“车”字是曲衡的。后来考古发现果然找到了曲衡车。车舆的解读也是如此。早期发现的商代马车都呈方形舆，一些研究者颇以为商代的车都是方舆的，但后来在一处考古工地中，实地清理出清晰的圆形舆。证实





中国考古学中的车马发掘技术，受到各国考古界的高度评价。殷墟早年发掘的马车，也曾有不少失败的例子，有时会将朽没在土中的木质部件当作原生土清理掉。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在河南辉县进行考古发掘，首次从黄土中剥离出完整的马车。随着对马车结构的逐渐了解，更多的技术人员掌握了发掘古代马车的技巧。安阳是全国懂得古代马车发掘的技术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

商代确有圆輿的马车存在。

马车的主要部件是木质的。车辆埋在地下，经过3000余年早已朽烂成灰。为什么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现”商代的马车呢？

这是因为马车入土后，木质部件朽于土中，使得土质的颜色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华北地区，被大面积的黄土所覆盖。黄土的特性是颜色单一，而且粒度结构比较好。朽没在黄土中的有机物，可渗入黄土并保存在黄土颗粒中。有机物朽烂后，通常呈灰色或黑色。像马车这样的体量相对较大的木质部件，朽烂并渗入黄土中后，局部改变了黄土的颜色，使得有马车部件朽蚀的



五辆马车一字排开，用来陪葬死去的祖先。这是2005年考古学家在殷墟西区发现的一个场景。死者是商王朝的一位族长级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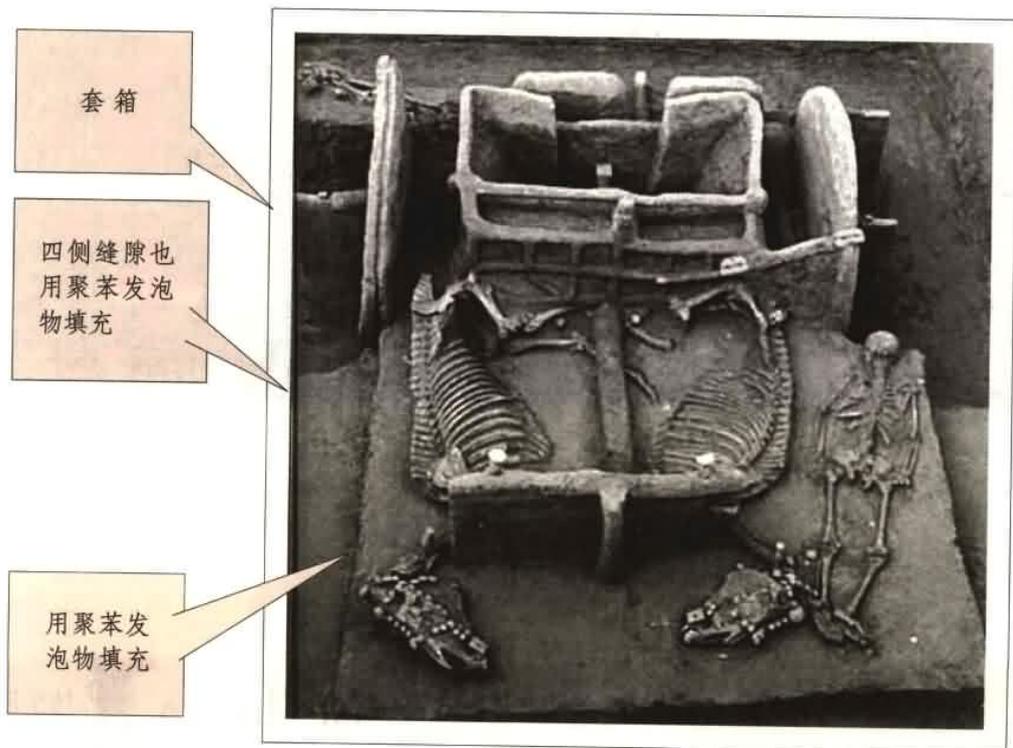
部位，其颜色与周边不同。考古学家便可以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清理，去掉部件之外的黄土，将整辆的马车剥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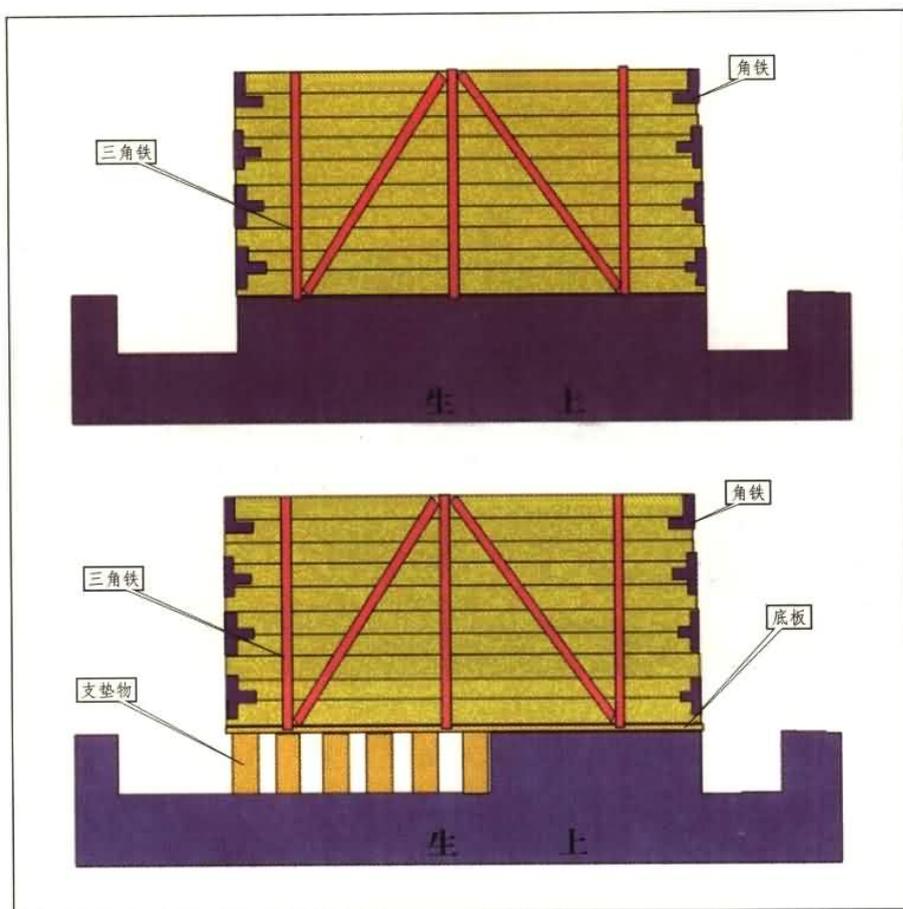
目前中国最早的古代马车实物即殷墟所出。故一些学者认为，马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发掘一辆马车，通常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马车体量极大。从土中剥离出来后，大都会就地保存。但如果原地保存不具备条件，则可能动用大型吊车，将其从考古工地搬运回室内进一步研究，或者直接进入博物馆向观众展出。

马车的搬迁是一个复杂过程。搬迁之前，先用一种被称为三胍树脂的化学药剂将马车整体加固。周围以软性材料填充，再以石膏固定，周围再以细土填充（如果可用于搬迁的吊车和运输车承载力不足时，还要将马车先行切割）。然后掏空马车周围包括底部的原生土，再用条型或板型木材将马车整体包装好，用钢材将木箱加固。最终用大型吊车和运输车将其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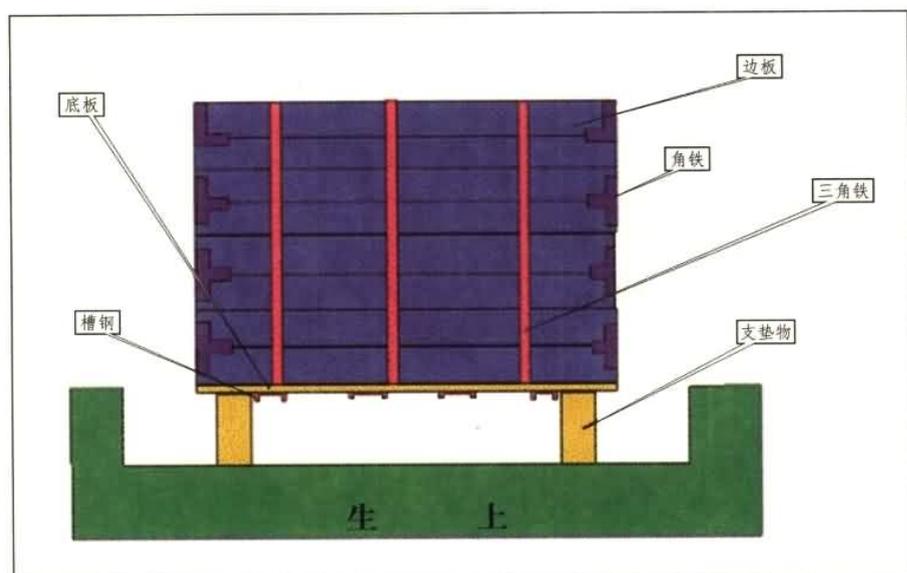
马车搬迁过程中的套箱俯视图。





套箱侧视图
(开槽与边板
固定)。

套箱正视图
(底板楔入与
支撑)。



套箱侧视图
(底板与穿
绳槽钢)。





将大型考古遗迹从考古工地搬迁至室内的场面很壮观，也令人激动。这是殷墟的考古人员将一辆车马坑搬出发掘地点的场景。



商代不仅马车飞驰，水上交通也很发达。甲骨文中屡见“舟”字。1991年殷墟花园庄大型甲骨坑中，有一片甲骨载有“癸卜，其舟般我人？一”（如图）。舟字是典型的象形字，卜辞中般字或许与“渡”字词义相近。这是商族人享受马车速度的同时，又拥有舟楫之便的直接证据。

拾

经济史上的海贝时代

货贝与贸易



商王朝是经济史上的“海贝时代”。现代货币有纸币、金属币两种，商王朝时期，人们对纸还一无所知。即使在纸张发明以后，质量较低的纸尚难以担当货币的职能。中国最早使用纸币，据说始于宋代，称为“交子”。此前一直是金属货币，如铜钱、黄金、白银。

商代以殷墟为中心，形成了包括都城、方国或诸侯城邑、大型聚落、普通村邑在内的多级聚落结构。不同层级的聚落尤其是城市聚落之间或聚落内部，形成商品交换市场。

当时的贸易形式，既有以物易物的交换，同时也有货币贸易。前者可能通过粮食等农产品或部分自产的手工产品进行交易，后者则通过货贝来进行，而海贝是当时的通行货币。

甲骨文中，常见“赐贝”、“取贝”的记录。青铜器铭文所记赏贝之事者也甚多，总数不下20件。被赏赐者受贝以后，往往以贝为资金铸造1件铜器并作铭记事以示永久存念。这些文字记录，反映了贝在晚商时期具有特殊的价值和用途。这与《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的记载是一致的。

货贝形态小巧，易于分割，便于携带，材质特殊，无法仿造，且因产地远离中原而平时不易获取。这些特征正是作为流通货币的重要条件。商族人将海贝简单加工后（在壳面的前端琢出一个近圆形或椭圆形小孔），即用于交易。

在海洋生物分类学上，货贝是诸多海洋贝类中的一种。中国学者曾经与日本学者合作，调查商代海贝的来源，结论倾向于认为商王朝的海贝是从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获得的。因为今天的东海，包括山东省沿岸的海域是并不出产商族人使用的那种体形较小、视觉观感很漂亮的货贝。商族人有时也使用其他种贝类，如虎班贝、皮特文蛤等，但尚无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贝也曾作货币使用。

除自然海贝之外，商族人还制造过少量贝的仿制品，仿制材料包括铜、骨、蚌、石等数种，均有考古实物出土。

贝作为货币至少有“枚”和“朋”两种计量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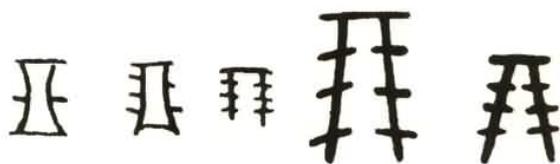
枚是最小的计量单位。晚商墓葬中，以贝随葬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殷墟平民墓中的贝，出土时位置通常在墓主人的口中、手中、

腰部或者足端。数量无一定之规，有1枚、2枚、3枚、4枚、5枚、6枚乃至10余枚诸数。贵族墓中随葬贝的数量则可达数十、数百甚至数千枚之多。

“枚”是今人对单个贝的称法，商人是否将单个的贝称为“枚”，尚不得而知。但“朋”则在甲骨卜辞中实有其字。

甲骨文中，“朋”宛若项饰，犹如若干枚海贝以线绳串起。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曾发现1具人骨架的右盆骨上有贝3串，第1串贝20枚，第2串10枚，第3串5枚，3串都是5的倍数；若以此推测商代每1朋贝的数量，则最大可能是每朋5贝。然而近世多数学者都认为，商代的贝作为货币，应是10枚为1朋。王国维解释道，古制贝玉都是5枚1系，合2系为1朋；郑玄5贝1朋说，当为1系之数。若“10贝为朋”的观点反映了商代货币计量的实际，则上述一串5枚贝可以理解为“半朋”，一串20枚贝则是两朋之数。

“朋”是最大的货币单位，屡见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商王赐贝于臣属时，通常都是赐贝若干朋。“朋”的价值的大小，因时间有所变化；其间价值的升降关系，可通过部分有关商王赐贝于臣属的卜辞或青铜铭文加以推考。例如殷墟文化第一期时，



商代甲骨文中的“朋”字，是两束海贝的象形，是商王朝的货币单位。



“成鬲子鼎”是1件商代晚期铜器。1959年出自安阳殷墟后冈的一个祭祀坑中。该鼎的重要性在于其腹部有长达30字的铭文，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掘的字数最多的商代青铜器。这篇铭文简要地记载：商王赏赐给“成鬲子”贝20朋，“成鬲子”很是感激，用商王赏赐的20朋贝制作了1件圆鼎以示纪念。这条记载使得学术界对商代以“贝”为货币深信不疑。



商王武丁赏赐贝时只用一朋，但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时，商王的赏赐常常达到二十朋或百朋。这一现象应不是单纯的恩惠多寡之别，很可能是商代某种程度的货币贬值的反映。

殷墟出土的铸有“锡贝”铭文的青铜器很多，著名的有“戊嗣子鼎”、“妇渔鼎”等。所记都是商王向臣下赏赐海贝，然后下属用贝铸造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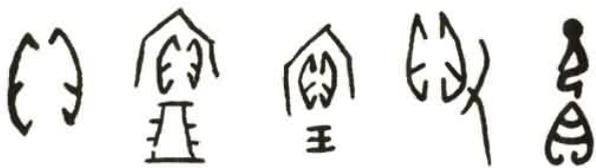
自商代至西周，直到后来流通金属刀币、圆钱之前，货贝仍然是货币交易的主要流通物。因此，西周时期同样有不少国王赏赐重臣的例子。这些重臣受到国王“赏贝”后，通常也以所赐贝铸作铜器。例如周初铜器“遽伯还簋”，器主获赏后即以14朋贝铸造了1件铜簋。

由于贝的价值尺度得到社会公认，晚商时期的贸易活动相对来说比较活跃。殷墟出土的一些物品，很可能是通过远程贸易得到的。如大部分铸铜用的原料可能系自长江下游地区输入，大部分玉料则来自新疆和田，而作为货币的贝本身即产自遥远的沿海，占卜用的灵龟既有内陆龟也有海龟，殷墟还发现过鲸鱼骨。

贸易可能与贡赋制度以及大规模的掠夺并存。

贸易尤其是远程贸易离不开交通。晚商时期的陆路、水路交通都很畅达。商王可以在宽广的道路上驱车出巡、狩猎、征讨四方。商王室与诸侯方国之间、诸侯方国与方国之间、大小城邑之间以及村落与村落之间人员物资往来频繁。

甲骨卜辞中“车”字、“行”字使用频率甚高，此二字皆与交通有关，可见商王是乘车往返于居住地与田猎区之间的。通常认为晚商时期商王的田猎区在今沁阳一带，足证今安阳与沁阳之间存在通畅道路。卜辞关于商王朝征淮夷、伐荆楚、讨土方的记录，显示出商都殷墟通往东、南、西、北诸方位都有陆路交通。



甲骨文中的“贝”字，是货贝的象形。商代的“宝”字，即屋宇之下贮存着数以“朋”计的“贝”。即使是“得”字，其原意也是手中有贝。一些青铜器上，甚至还出现过人

跪立于货贝之上的铭文，几乎就是最古老的“金钱崇拜”的形象代言。这些字，足见货贝在商族人心目中的地位，都与货贝作货币流通在商代社会分不开。



占卜

未来可以预知

在商族人的眼中，未来是可以预知的。预知未来的方式，主要就是占卜。

占卜是如何进行的

商人占卜的材料有龟和牛肩胛骨两种。通过考释卜骨和卜甲上的文字，并观察牛骨和龟甲这两种灵物上的痕迹，可以大致复原商人的占卜过程：

I：收集龟甲或者动物的肩胛骨。

II：将龟甲锯开，修整腹甲：去掉其表面的胶质，然后锉平其高厚不平之处。如果是牛的肩胛骨，首先是锯去白突，锉平背面的高凸处。胛骨的正反面、锯削处和其他地方还要加以刮磨。

III：对甲骨进行钻凿。有时只钻不凿，但多数钻凿兼施。通常先钻圆孔，再凿槽。槽的形状通常作梭形。

IV：用樵火灼烧甲骨的背面。凡钻过的甲骨，必于钻处施灼，凿过的则必于凿旁施灼。灼过之后，正面会出现裂纹，称为兆纹或卜兆。卜兆，即为预知未来吉凶的依据。不过迄今尚不清楚什么样的卜兆是吉兆，什么样的卜兆是不祥之兆。

V：占卜之后，将所卜之事刻写于卜兆旁边。谓之卜辞。刻写卜辞是占卜的最后一道程序。

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叙辞（记述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命辞（陈述要贞问的事情）、占辞（因兆而定吉凶）、验辞（占卜之后记录应验的事实）。例如：

[叙辞]戊子卜，般，[命辞]贞帝及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辞]王占曰：丁雨，不X辛。[验辞]旬丁酉允雨。



商人以玉雕刻成的龟。



商族人以干支纪日，每十天为一旬。由于未来可以预知，商族人养成了十天一卜的习惯。这种卜辞称为“卜旬卜辞”。这两片卜辞，都是商族人用来卜问未来十天的吉凶的。左条读：癸亥卜狄贞旬无祸？释为：癸亥这天狄贞，未来十天不会有灾祸吧？右条读：癸巳贞旬无祸；癸未贞旬无祸？读：癸巳日占问，未来十天不会有灾祸吧？癸未日占问，未来十天不会有灾祸吧？

殷人有事问上帝

占卜几乎是商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但凡遇有大事，必向逝去的祖先或其他神灵卜问。

加拿大人明义士从20世纪30年代起常驻安阳传教。当年曾留下一首七言打油诗，题名“遇殷墟”：

柳树出芽骑白马 白马走时顺洹河
拾破陶器寻先古 小孩引到出古处
盘庚殷墟无痕迹 年前花根白地立
余思盘庚它兹邑 商人做事问上帝

在这首奇怪的打油诗中，明义士将殷人占卜习俗与他所从事的传教活动联系起来。甲骨文考释证实，商人文字中果然有“帝”字。而且帝是重要的祭祀对象，表明殷墟商人存在“天帝崇拜”。甲骨文中崇拜的卜辞很多：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这是卜问帝是否会保证全年的降雨？

上帝在商人心目中掌管着风云雷雨，主宰天时、人事，可降福或降祸于商王。故商王建造城邑、出师用兵、年成好坏，都要问“帝”。

商人心目中的“帝”，与明义士心中的“上帝”耶和华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帝”在商人心目中并非孤立的神。“帝”





明义士像。明义士是20世纪初加拿大基督教河南长老会派往安阳的传教士。他在安阳期间，一面传教，一面收集殷墟出土文物。最终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文物收藏家。与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同为加籍传教士的怀履光）不同的是，他对中国文物怀有真挚的感情，主张文物留在中国。他的行为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后来，他被聘为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教授。

的手下还有风、雷、电、云、雨诸神，他们被称为“帝臣”。甲骨文中“帝五臣”的记录。有时商王也向这些“帝臣”问事。

商王向“帝”或祖先询问的事情除气候、祸福外，更多的是未来某一时间内的吉凶、重要事务是否能够成功等。

除“帝”以及“帝臣”外，商人问事的对象还有自己的“祖灵”。他们认为，死去的祖先会成为神，他们有时可以在“帝”左右为宾，将人间的愿望转告于“帝”。自然，死去的祖先同样能降祸降灾或赐福人间。

“乙酉卜争贞，佳父乙降凶”，“贞不佳父乙降凶”。

这是说乙酉这一天，贞人争占卜，询问祖先父乙是否会向人间降凶？

所以甲骨文中问事于祖先的卜辞非常多。中国近世传统的民间信仰几乎都可以在商代找到源头。

商人以10日为一周，称之为“旬”。他们常常向祖先询问：未来的十日内是否吉祥？

其他问事例子还有：

遇有战事，商王也会问战争能否如愿取胜。

睡眠获梦，商王要占卜是否做的是美梦等。

配偶怀孕，商王会卜问是否能够顺利生产。

.....

这也是一片卜辞，而且是连续“卜旬”。即每十天一卜，占问未来十日的吉凶。

它记录了当时的纪时习惯，也反映了商族人的宗教信仰情况。



拾貳

葬俗

棺椁为屋，事死如生



土葬，以棺槨为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殷人通常以土葬方式将死者葬入墓地中。他们的墓葬大都取北偏东 5° — 15° 为其朝向。据说这与殷人起源于今河北一带有关，饱含有对祖先念念不忘的意思，或者说就是祖先崇拜的反映，因为殷墟正好在河北南部的南偏西地带。也有学者说是因为商人的方位坐标中的正北本来就相当于今天的北偏东 10° 左右。

落葬过程几乎程式化。

首先是装殓。虽然死者衣衾难以保留下来，但棺内用于装殓死者的其他遗物发现很多，如饰身的玉环、玉戈、玉鸟、玉虎、玉牛、玉鸚鵡、玉蝉等，死者生前的随身用具如铜戈、铜刀、铜铤、铜凿、铜端刃器以及沙石条等。有的还发现可能是死者生前所宠爱的小玩物，如殷墟西区1713号墓中发现一批两种不同颜色的小石子。代表财富的海贝比较普遍地用于装殓，一般置于死者的口中、手中或者脚部。

装殓的同时，还需在野外选定位置，挖好墓穴。墓穴的形状和大小依死者身份而定，或为简单的竖穴，或加筑墓道。平民墓葬一般为2—3平方米。备穴还包括在墓底中部开制腰坑，通常一穴只开一个腰坑；有的大墓也开有多个腰坑，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王陵即开有9个腰坑；但不是每个墓穴都必须开腰坑。腰坑的开造与墓穴的祭奠活动相伴随，墓穴祭奠是整个落葬礼的一部分，以杀牲并将牺牲埋入腰坑为核心内容；所用牺牲主要是狗，一些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用人。

奠坑之后是筑构槨室。通常先在墓底按一定间距平行放置几根原木，上铺底板，然后在底板之上叠筑条木或木板，形成“亚”字形、“井”字形或长方形槨壁。多数墓葬的槨室与墓壁间留有一定间距，形成二层台，有的则紧贴墓壁往上叠。槨室的有无及大小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商王、王室成员以及其他高级贵族的带墓道大墓、大型长方形竖穴墓等，无一例外地都有棺有槨；宗族或家族墓地中的中小贵族墓葬一般也筑槨室；普通平民的墓葬只用单棺而不筑槨。因此，晚商时期绝大多数墓葬仍然是单棺墓。1969—1977年所发掘的殷墟西区近1000座墓葬中，筑有槨室的共47座。有的木槨表层已被烧成木炭，或许是商人筑槨时有意识地炭化木槨，



典型的商人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考古人员正在发掘一座小型商代墓葬。死者是一名小贵族，只使用了单棺下葬，尸身已朽。因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随葬品中仍然有铜器。



觚、爵是配套使用的酒器。商族人死后的随葬品以酒器为核心，通常至少要随葬一觚一爵，成为完整的一套。图中的三套觚、爵分属殷墟不同时期。最早的一套距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不久（上），最晚的一套已经到了商代末年（下）。200余年中，商族人的重酒之风，从未衰退。



以达到防潮的目的。《礼记·丧大记》载：“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目前所知的商代棺椁材质有栎木、黄连木等，棺椁用材或许与墓主人的身份也有一定关系。

棺木抬至或运至墓地前，一般已经筑椁完毕（如果有椁的话）。接下来是将棺木置于椁内，没有筑椁室的墓葬，则直接将棺木置于墓底，贴土而放。因此也有的墓事先以原木横于墓底而后置棺，原木起承托棺材的作用。

棺椁俱全的墓葬，沉棺后往往会在棺与椁之间留下若干空间，有时随葬品即被置于其中。如果有椁的话，沉棺之后必须加盖椁顶板，随后是在棺椁顶板之上或二层台上的置器过程。各类器物往往盛有食品，主要是落葬过程中用于祭祀的肉食，清理时或残存骨骸于容器内，或散落于容器附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殷墟小屯西地的一座殷墓，该墓出土随葬品20余件，其中墓主人头端有1件漆盘，该盘下压陶鼎、陶尊、陶卣各一件，

2000年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清楚显示了商代贵族墓中的棺、椁结构以及殉葬人。奇怪的是，地位高的死者，其骨骼都普遍保存不好，甚至全部朽烂。反倒社会等级低的普通人，特别是直接埋入土中的几乎没有社会地位的成员，或者大墓中的殉葬人，其骨骼不仅常常保存完整，而且出土时色泽新鲜光亮。这是“高贵者”始料未及的。





商代墓葬中的随葬品越丰富，死者的社会地位通常也就越高。部分商代贵族死后随葬数十件及至数百件青铜器。商王武丁配偶妇好死后，墓中所出青铜器总重达1.6吨。2004年，考古队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一座编号M303的商墓，出土大量青铜器。这张铜器“全家福”便是M303号墓主人死后的财富。（岳洪林 提供）

盘内还盛放着牛腿骨和羊腿骨。少数墓葬还在墓穴头端或脚端专门掏有放置随葬器物的壁龛。置器行为，是整个落葬礼仪的一部分，有时会有意识地损坏或砸碎随葬品，这种习俗可能与死者的死因有关。

此时，落葬过程中最残忍的部分登场。这就是杀殉。

杀殉是当场杀死“牺牲”以向死者表示崇敬之意。

牺牲即“祭品”，可以是动物，也可能是人，而且以人为牲似乎更受到商人推崇。殉人和殉牲一般在盖上棺槨的顶板并修好二层台后才举行。

杀殉仪式完毕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埋藏”，即封填墓穴。

商人对墓葬的填封过程十分重视。复填入墓穴的填土，均需逐层夯打，夯打的同时还常常伴有祭仪。王室成员墓和贵族墓尤其如此。因而晚商墓葬的填土中时时可见殉人或殉狗的现象。有



的墓葬填土中还发现有多层随葬品或多层人骨的现象，如著名的武官村大墓的墓室填土中有人头骨34个，分三层填葬，头骨的面部都朝向墓室中央。

填土夯至地表后，是否意味着落葬过程的终结，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礼记》等周秦文献中曾记有“虞祭”一事，虞祭乃指落葬之后的安神祭礼。《礼记·檀弓下》：“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若晚商时期果如《礼记》所载，日中而葬，葬日虞祭，那么，虞祭亦应视为其落葬礼的一部分。虽然从时间上看，虞祭与落葬礼相连贯，但虞祭活动是在落葬之后进行的，其行为结果难有踪迹可察。

俯身葬是殷人埋藏习俗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指的是死者采用俯身入棺的葬式埋藏。关于这一葬俗目前已有多种解释，或认为

俯身葬只是一种特殊的葬俗；或认为俯身葬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有关，采此葬式的死者都是奴隶；或认为俯身葬是由于特殊的死因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俯身葬的原因很复杂，应该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直到近年，有关这一问题才有了一个初步答案。体质人类学测量发现，以俯身方式葬入族墓地中的殷人，其性别普遍为男性。特别是1993年，学者现场鉴定了殷墟200余座正常死亡者墓葬中的56座墓中的人骨（其余人骨架腐朽过甚无法鉴定），证实俯身葬全部为男性。不过，发现俯身葬与性别有关仅仅是判明了一种现象。该现象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座贵族墓中，墓主人尸骨早已腐烂，空留锈迹斑斑的铜器。墓中一件硕大的铜钺，纪录着这位早已化作尘土的死者，曾有显赫的权利。

拾叁

斧钺下的生灵

人殉与人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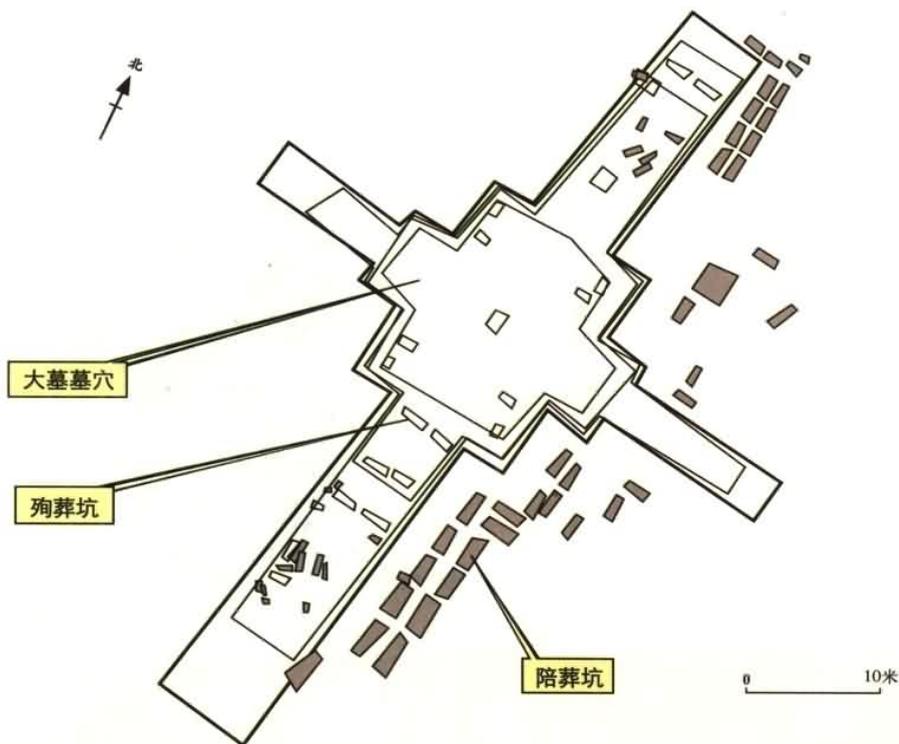
商族人笃信鬼神，常常为了满足死者或神灵的“意志”而残杀生灵。被杀戮的有人，也有牛、马、羊、犬、鸡等各种动物。这些被杀戮的生命被称为“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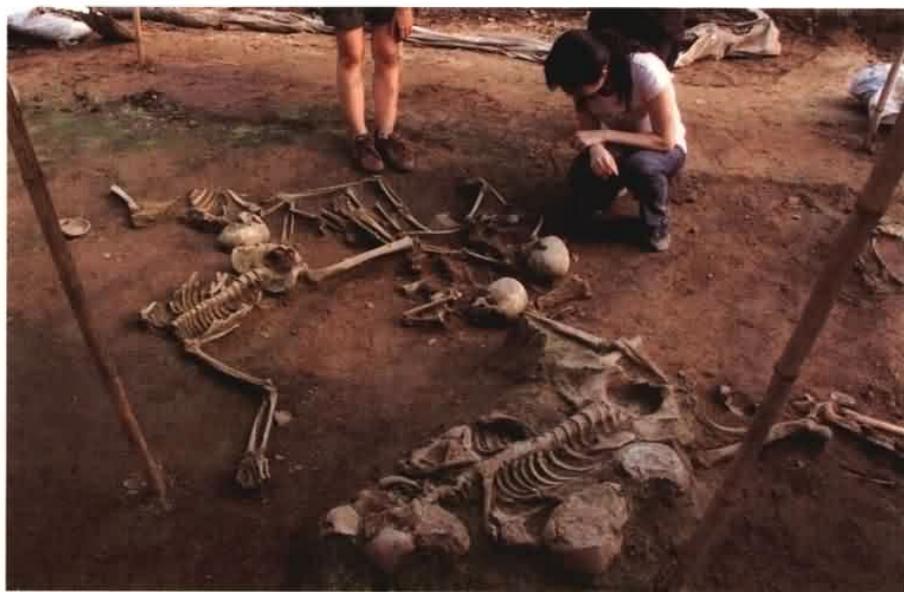
以人为“牺牲”通常发生在殉葬或祭祀两种不同场合，称为“人殉”或“人祭”。

虽然都是杀死活人以为“牺牲”，但人殉与人祭之间有着明确区别：

人殉的发生时间通常在埋葬死者的同时或稍后。人祭虽然也可能是在埋葬死者的同时进行发生，但更多的是落葬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殉人往往与死者同穴，或者在死者坟穴附近，而人祭所用“牺牲”虽然有部分与死者同穴者，更多的却

殷墟王陵区第1001号大墓（HKPM1001）墓穴、墓道、以及墓旁的殉葬坑或陪葬坑。这些坑形状、大小并不一致，所埋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坑中埋藏的都是人。推测他们是商王近侍或至亲之人。与祭祀坑中的死者有所不同。





面对残忍的祭祀场面，工作人员感慨万千。

是埋在死者坟穴前部，保持一定的空间间隔。人殉可以有随葬品，人祭一般是没有随葬品的。人殉保持着全躯完整，人祭更多的是身首异处。人殉所用的人身份比较复杂，他们大多是死者生前的近臣、近侍，有贵族、有平民、可能也有奴隶，人祭所使用的人多是战俘。细心的学者发现，人殉与人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人殉是为了死者，即让殉人侍奉死去的祖先或亲人；人祭则更多地是为了生者，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在世的行祭者。

殉人数量与墓葬等级相关，墓葬规模越大、墓主人身份越高，殉人数量就越多。高级贵族墓葬通常用数十名殉人，王陵中的殉人数在百名以上甚至数百名，中小型贵族墓以1-2名殉人较多见，有的多达数人，普通平民墓葬一般没有殉人。殉人有生殉和杀殉两种。殷墟西区墓葬M166的西二层台上有1个殉人，头向南、面向





下、侧身屈肢，双脚交叉重叠、似捆绑状，为一少年。同一墓地M358的一具殉人，其头骨下部被砍去，当系杀殉。除殉人外，也可见狗、羊、猴一类的动物被杀殉在棺椁顶板上或二层台上。

家族墓地中的车马坑实际上也是殉葬坑。地位高贵或者十分富有的贵族死时，后人常常在其墓葬附近埋入1辆或数辆马车，这是死者高贵身份的象征，也是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准备的代步工具。2005年，殷墟西区发掘出一批5辆车马坑。5辆马车位于3座大墓的西南部约40米处。这一距离为商代以马车陪葬的常例。作为陪葬品的马车，通常都埋葬在主墓的西南或东南约30—60米的位置。这给考古人员根据车马坑位置寻找大墓或者根据大墓的位置寻找车马坑提供了某种规律。

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祭祀在古代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祭祀是商族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几乎每一次殷墟考古发掘，都会发现商族人的祭祀遗存。

发现于著名的小屯村、被考古学家编号为“乙七”的宗庙基址保存祭祀遗迹丰富。与该基址相关的祭祀遗存又分二类：一类是与基址夯土直接发生关系的“葬兽坑”，一类是基址南部的“排葬坑”。

“葬兽坑”共19座，是修建房屋的祭祀过程中留下的。他们分别发现于七号建筑的地基之下、地基夯土之中，或者挖坑埋在地基之上。埋葬的动物主要有牛、羊、狗等。

南部的“排葬坑”总数达134座之多，绝大多数埋的是“人牲”。空间上，这些葬坑形成明显的“单元”，每一单元可能属同一次祭祖活动留下的。葬坑中埋入的多是头躯分离的人骨架，每坑2—13人，埋3—7人的居多。葬坑中罕见随葬品，仅部分坑中置有蚌或者放有1件铜铃。死者大都是脸朝下俯身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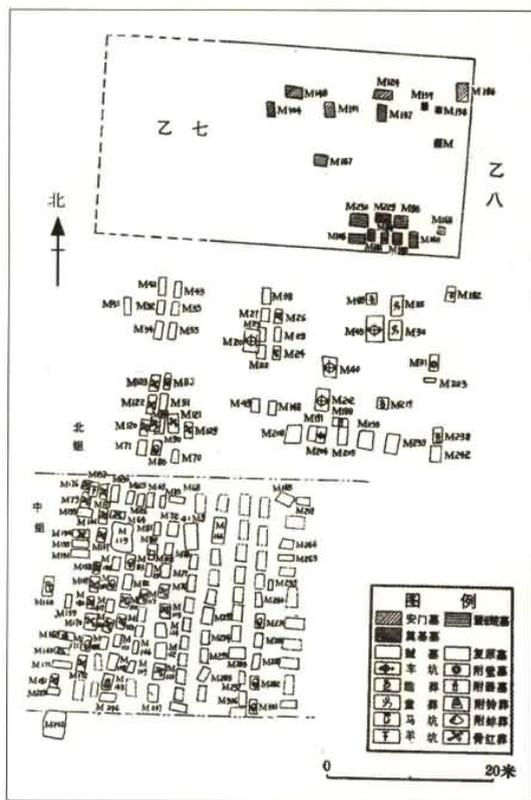
殷墟王陵区的人祭遗存更为丰富。其中一座王陵挖开后，仅在墓道中即发现被砍下的人头73个、无头人骨架59具，这还不是殉葬人的全部。墓室打开时，又在大墓的椁顶周围发现11名殉人。这是被杀祭在大墓的墓穴或者墓道内者。更多的人祭遗存在整个王陵区的东部和南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型公共祭祀场。祭祀坑总数超过2500座，已发掘1483座。

这是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的石璋如先生绘制的殷墟宫庙区乙七基址及其庭院祭祀坑的复原图（引用时略有改动）。图中的乙七基址夯土范围内的墓葬，

应为商族人建筑该座宗庙过程中，埋在夯土之中的“牺牲”。其北组、中组两部分，系宗庙建成后分次祭祖时留下的遗存。北组墓葬，明显可以分成若干“组”。这便是若干次祭祀活动的痕迹。每祭祀一次，便会形成一组遗存。

尽管今天已经无从复原乙七建筑基址的地面部分，甚至地下部分也还不完整，但从与这座建筑相关的祭祀规模，即可知商族人对死去的祖先是何等重视。

成排的祭坑，记录了一个迷信和血腥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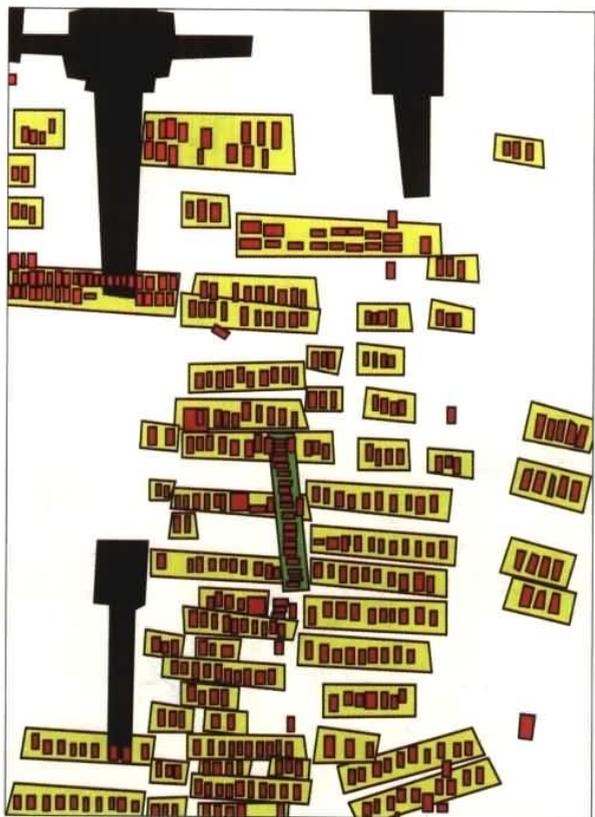




3000年后，
时间褪去了血腥，
祭祀的传统却遗
留了下来。

1949年，石璋如先生离开大陆前往台湾。2003年，石璋如先生去世，享年103岁。2004年，他的后继者奔赴台湾，与台湾考古同行一道祭奠这位考古学前辈。

王陵区东区大墓M1004前的祭祀坑。图中的黑色带墓道的墓，或为王陵或为商王配偶之墓。墓葬附近的小坑均系商王下葬之后，后人经年累月不断祭祀所形成的一系列祭祀坑。这些坑的分布有明显的规律：若干坑自成一组，同组内的祭祀坑排列均



匀、大小相若、深浅一致。他们是同一次祭祀活动留下的遗存。以平均每坑内杀祭5-7人计算，每举行一次祭祀活动，杀人总在数十人以上。



祭祀坑并
不仅仅限于王
陵区，一些居
民点内也常常
发现祭祀坑。
这些祭祀坑或
呈圆形或作方

形。坑内所杀人数，同样蔚为大观。这是考古人员在清理一处商族人居民点附近的祭祀坑。鉴定表明，这些重重相叠埋藏在坑内者，均为青少年男子。

这些祭祀坑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面积都在2平方米以下。从平面看，他们都成组分布。同组祭祀坑不仅坑位的空间接近，而且坑口的形制、大小、方向、深度、坑内埋藏的内容、骨架的数量与姿势各方面都比较一致，应是同一次祭祀活动的遗迹。

人坑占这些祭祀坑的绝大多数。埋入坑中的人骨架有的是无头躯体，有的只有人头，有的头躯分离，只有少数是全躯的人骨架。葬坑中的人骨一般1—10余具不等。

用于祭祀的死者绝大部分都是男性，但也有少量女性和儿童。男性的年龄一般都在15—35岁之间，女性年龄在20—35岁之间，儿童年龄在6—12岁之间。

公共祭祀场中的葬兽坑数量相对较少。有的单独成组，有的与人坑同埋在一组中，有的甚至既同组也同坑。所埋动物有马、牛、象、猪、犬、羊、猴、狐、鹰、河狸等。

还有一类成批使用“人牲”的祭祀坑，常见于居民点或墓地附近。最著名的要数郭沫若曾多次作过专门研究的“后冈圆



坑”。该坑作直筒形，口径2.2米，深2.8米。坑底夯实并垫土，坑壁经过加工。坑内堆积分三层，上层有全躯人架16具、人头骨7个、无头躯骨架2个，共25个个体。出土了著名的戊嗣子鼎等铜器和成堆的海贝，还有烧焦的麻绳。中层有全躯人骨架19具、人头骨9个、无头躯骨架1具，共29个个体，有的骨架旁发现骨笄和玉饰。下层有全躯骨架2具，人头骨10个，另发现腿骨和上颞骨各1块，共19个个体，骨架旁发现骨笄和贝。坑内骨架上都撒有朱砂，有的有捆绑痕，有的则可见刀砍痕。这些个体大都为男性青壮年，也包括少量青年女性和儿童。

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用来祭祀。殷墟遗址中多次发掘出所谓“瓮棺葬”，这些瓮棺葬通常也是夯砸在建筑基址中。其分布规律往往是沿墙或者在门的附近，是专为建房进行祭祀时留下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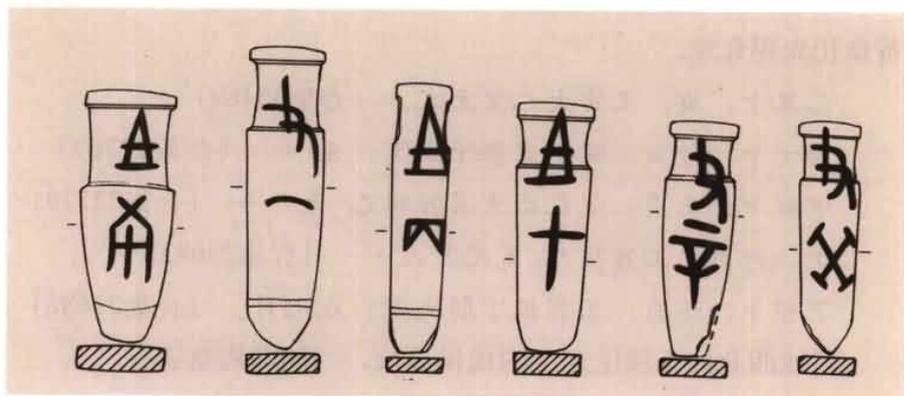
殷人的祭祀对象，首先是祖先。

宫庙区乙七基址前的“排葬坑”，应该就是用来祭祀供奉于

儿童棺材。

考古队的文物标本房内，保存着大量红陶罐。他们与通常的陶罐无异，但实际上却是商族人为埋藏儿童准备的“棺材”。从红陶罐上的裂纹，可知它由许多碎片粘接起来的。在考古发掘现场，他们曾经是一堆碎片。每当考古队员在发掘中遇到类似的破碎陶片出现时，便是他们心情最难过的时候。因为只要他们任意揭开其中一块，便会露出儿童的骨架。这些儿童并非自然死亡，而是作为祭祀神灵的“牺牲”杀死的。





1991年后冈发掘的一座小型墓葬(91M3)曾出土6件玉质的柄形饰，每件都朱书有“牌位”，分别为“祖甲”、“祖庚”、“祖丙”、“父口”、“父辛”、“父癸”。这种带有父辈称谓的柄形饰，明确记录了祭祀对象。

宗庙内(乙七基址内)的祖先牌位的。王陵区中的公共祭祀场则是追祭列代商王或其部分配偶的场所，族墓地中的祭祀遗存基本上也是祭祖留下来的。

甲骨卜辞中，涉及祭祀的文字也大都与祭祖有关。商人甚至认为，先祖死后成为神，可以宾配上帝。有时径直将父称为帝。如所谓的“父乙帝”、“帝丁”。



殷人的祖先祭祀，经常分成若干组进行。每组涉及若干位直系或旁系先王，构成所谓“集合庙主”。如二示、三示、四示、五示、六示、七示、九示、十示、十示又一、十示又二、十示又三、十示又四、廿示、廿示又三、大示、元示、上示、小示、它示、下示等。

“示”即庙主或祖先牌位，“二示”即两位祖先的牌位。

殷墟宫殿宗庙区乙七基址前的祭祀遗存划分北、中两组，应是分两次祭祀商人的集合庙主，而不像是专祭某一代商王。

祭祀祖先最隆重的是周祭，即以5种不同的祭法，有秩序地轮番祭祀先祖先妣。

乙丑卜，贞：王宾大乙翌无尤。（合集35489）

丙子卜，行贞：翌丁丑祭于大丁，无……（合集22767）

甲辰卜，王贞：翌乙巳王其宾祖乙无……（合集22779）

卜，行贞：王宾报乙无尤？在……（合集22682）

丁卯卜，旅贞：王宾报丁彤无尤？在七月。（合集22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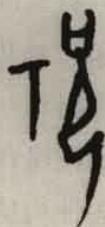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东区的成排葬坑，可能即周祭遗存。

周祭所包括的5种祭法可视为商族人的“常规祭祀法”。而商族人的祭法最保守估计也有数十种，如侑、岁、饮、御、丁、伐、燎、祝、福、既、执、奚、报等。多数祭法需要杀伐人性或兽牲。因此，在商族人的词汇中，最发达的字正是与杀人相关的字。

记载有祭祀内容的甲骨卜辞内容多样但以祭祀祖先为主。左：五牢、三牢；右：甲申贞王呼于？祖乙。



“祝”字，本意相当于今天的祷告。左侧的为神主之形，右侧乃一人跪地而语。这是甲骨文字中所见商族人祭祀方式的一种。



伐：以伐将人牲“斩首”。

奚：以双手执人牲头发，以斧钺砍下头颅。

卯：从上而下剖开人体，向神灵献祭。

豆（加寇右反文）：以棍棒击毙人牲。

岁：即“剝（guì）”，以利刀劈杀人牲。

爇（jiāo）：将人牲置于火上焚烧。

俎（zǔ）：将人牲剁成肉酱。

而：烹蒸人牲。

其他还有将人或动物牺牲埋入土中、沉入水中以祭。甚至将人肉曝晒干做成肉脯以祭。但最恐怖的可能还是烹蒸人性。

商人战胜敌对部族后，将敌方首领的人头放在青铜容器中蒸煮，过去许多人不以为然。1984年，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第一次在商代祭祀坑中发现青铜甗（yǎn）中装有人头。当时以为是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与青铜器一起埋葬时偶然掉进铜器中，谁也没有深究。因为商人祭祖时，通常都将进奉的牺牲，也就是活人当场砍头，然后将头与身体分开埋葬。人头偶然掉进青铜器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1999年，考古队在殷墟的一处商族墓地中，又发现了第二例：同样是一颗人头被装在青铜甗内一起出土。

甗是一种蒸煮器。他的结构分上下两层，中间用带孔的笊子隔开。使用时将下层的水煮沸，蒸汽上升，上层的食物便被蒸



熟。第二次发现引起考古队员的极大重视。队员们将两个甗放在一起，对其中的人头进行仔细观察。结果发现，这两颗人头明显呈现出与一般墓葬中人头骨不同的特点。埋在墓葬中的人头骨，颜色在保存好的情况下呈金黄色，保存不好时呈黑色，但这两颗人头骨均呈白色或灰白色。更重要的现象是，若用手轻轻掰开正常的墓葬中的人头骨，一般有一种脆硬的感觉，断口如锯齿，可见到长短不齐的“断碴”；但若掰开青铜甗中的人头骨，既感觉不到脆硬，而且掰开的断口齐平。因此可以断然肯定，甗内的人头骨是被蒸煮过的。

这两位被残忍地置于甗中蒸煮的人是谁？

面对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考古学者曾经一筹莫展。但终于有一天，他们从一名国外同行处打听到，通过测量人骨上的锶同位素水平有可能识别死者的出生地或成长地。运用这种技术，至少可以知道青铜甗内死者的来源。

于是，考古队将其中1件甗内人头的牙齿1枚送到了实验室。

商人蒸煮人头。左：装有人头的铜甗。1984年西北冈祭祀坑M259出土。高47厘米，重21.2公斤。

右：装有人头的铜甗。2000年刘家庄墓地M1046号墓出土。口径22.4厘米，高36厘米，重4.75公斤。

甗是一种用于蒸煮的炊器这两件甗中都发现人头骨如果不是亲眼见过这两件器物，不会相信商族人曾经残忍地蒸煮过人头。



人骨样本的分析结果基本没有出乎考古队员的意料：实验结果表明，这名被蒸煮的死者并非殷墟本地成长，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地人”。

那么他会是一名什么样的“外地人”呢？平民还是贵族？

古籍《逸周书·世俘》篇，讲的是西周初年周武王伐商胜利后，如何处理大批商代俘虏的事。记载说，周武王曾将俘虏的商王朝一百名高官分两批杀祭，由小子和邦君将头颅砍下，然后放在青铜鼎中奉献先王。

甲骨文中有类似的记录：

癸卯卜，争，贞下乙其出鼎。王固曰：出鼎，二隹大示，王亥亦鬯一。（《合集》11499）

这条卜辞意思是说，在被称为“癸卯”的这一天，有一个叫争的占卜师，卜问是否要将祭物放在鼎中祭祀祖先？商王看过卜辞后认为需要用鼎，而且祭祀还要另加香酒祭祀包括王亥在内的先祖。可见商代将奉献之物置于青铜容器中祭祖，是一种十分隆重的祭祀。

由此推测，这两件青铜甗的“外地人”绝非普通之辈，很可能是殷墟外围方国或部族的首领。

推测这两名被蒸煮者是外邦首领，考古学家还有间接的证据。

收录甲骨文的集大成著作《甲骨文合集》，曾收录殷墟出土的两片人头骨刻辞。其中一片上写“方伯用”，原来的内容可能是“方伯用作XX”当然是用于祭祀目的。另一片上可看清的共五字，写的是“方伯，祖乙伐”。其全文应该就是用方伯来祭祀祖乙。这种在人头骨上直接刻字的做法，让人直面人类的残忍本性。将“方伯”二字刻在人头骨上，表明了这两颗人头的身份。

面对残忍的蒸煮人头习俗，无法否认，我们祖先对生命的理解和阐释与今天的你和我有天壤之别。

除残忍的杀人祭祀之外，还有一些祭祀似乎不那么血腥，不





这是两片特殊的卜辞，收录在大型甲骨文著录《甲骨文合集》中（38758、38759）。其特殊性在于它既不是用龟甲、也不是用兽骨刻写的。它是两片人头骨刻辞。商族人似乎对人的头颅特别有兴趣。将他人

的头颅砍下来是常事。但砍头之后又刻上字，却非同寻常。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片人头骨上刻的是是什么。具备甲骨文知识的人，并不难读出，左边一块刻的是“方伯用”三字。右边一块刻的是“方伯，祖乙伐”。这分明是说，这两片人头骨的主人，曾经是两个“方伯”。在商王朝时代，方伯大体可解释为周边国家的首领。

用人牲。如燎为积薪燃柴而祭，翌为舞羽而祭，丁为陈列祭品，福为温酒于神前。另有许多祭名的具体方式尚待研究。要全部“复原”这些不同的“祭法”，还需要做大量考证工作。

不同的祭法，用于不同的目的。对于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祭祀，燎祭的形式比较常见。其余还有宾、御、岁、既、又、侑（yòu）等祭法。如祭日以宾、御、又、岁、既；祭星以卯、又；祭河、祭云以燎；祭雨以绞（jiāo）、舞、燎；祭山以燎、又；祭土以燎、御、侑等。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祭祀坑许多人牲的头骨上都留下有刀砍痕。据学者观察，这些砍痕所示进刀方向出现于头骨右侧的头颈部，而且从右后上方稍向左下方倾斜。这样的斩砍方向应该是行刑者站立于被斩者的背后向死者右颈部挥刀的。操刀时也可能出现某些偏差，这就造成一部分人头连同下颌骨被一起砍下，导致部分祭祀坑中的人头骨没有下颌骨，而一部分无头祭祀坑中人骨架的颈部有时又能见到附带的下颌骨碎片。

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中有关人祭的卜辞记录的祭祀所用人数不少于14197人（未记具体祭祀用人数的卜辞以每次1人计



商王朝的“族墓地”中，族长们的墓地同样留下大量祭祀遗存。这是殷墟发现的一座族长一级的贵族墓。该墓带一条墓道。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发现少年男子人骨架和十余具少年头骨。

算），武丁时期的明确祭祀用人数（即不包括未记具体人数的卜辞）达9021人。

祭祀过程中，每次所用人数不等，较多时可达20人、30人、50人、200人和500人。与卜辞的记录接近。

从甲骨卜辞分析，用于祭祀的人牲可能主要是战争所获的异族成员。

卜辞中有大量“用羌”、“岁羌”、“俎羌”、“卯羌”的记录，即是以“羌”为牺牲进行祭祀。殷人甚至以方国伯长作为祭品。





殷人祭祖使用了多少牺牲，至今无法统计。以西北冈的人祭为例，如果每组葬坑为一个祭祀单元，则每次祭祀过程杀伐的人数少者数人，通常数十人，最多时达百人以上。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已钻探发掘各类祭祀坑2500座左右，估计人牲总数在10000名以上。

口亥卜，羌二方白其用于祖丁父甲。（《京4034》）

这是说“口亥”这一天，杀了两名羌族“方伯”（首领），用于祭祀祖丁和父甲两位先祖。

这些被杀祭的羌人应系从商王朝西部俘获。据说，这些“羌人”分布在今天的甘肃东部一带。

有人据卜辞对当时的俘虏名称作了统计，发现他们大致来自13个不同方域或部族，如羌、大、亘、尸、美、奚、而、印等。殷墟宫殿宗庙区以及西北冈王陵区的祭祀坑中的牺牲，绝大多数可能即“羌”或其他方域的外族俘虏。

卜辞中还有“用仆”、“多仆”、“氏仆用”、“用多臣”等记

载。即以臣仆为祭品。据胡厚宣的不完全统计，卜辞中的仆臣之祭，共用1680人。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各大墓墓室及墓道中的牺牲，可能多属“仆”、“臣”类牺牲。

关于晚商祭祀所用牺牲来源的研究，尚可运用人骨鉴定资料加以探讨。其中古人骨基因提取技术可为判断人骨的种族提供有力线索。殷墟的考古工作者正与遗传界合作，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晚商时期祭祀活动中的动物牺牲，主要有犬、马、牛、羊、猪、象、猴、鹰等。但殉人地位高于殉兽，如1976年发掘中，若人与兽同用，则人坑排前，兽坑排后。但从1978年的发掘看，兽祭坑不少是单独埋葬的。

商人的鬼神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很长时间内，商人笃信祖先、鬼神。早期的殷人向祖先提供祭品（随葬品）时，都诚心实意地使用品质优良的礼器或者生活中的实用器。但到了晚期，后人向死者提供的随葬品越来越简单，逐渐发展成“冥器”（也称明器）。所谓冥器实际是一种专门为“鬼”制作的仅具象征意义的随葬品。在殷墟文化的四个时期中，随葬品冥器化现象始自第二期，从第三期开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至殷墟四期时，绝大部分墓葬中都使用明器。从落葬礼的角度看，明器开始普遍用于随葬，意味着殷人越来越少地在落葬时举行奉献食物的祭祀活动。因为明器细小、粗糙，不可能真正放置食物，反映了其时人们对鬼神已远不像先前那样敬而畏之。

甲骨文中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

根据甲骨卜辞统计，在殷墟文化早期，武丁在时，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使用牺牲的数目庞大，最多时可用牺牲千人、千牛、五百羊；殷墟中晚期康丁至文丁时，一次性最高用牺牲数减至二百人、百牛、百羊；殷墟末期即商王朝末世。帝乙、帝辛时，一次最高用牺牲数减至百头以下，用人牲最多为30名。从早到晚，呈明显的递减之势。

古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羌，甲骨文中作“𠄎”。商人大量虏获“羌人”并以“羌人”祭祀祖先。

记录此类事件的甲骨卜辞甚多。

左：曰其获正羌。意即（是否可以）俘获“正”地的羌人。

右：而于祖丁……羌……祖甲十一羌。词句虽不完整，但大意也是有无必要向祖先献羌。

《史记·周本纪》：“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意思是说，当今的商纣王（商王朝最后一位王）只听信妇人言论，对祭祀祖先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不顾不问。

《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意思是说，当今的民众居然偷窃供奉神祇的“牺牲”，吃了也不会受到惩罚。

《史记·殷本纪》则记载了一个“武乙射天”的故事：商代末年商王武乙自认权威无限，居然藐视上天，拈弓搭箭射向苍穹。

以上种种变化，似乎暗示曾经对神灵深信不疑的商人，包括商王在内，后来都逐渐对鬼神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拾肆

岁月无法尘封的美丽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巨大的宫殿、恢宏的宗庙、气势磅礴的王陵，描绘出一幅壮阔的画面。残断的甲骨卜辞，虽然常常只存留只言片语，但仍然可读出百转柔肠。

三千年前的商代，对于今天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来说，的确有些久远，但盘庚、武丁、妇好，甚至商纣王、妲己这些曾经生活在殷墟，活跃在商代晚期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经过地下资料的解读，个个栩栩如生，难以被历史遗忘。

盘庚与王都大迁徙

在商王朝数百年的历史中，盘庚是第20位商王。

盘庚之所以没有被遗忘，在于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和事后都引起过激烈争议的事件，这就是史学家称之为“盘庚迁殷”的商代王都大迁徙。

据一些史书记载说，商王朝自国王祖乙徙都于“耿”（可能在今河北邢台附近）之后，国民变得不思进取、贪图安逸。虽然另有文献说祖乙之后的南庚曾将国都迁往“奄”，仍未能改变国势继续衰微的局面。盘庚为臣时，曾与其兄阳甲谋划迁往先祖商汤的旧都，但未能实施。阳甲驾崩，盘庚继位为王，终于作出迁都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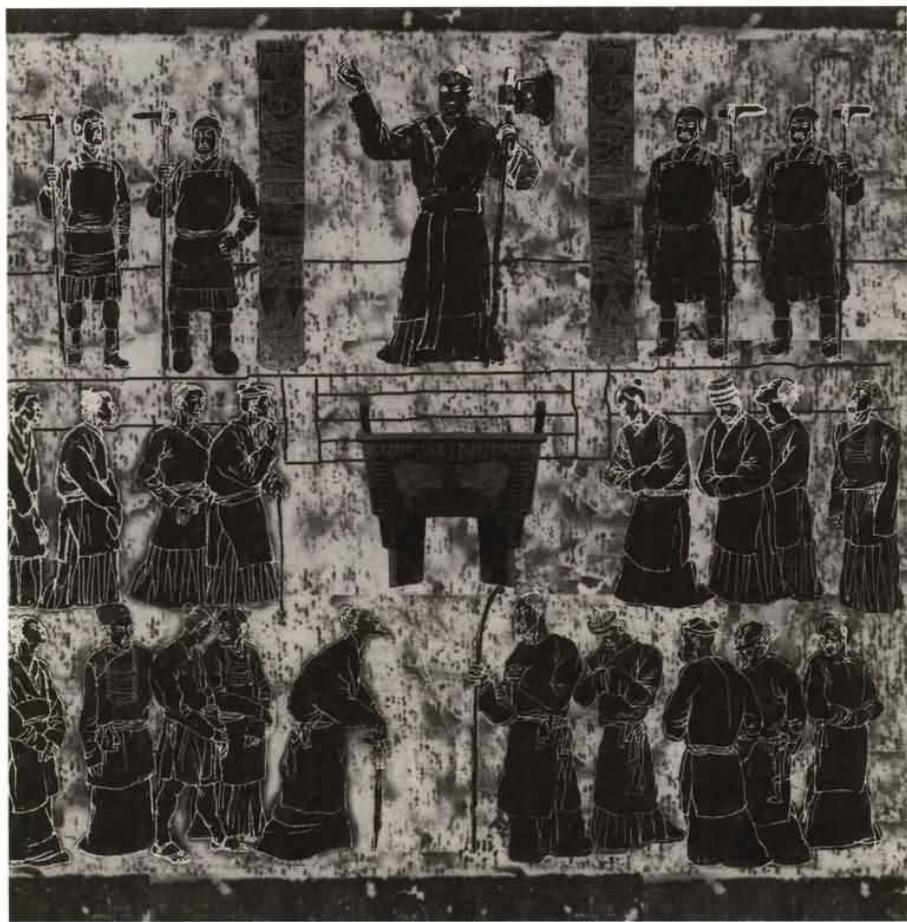
迁都决定作出之后，“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反对者大有人在。

为排除阻力，盘庚召集臣民，晓以大义，从祖宗法度，教育臣民应当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为国家尽心。“舍而费勉，何以成德！”他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谁不同意迁徙就除灭其宗族。

盘庚的果敢举动，终于促成了迁徙大业。

迁居新都之后，盘庚行祖先德政，终于赢得“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彻底改变了商族人“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局面。

盘庚“去侈行俭”，为拯救国势衰微而毅然迁都，是史书所载的传统说法。也有学者说，盘庚迁殷墟是为了避河水之患。又有学者说盘庚迁殷是由于阶级对立，贵族与平民矛盾激化酿成



迁殷之前，盘庚将各族的族长召集起来训话，陈说迁都的意义，并以恩威并施的口吻告诫众人，迁都决心已下。（唐川府 提供）

的。或者说是由于商王朝内部的王位之争造成的。

迁殷背后的真实原因，已经无从证实考实。但迁殷之举使一个困难重重的王朝走出了困境。

盘庚迁殷的史迹，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得到了直接印证：殷墟遗址作为都邑起始时间，恰恰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末盘庚在位的





王陵区所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都清理过了。历史上，他们全部被盗掘，无一幸免。

虽然无法确认每一座墓葬的主人，但学术界几乎都同意，在所有这些墓葬中，HPKM1001号大墓年代最早。安阳既是盘庚所迁，则第一个葬在这里的商王，就非他莫属了。于是有理由相信，HPKM1001号大墓便是盘庚最终的栖身之所。1930年，考古学家将他的墓掘开。这位伟大的商王，遭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骚扰。

时候。在此之前，殷墟还只是一个一般规模的聚落。没有比这样的“巧合”更能够证明“盘庚迁殷”的真实性了。然而，盘庚后来的命运如何？茫茫的殷墟大地，哪里是这位国王的最终归宿？

殷墟洹河北岸的西北冈王陵区，有1座编号为M1001的带四条墓道的大墓。该墓在历史上曾经惨遭盗掘，墓中的大宗文物已不知去向。然而该墓所剩不多的文物显示，该墓应该是王陵区所有王一级大墓中年代最早的。

如果盘庚死后埋藏在王陵区，他的墓葬在所有王陵中必然年代最早。因此有不少学者相信，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大墓M1001，就是盘庚之墓。

伟大的武丁

盘庚死后，王位传给其弟小辛，再传弟小乙，形成兄弟三人先后为王的典型“兄终弟及”局面。小乙死后，并未将王位交还给长兄盘庚之子，而是直接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爱子武丁。武丁成为商王朝开国以来的第23位王。

古书《无逸》说武丁：“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意思是说，武丁在位的最初三年，一直沉默不语，一旦开腔即语出不凡，并且很快在治国安邦方面作出巨大成就，赢得民心。

大学者郭沫若怀疑武丁三年不言是得了“不言症”或“哑症”。也有人说，这是武丁在行孝，是因为他曾为其父守丧三年，故而不语。又有学者从政治角度推测，说武丁三年不语是以三年时间静观朝野动向。

武丁的传闻轶事很多。启用出身微贱的甘盘、傅说为相的事，即常常被人称道。“傅说拜相”至今为人传颂。



小屯文化
艺术团自发演
出的“傅说
拜相”中商
王武丁与臣
子交谈。(刘
志伟 提供)



武丁即位初期，常思复兴之道。某日他夜得一梦，梦中遇圣人，名“说（音yuè）”。醒后即按梦中所见，看看群臣百吏中有无长得像“说”者，发现谁也不像。于是派人四处寻求，最后在乡间找到一名叫做“傅险”的版筑者，与梦中所见无异。于是迎回殷都，举以为相。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傅说。傅说为相之后，乃修政事，殷国大治，天下咸欢。

据说武丁即位后，不但遇到积重难返的陋习，而且又遇天灾。

武丁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为稳定社稷，武丁曾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西北方向的鬼方。《诗经·殷武》记述武丁伐荆楚：“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衰荆之旅。”

武丁的励精图治，使得殷王朝由衰转盛，国力复兴，武丁因此被尊为“高宗”。

武丁死后，可能也葬在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可惜由于王陵区的王陵大墓悉数被盗，现今已很难确定究竟哪一座墓是武丁的墓。

岁月无法尘封的美丽：妇好其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是曾经频繁用兵的社会。

战争不仅是男人的事情，无情的杀伐也将女人卷了进来。有位美丽的妻子，名叫妇好。考古学家在甲骨文中发现有关她的诸多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诸多妻妾中的一个，但她决不是普通的一个。有人说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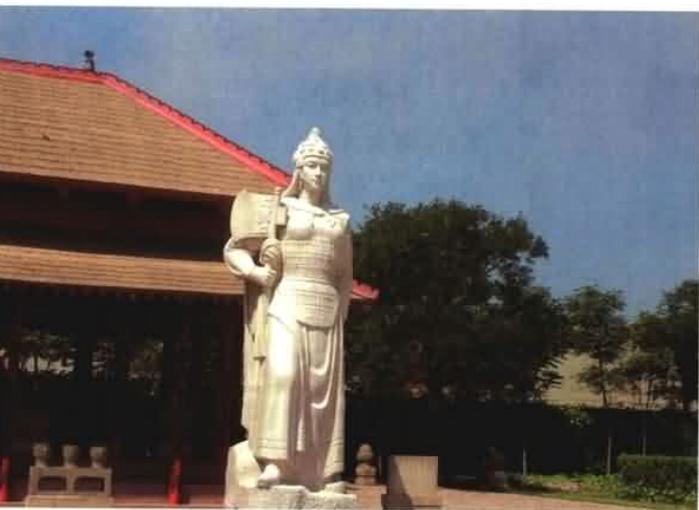
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也有人说她是中国最早的女祭师。

殷墟卜辞中关于妇好的记载有百余条。

出土于殷墟后来流失到英国的一片甲骨，这样记录妇好的事迹：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口（《库》130）

这条卜辞说的是在“辛巳”这天，商王占卜是否派遣妇好已有的3000兵员，另征召10000名壮



现代安阳人想象中的女英雄妇好。



妇好的事迹见于百余条殷墟卜辞。这片卜辞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条，所记为妇好组织兵员抵御外敌之事。其文读作（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

登旅万，呼伐口”。卜辞中的这类记载与妇好墓中所出铜器中的“妇好”铭文联系研读（右图是妇好墓青铜器铭文拓片之一），那位躺在小屯5号墓中的女人生平一时变得丰满起来。



妇好墓发掘场景。

考古发掘的过程似乎总是缓慢的。最初靠的是一锹锹、一铲铲，一旦接近目标，考古队员手中的铁锹便换成手铲和毛刷。1976年，中国经济还不发达，照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而留下的妇好墓发掘场景照并不多。这是难得的发掘场景照片，有趣的是，主持妇好墓发掘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是一位女考古学家。正是这一锹一锹，导致了两名相隔3000余年的女人的邂逅相遇。



卒去攻打敌方。在商代，“登人”即征召兵卒是王朝最高统帅的职权，妇好作为商王的配偶，常常行使这一职权。

据卜辞统计，妇好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她还协助商王主持过祭祀，并且常常伴随武丁外出狩猎。由卜辞即可见，在商王朝的历史中她是何等的重要，作为商王的武丁，对她又是何等的宠爱。

这位干练、美丽、功勋卓著的奇女子先于武丁辞世。武丁以隆重的礼仪厚葬了这位爱妾。1976年，这位非凡的女性，在地下长眠3000年后，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这座墓葬被称为“妇好墓”，是殷墟迄今所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墓葬。

妇好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5.6米、宽4米、深7.5米，面积22.4平方米。原备棺槨已朽，但有痕迹表明棺槨原都涂有红、黑等颜色的漆。墓底有腰坑，腰坑内殉一人一犬。在距墓口6.2米处，墓室东、西壁各开有壁龛1个，内埋殉人。墓中共有殉人16个、殉狗6只。由于生前深得武丁宠爱的缘故，伴随她的香躯埋入地下的，仅青铜器就重达1.6吨。其中青铜容器200余件，玉器755件，宝石制品47件。当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其中包括两件象征手握重兵的青铜大钺。

据说当初考古队员在妇好墓附近发掘时，差点将这座墓遗漏掉。原因是这座墓的上面曾经盖有一座墓上建筑，可能是妇好死后，当时的人为能够经常去祭祀妇好而盖的享殿。考古队员将这座建筑挖掘完后，以为建筑下面不会再有什么东西了。只是在收

妇好墓的发掘者郑振香先生（中）在殷墟考古工地视察。





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左：司母辛鼎。长64厘米、宽48厘米，重128千克。“司母辛”也可读作“后母辛”，翻译成今文相当于“伟大崇高的母亲辛”。

中：妇好斝。高24.7厘米，重1.2千克。

右：妇好壶。高47.8厘米，重30.4千克。



妇好墓出土的玉熊和嵌绿松石骨雕老虎。

工前，队员们还有点不放心，接着让技术员再钻探了几下，没想到探出了涂在棺材上的红漆。从而该墓得以重见天日。

之所以知道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妇好，是因为她的陪葬品中，共有196件青铜器带有铭文，其中111件铸有“妇好”二字。这些



妇好辞世
3000年后，殷墟遗址所在的安阳市小屯村自发组织艺术团，对妇好加以艺术解读。小屯艺术团演出的“妇好出征”剧照之一。（刘志伟 提供）



在后人的心目中，妇好不仅是一位深得商王宠爱的美妇更是位领兵打仗、辅佐商王的“军事家”。小屯艺术团自发演出的“妇好出征”之二。（刘志伟 提供）

带“妇好”铭文的器物是妇好自作之器。

随葬品中，有一件文物让人在3000年后的今天仍然领略到国王与美妾之间的似水柔情。这是1件白色大理石圆雕，作伏牛状，长25厘米、高14厘米。该件伏牛形石雕的下颌刻有“司辛”二字。这件石雕可能是武丁为妇好所作。

武丁有众多妻妾。卜辞记载有48人。其中法定配偶3人：妣辛、妣戊、妣癸。妣辛就是妇好。“司辛”石牛，表达了武丁对妇好的深切怀念。

司母戊鼎背后的风云女人

在我国众多国宝中，司母戊鼎，是最著名的青铜文物。它被反复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人们对它津津乐道。

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75千克。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个立面的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框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长方形素面框的周围以成对的夔龙为主要纹饰。四个立面的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饰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显示出熟悉的铜、锡、铅配比技艺，表现了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1939年，安阳尚处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安阳武宫村乡亲吴培文家在殷墟西北冈掘得此鼎，随后掩埋藏匿。1946年该鼎为当地政府所获，后送往当地国民党驻军。同年，驻军长官作为寿礼，将大鼎运往南京庆贺蒋介石生日。蒋曾携其子经国、纬国，在马衡先生的陪同下亲往观摩，随后指示交送当时新设立的中央博物院保管。1948年，国民党政府大陆军事失利后，将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但司母戊鼎被意外地留在了大陆。个中原因至今不明。1959年，该鼎送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5年，离开安阳出土地59年之久的国宝级文物又被送回安阳临时展览。其后再次运回北京，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作为特别展出的文物亮相。

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腹部“司母戊”三字，也有学者译为“后母戊”（意思是伟大崇高的母亲戊）。从器形和纹饰判断，该鼎属殷墟文化的第二期，即商王武丁晚期及随后嗣位的祖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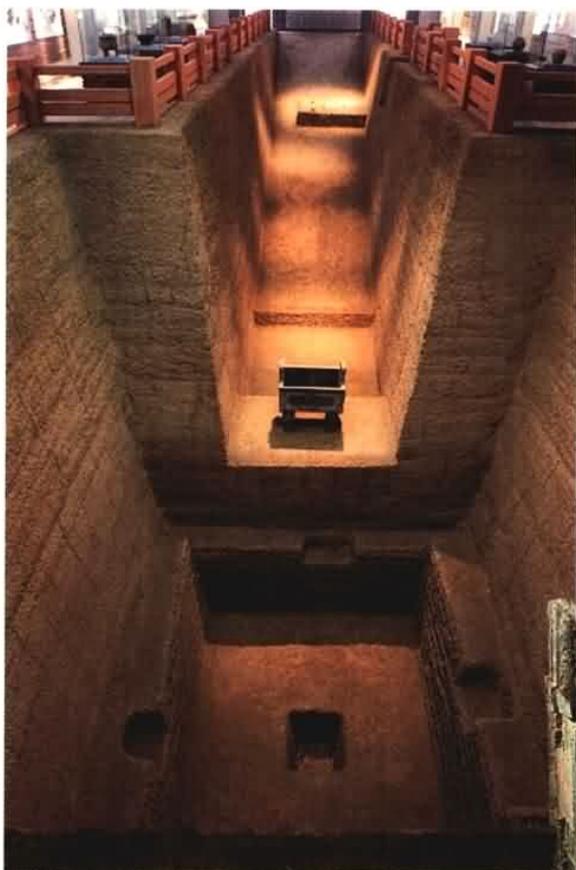


祖甲两王时期。故可推测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而“母戊”正是武丁配偶妣戊。

据甲骨卜辞，商王武丁有法定配偶3人：妣辛、妣戊、妣癸。既然司母戊鼎的主人是武丁的配偶妣戊，那么她与妇好就成了侍奉同一个男人的女人。

与妇好（妣辛）不同，武丁的这位妣戊在甲骨文中保留有记录不多。这位神秘的女人似乎不曾像妇好逐鹿原野或鏖战沙场，倒更像一位贤淑典雅、稳重温和的贵妇。

有学者研究认为，妇好（妣辛）先于妣戊去世。从考古学的常识来看，妣戊在妣辛去世后，甚至得到了比妇好更多的宠爱。



传出司母戊鼎的大墓，1984年被重新掘开。2005年经整修后向游人开放。



2005年，司母戊鼎回归故里，在殷墟博物馆展出。(李自省 摄)

我们不妨看看这两个女人留给后世的线索，以比较他们生前的地位。

妣戊的大墓，曾于1984年重新被揭开。这是一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妇好墓没有墓道。按照一般的知识，有墓道的商代大墓，其死者的社会地位应高于没有墓道的大墓。

妣戊墓墓室体积约630立方米，妇好（妣辛）墓体积只有约140立方米。即使不算墓道，前者也是后者的4倍。

妣戊之墓所出司母戊鼎体积硕大，是妇好墓所出司母辛鼎重量的近7倍。司母辛鼎高80.1厘米、长64厘米，重128千克。比起司母戊鼎来说，确实要小得多和轻得多。

更重要的是，妣戊之墓落葬在殷墟的王陵区，妣辛墓则葬在小屯宗庙区的西部。

按照一般的常识，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同是商王配偶，妣戊比妣辛（妇好）生前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她死后，受到了更加隆重的祭祀。



夭折的王子

1976年，考古人员发掘了位于小屯东北地的18号墓，墓口长4.6米、宽2.2—2.3米，方向10°。墓底开有腰坑，腰坑内殉葬有狗。葬具有棺有椁。椁长2.9米、宽1.72—1.8米、高1米。椁板表面呈暗红色，绘有黑漆纹饰。棺长1.78米、宽0.68米。墓内共发现殉人5个、殉狗2条。其中4个殉人位于椁内棺外，1个埋在填土中。同时随葬了大量青铜器。

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出土文物表明，该墓的年代，属商王武丁时期。出自该墓的铜器中，有13件铸有铭文，共计铭文5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子渔”，可见墓主人很可能叫“子渔”。

子渔又是谁？

小屯18号墓随葬品总数共90件。其中铜器43件、陶器4件、玉器11件、骨器28件、海贝4枚。

43件铜器中，礼器24件，计有鼎、鬲、罍、尊、卣、觚、爵、盘、箕形器等。



与商王武丁同时的殷墟卜辞中，有一位“小王”。这位小王在武丁子辈的称谓中，被称为“兄己”。同一个人，在武丁孙辈卜辞中，又被称为“小王父己”。这些卜辞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个人。他是武丁的长子，名即孝己。正是妇好所生。

据董作宾考证，孝己应是武丁诸子中的“子渔”。换句话说，小屯18号墓的主人，这名被称为“子渔”的人，正是武丁和妇好所生的爱子孝己。18号墓不仅出土有铭“子渔”的铜器，而且组合核心为5套觚爵，正与王子的地位相合。

甲骨文中，子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曾参与祭祀、“登于大示”，即进入被隆重祭祀的祖先名单。

可惜子渔是个病秧子。患有牙痛、眼病和足疾。为此武丁还给他举行过攘灾的祭祀。然而武丁的努力并未挽回子渔的性命，他还是先于武丁离开人间。

王子孝己死于妇好之后。妇好墓中有5件铜器铭有“司母辛”，计大方鼎1对、四足觥1对、方形高圈足器1件。司母辛的作器者可能即孝己。子渔死后，埋在了妇好墓旁边。

英雄无名

1998年，安阳殷墟黑河路考古工地，一名工人正在清理墓葬中的人骨架。当他用毛刷剔除掉粘在人骨架头部的泥土时，不禁失声“噫”了一声。原来他发现，这是一具不同寻常的人骨架。死者的头颅顶部，赫然出现一截断失的青铜兵器铜戈的戈头，深深地残留在颅内。

这座墓编号为98ABDM745。死者头颅上明显的伤痕，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高度重视。标本运回队部后，多名专家学者对他进行测量和鉴定。结果基本一致：死者头骨上的兵刃损伤痕共四处。其中一处额骨顶部中央，长4米、宽0.5厘米，一截青铜戈的戈头夹在其中。戈头冲破额骨，直达头颅内侧，致使颅内骨质脱落，



形成凹坑。一处在顶骨后部，长4.8米、宽0.2—0.3厘米。一处在顶骨左侧，长3.5米、宽0.2厘米。一处在鼻骨上部，为横向直痕，长1.8厘米。不仅头部有损伤，死者左臂肱骨的上部亦有一道损伤，长3.8米、宽0.2厘米，系同样的条状砍斫痕。死者是男性，年龄30岁左右。生前有着强壮的体魄。

他是商代众多将士的一员，沙场生涯，他曾英勇奋斗，但最终抛洒热血，身受重伤，终至殒命。所幸的是，他没有被弃尸疆场，而是被他的同胞运回了自己的故土。最终落葬于自己的家族墓地中。他的墓只有2米长、半米多宽、深也不足3米。尸体被装在髹有红黑漆的棺材内，面向下俯身安葬。随葬品只有石玉环、蛤蚌、贝2枚。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这位将士的名字，但英勇和贫穷却同时记录在他的墓葬之中。正是这样的将士，奠定了历代国王的霸业。



殷墟出土的士兵头骨。经历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他身受重伤。其中直接砍透肌肉，直入骨骼的，头部有4刀，手臂上另有1刀。他是带着残留在头顶颅骨内的青铜戈头死去的。一位日本法医观察过他的头骨。这位法医说，即便身中数刀，但这位士兵并未立即死去。他一定是从战场回到家乡后死去的，因而得以归葬家族墓地。

拾伍

鬼神泣，文字出

中国古代有仓颉造字的故事。汉字造成，鬼神哭泣。自一开始，汉字就注定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成就。

然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可以基本识读的最古老的汉字，就是从殷墟甲骨文开始的。

甲骨文是刻写于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是殷人的占卜记录或记事。迄今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约15万片，



世界三大古老文字体系：埃及象形文字（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甲骨文

（右）。前两种文字今天已经灭亡，但甲骨文经过3000余年的发展，至今仍然被十几亿人使用着。世界四大古文明还包括印度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中的古文字系统哈拉帕文字实际上并不是成熟的记录语言的文字。或者说其成熟性不能与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甲骨文相比。

记有5000余单字，卜辞10余万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等各方面。

甲骨文是公认的世界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它与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一样，代表着古代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切文化成果的灵魂。

甲骨文：保存至今的刀笔文字

殷墟有关甲骨文的几次大的发现，分别是1936年发现的YH127甲骨贮藏坑、1973年发现的小屯南地甲骨1991年发现的花园庄东地甲骨以及2004年小屯南路发现的甲骨。

YH127位于小屯东北地，是一座圆形坑，坑口直径1.8米。内出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完整的卜甲近三百版。这是殷墟历次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文最多的一次。坑内的甲骨排列不大整齐，大块的与小块的、有字的与无字的、正面的与反面的、腹甲与背甲，彼此叠压、互相枕藉。在甲骨堆中发现一具蜷曲而侧置的人骨架，紧靠坑的北壁，人骨架的下半部被龟甲叠压，发掘者推测此人是与龟甲同时埋入的，可能是当时管理甲骨的人员。

小屯南地甲骨是指1973年在小屯村南发现的一批甲骨。这批甲骨除一部分出在近代扰乱层和商代晚期的文化层外，大多数出在灰坑中。小屯南地共发现商代晚期灰坑120个，其中58个出刻辞甲骨，少者每坑一两片，多者数百片乃至上千片。在大多数灰坑堆积中，甲骨与陶片、兽骨（有时还有人骨）、灰烬等夹杂在一起。少数灰坑中，甲骨集中地大量出土，并多见大块的卜骨，其他遗物甚少。如H24，坑口近椭圆形，距地表深0.8米、南北径长约2.7米、东西径长1.8—2.1米、坑底距坑口0.7—0.8米，自坑口以下，卜骨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骨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隙，排列没有什么规律，骨白亦无一定的方向。卜骨层厚约0.3—0.5



殷墟小屯YH127甲骨坑出土的一片甲骨。





甲骨卜辞的发掘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发现甲骨后，工作人员只能一点一点地用毛刷清理。每一片甲骨，不管有字无字，都要编号，

而且要详细记录其所在位置。甲骨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必须准确地画在图上。绘图、照相之后，所有甲骨的提取都按编号进行。同一坑内出土的其他文物也都一同编号提取。上图系2004年发掘两个小型甲骨坑的工作场景。

米，卜骨堆中不见任何遗物，只在坑之底部出土少量碎陶片。全坑出土刻辞卜骨共1365片，没有卜甲。此种密集出土甲骨的坑，应是有意埋藏甲骨的窖穴。

花园庄东地甲骨坑位于花园庄东100余米，坑口呈长方形，长2米、宽1米。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辞卜甲300余版。该坑年代属殷墟文化一期。其甲骨卜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因而对商代家族形态的

研究以及甲骨学中“非王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解一个字即可获博士学位

现已发现的约5000个甲骨单字中，约有1500个已为学术界识读；另有大约500字已有学者做过考释，不过释读结果尚未达成共识。比较容易的字都已经被识读了，新识文字的难度越来越大。现今的学术界，能够正确解释出一个甲骨字，即可获得一个博士学位。

甲骨文显然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其造字法“六书”俱备，但主要有象形、会意、形声三种。象形字是通过所谓“类物象形”的办法，通过类似绘画的手段勾勒出对象的轮廓，以记录和表达对象，如鱼、车两字，都是典型的象形，字义浅显易懂。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合并起来，使其发生内部联系，以此表达意义，如采、降、上、下等字。采字上部为“手”，下部为“木”，手在木上伸展，会其意，表示从木上摘取东西。降字右旁有台阶，左旁为人足象形，足的方向朝下，表达的意思是从上往下走，故为降。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结合而成，形符表意，声符表音，如彭、河。彭的左部为商代鼓的形状，右部三撇表声，合在一起，表达的本意是击鼓之声，读为“péng”。河字左边表水，右边表“hé”声，不仅意义自明，读法也一望便知。



甲骨文中有一些字的结构还不大固定。例如“逐”字，它可以在足迹之前用“豕”的象形，也可以用“鹿”的象形。我们既可以看出商人对事物描述的细致和具体，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同字异形”的例子。



甲骨文今文对照表

象形字		会意字		形声字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虎		斗		洵
	鹿		旦		洵
	马		得		沮
	牛		牧		女可
	豕 (猪)		牢		艰
	犬		鼓		女自
	象		析		姜
	凤		祝		姓
	鱼		教		妊
	见		孕		姪

(续表)

象形字		会意字		形声字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贝		安		滴
	角		吹		潢
	禾		井		弓斤
	黍		获		彭
	果		采		杜
	水		及		杞
	州		鸣		妊
	學		椿		新
	甌		启		蒿



(续表)

象形字		会意字		形声字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甲骨原形	现代隶定
	壶		声		河
	门		典		洛
	舟		降		任

车和鱼是甲骨文中两个典型的象形字，但这两个象形字在抽象、概括上有重大区别。

鱼的形体比较简单，车则不同。马车本身具有复杂的结构。造字之时如何将复杂的马车抽象出基本特点，需要画家般的天赋。当我们将考古发掘的马车实物与甲骨文中的“车”字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商族人的这种天赋。





甲骨文中的天干
卜辞：甲子、乙丑、
丙寅、丁卯……天
干、地支对于商人的
意义，怎样估计似乎
都不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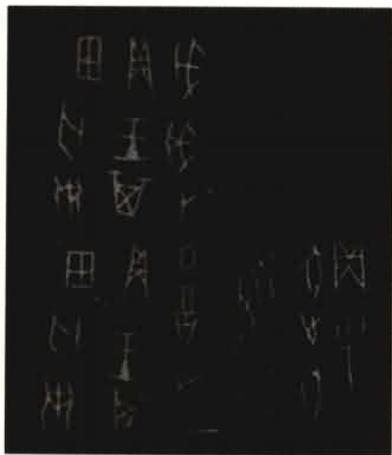
他们以干支纪
年、纪日。这一传统
左右了中国天文律法
数千年。

与今天的汉字相比，甲骨文还带有一定原始性。如字的结构还不大固定；一些字既可反写，也可正写；偏旁可左可右；必要时笔画也可增减；有时又出现所谓“异字同形”字和合文。这些特点，虽然给我们识读甲骨文带来一定困难，但并不妨碍我们读懂大多数甲骨文句子。因为甲骨卜辞中的句子结构基本上也是主、谓、宾结构，与今天汉语语法基本相同。

卜辞的内容涉及天象（风雨雷电）、旬夕（纪时、纪日）、祭祀、田猎、征伐、年成、王事以及日常生活，保存了大量的族名、人名、官名、祖先名以及某些重要事件。是研究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甲骨文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书写方式，也为后世奠定了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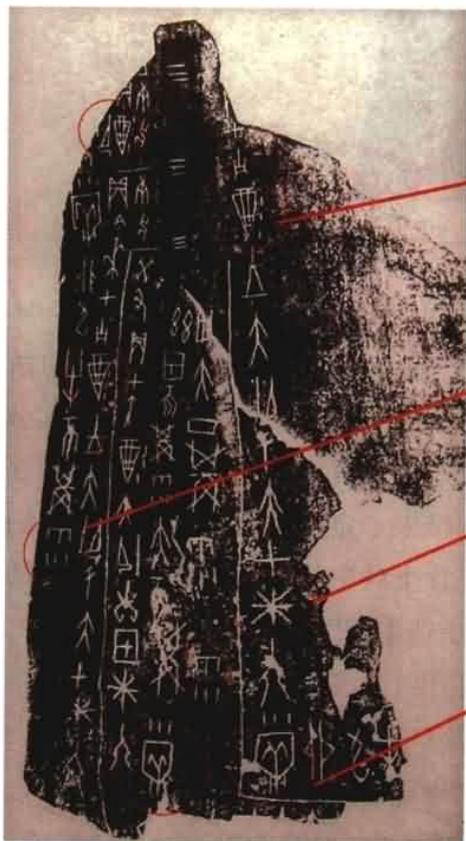




甲骨文有关田猎的记录。

左（下半部，从右向左读）：丁酉卜，贞王其田无祸。释为丁酉这天占卜，问王出行打猎不会出事吧？

右：贞呼逐豕获。意为追捕野猪会成功吗？



壶形容器内有液体表示酒

( → 酒)

雨水下滴为雨

( → 雨)

燃薪之状为爨

( → 爨)

羊或牛在圈内为牢

( → 牢)

与鱼、车等象形字不同，会意字的特点是意在画外。这片残破的卜骨，整篇有较长的铭文，其中包括多个会意字，虽然一眼看上去有些费解，但一旦将现代汉字放在他们的旁边，领会起来并不困难。

础。例如其自上而下的书写规则，成为后世的汉文写作的通行方式，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水平行文法取代。

毛笔字：商代的日常书写

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甲骨文，但有充分的资料表明，商代的日常书写并非“刀笔文字”，而是与秦汉以后同样的写在编成册的竹简或木片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的“册”字，正是以绳索穿串竹片或木牍之形。有的甲骨片上的个别文字本身就是书写而不是刻上去的。

商族人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实在有太多的证据。除了上述提到的“册”字之外，还能列出以下几种：

1. 甲骨卜辞中的“史”字、“笔”字，均形如用手执笔而非以手捉刀。
2. 殷墟出土的玉石器上多次发现毛笔书写的文字。
3. 一些甲骨文中还留有朱笔书写的字迹。
4. 青铜器的铭文中，大量字迹可看到圆润的笔道或笔锋，有的字甚至还有提顿。
5. 甲骨文中“典”、“册”两字。



这是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至今不能真正识读，但意思却不难解。其左、右两侧各作“册”字，即以绳索

穿连的竹片或木片之形。中间的“S”状弯曲部分，应是绳索之象形。三个部分放在一起，正是以绳索穿连简牍之意。而简牍之存在，表明商代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





甲骨文中的“史”、“册”、“典”字。“史”字如以手执笔（左一）；“典”（左四）、“册”（左二、左三）两字均系与竹简相关之字。铜器铭文中，更有“作册”二字（左五）。“作册”的本意，似可理解为记录并保存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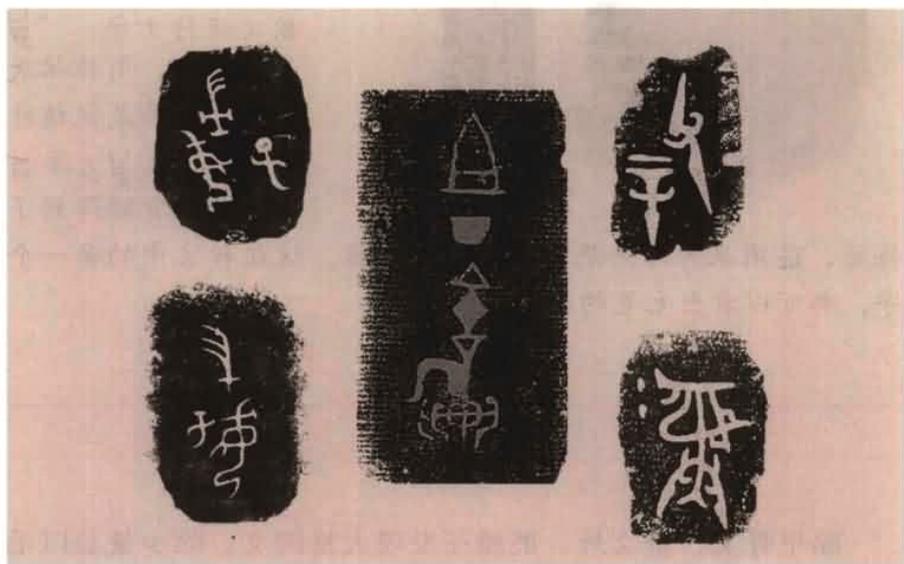
6. 殷墟发现一种弧刃的削，可能是最古老的书刀。

铜器铭文多数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如鼎、簋、卣的器内底或内壁，觚的圈足内壁，斝（jiǎ）、盃（hé）、爵的盞（pàn）内侧，尊、壘（léi）的器口内、器内底或圈足内，觶的内底或盖内等。铭文通常只有两三个字，内容涉及器主族氏、祖先称号、官名、爵位、器物存放地点、器主受赏、祭祀、游猎甚至参与战争等等。

后冈祭祀圆坑出土的“戊嗣子”鼎，是目前所知铭文最长的殷墟铜器。

殷墟的少量甲骨卜辞上、玉石器上，都发现过毛笔书写的文字。他们直接证明商族人的日常书写是用毛笔完成的。1999年，考古队在一座殷墟晚期的贵族墓中发现了这件保留有毛笔字迹的商代玉璋。





铜器上的铭文，是通过陶范铸造出来的。铭文范上的字，系先用毛笔写好，然后依笔画刻就。这样一来，铸造出来的铭文，与原来写好的毛笔字如出一辙，笔意全在。

上图所见为铭文范以及由铭文范制成的拓片，显示出依照毛笔的笔意刻就的痕迹。

下图是从青铜器铭文上拓下来的拓片，果然保留了毛笔字的书写痕迹。“妇好”的“好”字、“祖丁旅”的“旅”字以及“彝”字，都保留了只有毛笔字才能留下的圆润笔道，而“父辛”二字，则明显地显示出只有毛笔才能写就的“笔锋”。





1995年出土于安阳铁西路4号墓的1件铜簋，时代属殷墟文化第四期。口径17.5厘米、通高13厘米，重1.95千克。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腹两侧有兽头环状耳。腹内底有铭文两行十字：“辛酉易贝，用作妣庚簋。”大意是说该件铜器的主人在辛酉这一天受赏赐得到了

海贝，遂用来为母亲庚铸造了该件铜簋。这组铭文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出毛笔的笔意。

除甲骨文、金文外，殷墟还发现大量陶文。除少量是以毛笔写在陶器上的外，绝大多数是刻的。通常刻在陶器的口部、肩部、腹部，少数在器内壁、器底。书写的陶文均在器之内壁。陶文的内容主要有数字、方位、族名、人名、干支、占筮、记事等。一些玉石器上，也可见刻写或者书写上去的商代文字。后者如写在玉璋、玉柄形饰上面的文字。

拾陆

『狰狞』与质朴

艺术的意味与美感

殷墟文物所展示的艺术成就，至少涉及了实用工艺、雕刻、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门类，而以实用工艺留下的文物最为丰富。

殷墟实用工艺品的材质，包括铜、玉、陶、石、骨、角、牙、竹、木等。实用工艺的核心内容是器物的造型和装饰。

青铜器装饰艺术

铜器装饰多采用“中心聚焦”的手法，即大部分铜器的器表花纹都围绕一个、两个或四个中心来展开。“聚焦中心”常常是怪异的兽头或兽面。一般采用饕餮纹、夔纹或其他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的突显花纹或主体花纹，而用于装饰的纹样，决不是生硬的点缀，而是充满意韵和情趣的。由于多数铜器实际上都是当作礼器使用的，礼的实施过程通常具有严肃静穆的要求，因而铜器上的花纹大都凝重森严甚至狰狞恐怖。但也有一些铜器花纹所传达的全然是轻松的生活情趣，如殷墟出土的1件铜盆，其内壁铸有4条游鱼，盆是水器，盆内盛满水后，游鱼形象浸入水中，则生意盎然。



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的青铜圆鼎。口径41厘米、通高（含耳）55厘米，重26.1千克。品相端庄大方，纹饰精美，堪称青铜器极品。



牛尊。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大墓出土。全长31厘米、高23厘米。正面的眼、嘴、鼻、角形象逼真。全身比例适宜，憨态十足。

商代铜器装饰艺术以庄严和神秘著称，美学家称之为“狰狞的美”。饕餮是其典型代表。

饕餮是指青铜器上的一种兽面图案。这种兽面造型狰狞怪异，几乎普遍地见于商代青铜容器的器表。商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种兽面呢？长期以来，艺术史家试图解开饕餮的含义。而这类艺术史家以西为学者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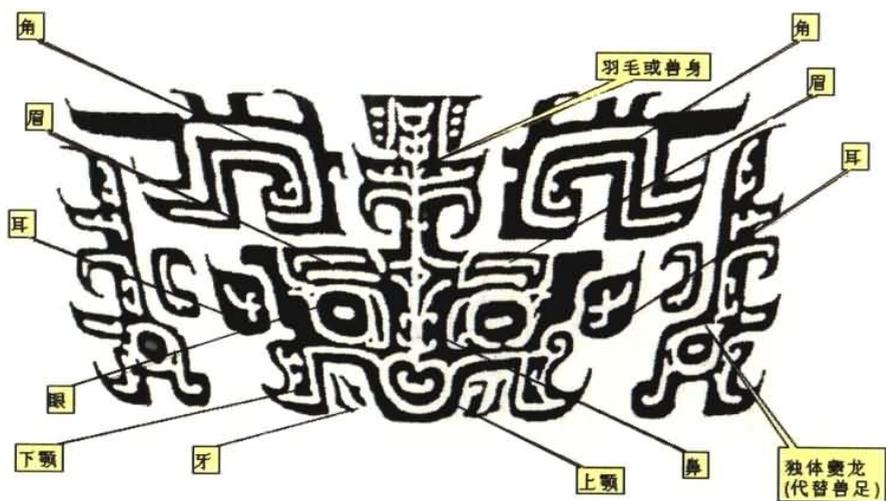
殷墟苗圃北地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凤鸟方鼎。口长17厘米、宽12.7厘米、高21.5厘米，重1.2千克。几乎同样形制和花纹的鼎全世界共5件，其中国内3件，另外2件在国外。铸制精良，鸟纹极为生动。被各收藏单位视为珍宝。





青铜觥的盖。1991年出土于后冈9号墓。器身已失。盖长23厘米、高部高10厘米。此器正视为一鹿头，后视亦为一兽面。腹部两侧也各饰夔龙一条。其特点是从前、后及两侧均可见到动物形象。真是独具匠心的作品。后冈9号墓是带墓道的大墓。推测该器的主人曾经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饕餮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一种贪婪动物，而商代铜器上的兽面所表现出的形式，正好是文献中提到的饕餮“食人未咽”的样子。故古人将商代兽面称为饕餮。因此，将商代铜器上的兽面装饰图案解释为贪婪的怪物，再命名为饕餮是很自然的。



商族人制作的“饕餮”面多种多样，绝不雷同。然而他们的总体结构是基本一致的。这是一副典型的饕餮面。将其折解，可观察到眼、眉、耳、嘴（包括牙和上、下颚）等部位。通常兽面的两侧还可见其身躯或足。有时候则以单体独立的夔龙代替放在足的位置。因此它们既是单体的夔龙，又是饕餮的足。

以“饕餮”一词来命名这种兽面，实际等同于给出了一种解释，即认为这种兽面即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饕餮”。多数学者为谨慎起见，通常仍客观地称之为“兽面”。

不过现代艺术史家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对商代铜器上的兽面装饰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分成两派。一派主要是形式主义艺术史家，他们认为商人铜器上的兽面除了装饰功能外并无其他含义。例如美国学者罗越（Max Loehr）坚持说：“如果商代铜器上的装饰全然只是一种设计，或者说是纯形式的形式，是没有真实事物为蓝本的线条，则我们几乎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纹饰）不可能具有某种特定意义，无论是宗教上的、宇宙观的，还是神话的。”另一派意见正好相反，坚信纹饰是有意义的。如1947年，约翰·波普（John A. Pope）说，商代人用动物纹饰认真装饰铜器是为了给贵族们用于与国家有关的功能的，不可能是做来玩的。尽管我们现在并不真正知道，甚至我们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纹饰的意义，但我们决不能无视它存在某种意义。

193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写过一篇文章，将夔纹的所谓“瓶形角”看成是男性生殖器。1932年，一名叫Carl Hentze的学者因为相信中国古代的宗教基础与月亮有关的神话，认为早在商代时，青铜器上装饰的牛角因其形曲而代表月亮，



司母戊鼎上的“饗饗”面。司母戊鼎上的“饗饗”面实际由两条夔龙的侧面组成。即两条夔龙头部相抵，

单看各自为龙，合在一起从正面看则为一兽面，或称“饗饗”。这种由平面构成的多维视域，在商代艺术品中十分常见。





如果这种细部不同，但结构类似的兽面可以称为“饕餮”的话，在商代文化中，“饕餮”几乎无处不在。不仅贵族所用的礼器普遍装饰“饕餮”，甚至兵器、工具上也常常以兽面装饰。用绿松石在铜戈的内(读nà，指装柄的部分)部镶嵌出“饕餮”，不仅美观，更是贵族身份的象征。镶嵌作为一种艺术，由于安装“饕餮”的需要而十分发达。

饕餮也代表月亮，代表死亡和黑暗。1937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Greel)提出饕餮可能是水牛的看法。1952年，又有学者提出饕餮是虎，是日神而非月神。由于这些说法多属猜测，接受的人很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类比法被引入考古学中，研究商代青铜器花纹含义的学者开始多起来。1978年，乔丹·裴普(Jordan Paper)提出饕餮是商代萨满的面具。

美国学者张光直也认为铜器的花纹是有意义的。他以商代材料与北美印第安的人类学材料类比，同时举中国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为证。他所采用的直接证据则是商代的一种习见的图案，即“人兽母题”。在张光直看来，商代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古代萨满文化中萨满借以通往另一世界的工具。

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en)以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理解商代铜器。根据她的观察，一方面，饕餮变化多端，但又都能辨认(一

些学者试图将这种图案具象为某种具体动物如水牛、虎是不对的，认为是商人创造的一种神界动物也是不对的。但尽管饕餮不是一种具体动物，它又的确与水牛、棉羊，可能还与山羊、鹿、虎等用于祭祀的动物相关联。偶然情况下，甚至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动物形象，如牛方鼎中的牛、鹿方鼎中的鹿）。艺术家并非在自由创造，而是一次又一次在重复表现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铜器上的动物图案似乎并不表现某种真实动物，也不是某种创造的动物。这些特征正是原始艺术的特征。它不是纯粹的装饰，不是再现，而是以艺术的手法突破现实。另一方面，商代的装饰图案只局限于几种特定的动物形式，而这些动物又都有特定的隐喻事物的特性。如饕餮有时表现为虎形，是一种吃人的兽；龙是一种与“黄泉”有关的动物；鸟有时“龙形化”，在铜器表面可以与“龙”混为一谈，因此也与地下世界有关；现实中的蛇则春天脱皮再生；鹿也具有脱去双角的特性。再一个方面，铜器的使用上常常与祭祀有关。这正是商代宗教的中心内容，而



妇好墓出土的骨雕蟾蜍、穿山甲和怪鸟，其中蟾蜍并无实用功能。



其焦点是通向死亡。因此需要一种奇特的语言去超越生与死的界限。铜器可能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她寻求解释纹饰的意义。

就饕餮而言，她与其他学者一样，注意到法国和日本的虎食人卣，以及司母戊鼎、妇好大钺等器物上的人兽母题图案。但她认为，人兽母题出现在青铜钺上，可能并不表示通往另一世界的萨满通道的再现，更可能是与“死亡之路”有关。铜器上的龙、龟、鱼、鸟等图案，比较常见于铜盆。盆是礼制活动特别是祭祀活动中事先净身的器皿，因此龙、龟、鱼、鸟的解释也应与祭祀等联系起来。加上盆与水有关，可能暗示黄泉的存在。总之，这些图案，都与死亡有一定联系。

她还解释了商代铜器上比较常见的猫头鹰和蝉的含义。猫头鹰在中国属于不吉的动物，它之所以铸在铜器上，正是与死有关。蝉是一种具有“死后转生”的象征意义的动物。因此也与死亡相联系。

总之，艾兰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决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其象征意义集中在“死亡与转生”的主题。

关于商代铜器纹饰的含义问题，一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尽管以往学者提出了种种解说，但尚无一种解说能够令所有人信服。

饕餮背后的秘密，仍然期待着新的解答。

骨牙雕刻艺术

商人的骨雕艺术，既有实用器上的装饰，也包括单纯的骨雕作品。前者如形形色色的商代骨笄和骨刻刀。这种随身佩戴的小件骨制品，经常被精雕细刻，变得美丽大方、人见人爱。

骨笄器形简单，主要由笄头和笄干两部分组成。受实用要求的限制，骨笄的装饰部位几乎无一例外是集中于笄头，笄干只是加以磨光以便插拔，但骨笄的笄头装饰大都精雕细刻。从效果上说，各种有笄头装饰的骨笄一旦插在头上或冠上，常常直接起到发饰或冠饰的作用。

妇好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



与骨笄相似，刻刀的刀柄也大多被雕刻成鱼、龟、鸟、穿山甲等动物形象。不影响刻刀的实用功能而艺术效果甚佳。

一些所谓的实用工艺，由于对美的强调，已经失去实用功能，变成了纯粹的艺术品。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3件象牙杯便属此类。

这3件象牙杯中，有2件是成对的夔盃杯，杯身似觚，自口部以下雕刻花纹4段，分别为饕餮、夔和大三角形纹、变形夔纹。饕餮的眼、眉、鼻都镶以绿松石片，各段花纹之间用绿松石纹带隔开，纹饰清晰精细。另1件为筒形带流的虎盃象牙杯，器表主纹浮于地纹之上，自下而上分别布有鸟、夔、饕餮等形象及三角形纹，几乎没有空白处。从艺术分类上说，这几件象牙杯与普通的实用器物有一定区别，其制作更强调审美效果而显然对实用功能有所忽视，应属特殊工艺品。

玉石艺术

中国人爱玉的传统，源自史前。到商王朝的时候，人们不仅爱好美玉，甚至已经有了收藏古玉的概念。2000年发掘的花园庄东54号商墓中，出土大批玉器，其中一部分玉器实际是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相当于夏王朝时期）生产的。在前人的基础





猪形龙。1999年殷墟一座带墓道的大墓中出土。其主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此种猪形龙。在史前时期的红山文化中流行一时。商王朝时期，龙本身就是贵族的题材。究竟是这件玉龙的主人收藏了一件“古董”，还是当时的他们仿制了一件红山文化玉器呢？

上，商人将琢玉的工艺提高了一大步。殷墟出土的玉产品，不仅玉的种类复杂，而且设计、工艺、纹饰都远胜于前。

玉器的雕塑是三维空间的艺术，它是通过雕琢玉材来塑造可视而且可触的艺术形象。由于玉材打磨后晶莹剔透，又能够长期保存，因此给艺术家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

通过运用雕、钻、刻、勾、彻、磨等手法，商人生产了种类繁多的玉质艺术品，其中又以动物题材的艺术品最多。

鸟是殷墟玉雕艺术品中最常见的一类。频繁地表现同一种动物，对创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商代玉雕工匠们雕刻出立鸟、飞鸟等各种姿态。即使是同一种姿态的鸟，也有细部的不同。将一只小鸟依附在另一只鸟的背部，实在是充满情趣与爱心之作。



玉雕作品的题材，有怪诞动物、写实动物、人像、人面以及几何图案等。写实动物以圆雕为主，也有一部分片雕。物种几乎包括所有的常见动物，如虎、象、熊、鹿、猴、马、牛、狗、兔、羊头、蝙蝠、鹤、鹰、鹦鹉、雁、鸽、鸬鹚、燕雏、雀、鹅、鸭、鱼、蛙、龟、鳖、螳螂、蚱蜢、蝉、蚕、螺蛳等，大部分作品造型优美真实，反映出人们对动物世界的细致观察。

玉、石雕塑作品中圆雕甚多，精品比比皆是。出土于妇好墓中的1件玉人，头戴华冠、硕耳巨目、双臂上举，侧视作蹲踞状，俨然贵族派头。同墓出土的1件玉鹿，回首撅臀、前蹄后收，轻灵可爱。同墓出土的玉象则身体肥硕，一副憨态。特别是该墓所出的1件玉凤，细线雕刻，体态弯曲，作回首状，凤尾剪开，极富动感。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中的

上：同样是表现水禽，即使姿态类似，嘴部的细微也不同，也传神不同。

下：鱼的表现，不仅仅是种类不同，神态各异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左：这只蟾蜍，因为肥而可爱。

右：兽面的雕刻，背后不光是技艺，还包涵对神灵的虔诚信仰。所以产品看上去充满神秘的能量。

石虎首人身兽爪圆雕像，展现的则是另一种审美趣味：该雕像作曲膝跪坐状，前爪置于膝上，臀部压住后爪，头颅硕大、张口露齿，周身刻出双线花纹，形态森严威猛。骨角牙蚌类雕塑作品也不乏艺术杰作。

写实与夸张并重是殷墟雕塑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常常根据题材的需要或作品的内容有所侧重。无论是写实还是夸张，技法都十分熟练。前者反映出人们对事物、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后者则体现了人们对社会的理想与态度。

绘画、书法与音乐

绘画是通过色彩、线条和光线的明暗来表达审美感受的造型艺术。考古发掘提供了部分研究晚商绘画艺术的间接资料，如墓葬二层台上的画幔图案、棺材上的漆痕、铸铜陶范以及少量玉、石器上的朱书墨迹等，雕塑、实用工艺等立体艺术作品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殷墟的少量甲骨以及玉石器上都有墨书或朱书笔迹，个别墓葬中出土的皮革或木质器具上的残存图案也是毛笔绘制的，可以推测毛笔是晚商时期的主要绘画工具。殷墟曾发现铜质和陶质



商族人的色彩观念已经十分发达。常用的颜色有红、黑、黄、白、绿。为了达到更为丰富的颜色效果，他们发明了“调色器”。调色器有陶质的，也有铜质的。这便是一件青铜调色器。1972年殷墟西部的墓葬中出土（72AGM82）。此器边长7.2厘米、高7.7厘米。器表面有五个圆孔，中间一孔空透，用途不明。但分布在四角的四个孔中，发现了不同颜色的颜料。

的调色器，有理由认为当时的色彩艺术已经成为绘画艺术的一部分。色彩的调制是十分讲究的，不少晚商墓葬的棺木板痕上，尚保留着不同颜色的漆痕；细审之，最常见的是红、黑、黄、绿、白诸色。

绘画题材和技法，因限于资料难以详论。20世纪30年代发掘安阳殷墟时，学术界曾获得数件漆木器的遗痕，其上保存了几幅难得的商代绘画图案。其中画面较完整的是殷墟西北冈1217号王陵大墓所发现的木鼓的鼓腔表面的一对饕餮。该对饕餮相向蹲坐、垂耳敛尾、巨目相视，构成画面的主体；饕餮的周围是蚌贝嵌成的装饰，其上下两端是红绿相间的水波以及平行的红色或黑色横条纹。安阳小屯村晚商墓葬M167发现的1件盾痕上发现过朱绘而成的图案，该盾作梯形，盾架由3根竖木、2根横木构成，相接处可能用绳捆扎；由中间竖木为界，盾体分为左右两半，各以红色绘1只立虎侧面形象，两虎造型基本一致，但相背而立，皆巨目圆瞪、锐齿突露、利爪前伸，硕大的虎尾上还画有重环状花纹。绘画作品中还有一些非动物题材。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尚处于文字发展早期阶段的商王朝，就已经有了书法作品。





最古老的书法精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商代青铜鼎的腹腔内壁铭有“作父辛宝尊彝亚牧”。意思是说，铸器者为父辛铸造了一件宝鼎，作器者自称“亚牧”。这篇铭文的关键是最后一个字“牧”字。该字被有意识地拆成两半，分上下写成。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取得整体的布局效果。这段铭文可能是我国所知的年代最早的书法精品。通篇字体道劲又不失秀美。其中尊彝的“彝”字笔道圆润，强烈显示出毛笔书写的特征。这是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一篇书法杰作。

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以一定时间内和谐流动的音响来表达人类的审美感受。商代社会距今久远，逝去的声音无法直接听闻。因此，考古发现的部分商代乐器，就成为今天研究当时音乐艺术的最珍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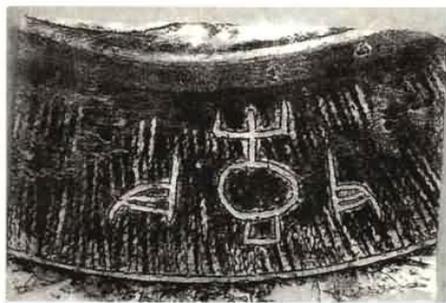
出土乐器就其类别而言有鼓、磬、铙、埙四种；可能还有管弦类乐器，但管弦类乐器一般用竹木制成，不易保存。

鼓曾发现于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中，木质鼓体，鳄鱼皮质鼓面，出土时腐朽严重。从遗痕看，鼓的两端略细而中腹外鼓；鼓面的皮，一面已破裂，

保存完整的一面呈圆形，可见排列有序的鳄鱼骨板，其上还绘有朱红色宽螺旋纹；鼓腔表面涂成红色，上有绘画图案。鼓高0.68米、鼓面直径0.6米。该鼓与一鼓架伴出，鼓架系拆散放置，主要部件是四根木柱。

磬皆由石、玉材质制成，常出于墓葬，一般3件或5件成套；也有单件的，称为特磬。1950年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中的1件大石磬由青灰色大理石制成，长84厘米，正面雕刻虎纹，曲身卷尾、利爪前伸、张嘴欲吞，颇有生气；该磬背处有一圆孔可以悬挂。

铙是铸造而成的铜质乐器，基本形制作扁圆体，于部平直或者中心下凹而两端翘起，下端有中空甬，可以装木把。一般认为演奏时，铙的口部朝上由人执于手中，故铙又名执钟。铙常常



商代文字中的乐器演奏。

甲骨文中的“声”字，乃悬磬于架，一手执槌击之（左）。

甲骨文中有“鼓”字，乃横置鼓于一座上，一手执槌作敲击状（右）。不过陶文中又有双手执槌击鼓的象形字（中）。

成套使用，多数为3件一套，也有5件一套和4件一套的。凡成套者，大小依次递减。1995年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铜铙即为一套3件。





礼乐制度的见证：**石磬**。磬是商朝人的重要打击乐器。后世有编磬之说。商代的编磬可能也是3件一套。不过，商人的墓葬中，更多的是单件出土。磬使用时，系用绳子系在磬架上。故磬的背部有吊绳的圆孔。



礼乐制度的见证：**铜铙**。铙又称执钟。其用法是口部朝上，可就地击打，也可行进过程中演奏。商人演奏铙时，往往3件为一套，可能也有5件一套演奏的。之所以知道其为3件或5件一套，是因为他们从墓葬出土的时候总是3件一组。而且3件之间，其大小依次递减、排列有序。唯妇好墓中出过5件一组的铙。

埙的基本形制为卵形，通常上端有一吹孔、体腹有5个音孔，音孔数较早商以前增多了。除陶埙外，也发现过个别骨埙和石埙。20世纪30年代于殷墟西北冈王陵区1001号大墓翻葬坑中发现的1件骨埙长5.3厘米、底径



音乐之声。陶埙系用于吹奏的乐器。殷墟出土的埙主要是陶质的。也有骨质的埙。1988年考古学者在殷墟南部（抗震大楼）清理的一座墓中，出土过3件一套的埙。可见埙作为乐器，有时可能以多人演奏。



殷墟出土各种铜铃甚多，但个体都很小。最常见的是狗铃，通常系在狗的颈部。狗奔跑时一路铃响，生机无限。此外还有马铃，形体稍大。殷墟还出土过象铃，明显厚重一些。虽然目前发现的铃都与动物有关，但商人很可能有更大的通过槌击演奏的铃。甲骨文中有一个字，系悬挂一铃，人以手执槌击之。

1.56厘米，该埙外形与体腹5个音孔的普通陶埙相近，但体腹的正反两面刻有兽面纹。兽面以“目”字形双眼为中心构图，短足短尾，额间充以菱纹，十分生动流畅。

音乐界曾对部分晚商乐器进行过测音研究。殷墟武官村大石



磬的发音稍高于#C，振动数为280.7，具有浑厚的音色。故宫博物院藏有3件一套商代石磬，据传亦出土于殷墟。测音实验表明，3件石磬是按一定的音阶或调式组成的。陶埙的制造趋向规格化。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陶埙至少可以发出12个音，能吹出简单的乐曲。

除以上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以外，甲骨文中还保留了一些音乐艺术的线索。如甲骨文中“乐”字形如丝附木上，罗振玉、郭沫若皆以为与琴或瑟一类弦乐器有关。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成立，则殷墟时期的中国已是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皆已具备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时的音乐已出现多种音阶调式，包括五声音阶、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部分半音，出现了标准音或绝对音高观念。

舞蹈是通过人的有韵律的形体活动来抒发情感和表现美的，它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音乐直接诉诸听觉，而舞蹈首先诉诸视觉，因此又被称作动态的雕塑。考古发现的晚商实物中尚未见直接反映舞蹈艺术的材料。曾有人认为殷墟的小型玉钺或带羽鸟纹的铜戈等与舞蹈有关，是“舞者”握于手中的道具，但证据尚嫌单一。不过认为乐器多与舞蹈有关，应是合理的推测。



甲骨文中的“舞”字，犹如人披有羽毛。

拾柒

祸起干戈

王朝的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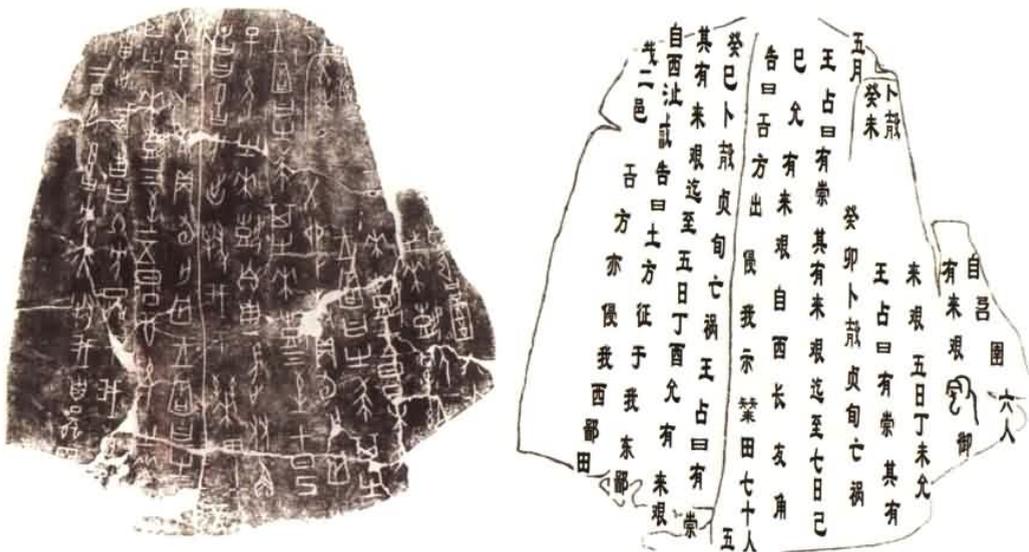
商王朝的崛起，本身就是血雨腥风、多年厮杀的结果。商汤接过衣钵时，暮年的夏王朝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先王的遗命和教训早已淡忘。末代国王夏桀自恃能手搏猛虎，骄奢自恣。他宠幸美女妹喜，对邻近小国横加挾伐。商汤因而起兵攻夏。

商王朝发展期间，周边与众多小国、部落相邻。政治上商王朝是他们的盟主。这些邻国的部族并不总是听命于商。他们时而臣服，时而反叛。为了维系王朝的统治，历代商王也经常不得不选择战争。

商王朝的西北，今天山西一带，分布和居住着几个雄族：土方、土方和鬼方。商王武丁时，商王朝与这几个部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当年大收藏家罗振玉收藏的甲骨中，有一片记录着商王朝与西北强族的关系。

这片甲骨记载了这样一条信息：



甲骨原片拓片及拓片对译。

左：《甲骨文合集》6057拓本，为一件刻辞牛户胛骨的残片。正、反两面均有刻辞。此版共有10行刻辞，自右向左第六行和第七行之间有一刻线，刻线左右各为一完整刻辞。右：《甲骨文合集》6057摹本隶定，此版刻辞记述的是商王朝时期土方和舌方（两个小方国）反叛商王，土方在商王国的东部占领了两座城邑，舌方侵犯了商王国西部边境的村落。看样晚商时期，周边小国也时有犯境的事件发生。（岳洪彬 提供）

……己巳，允有来艰自西，长友角告曰：舌方出侵我示斲田，(掠走)七十五人。癸巳卜彀贞，旬亡祸？王占曰：有崇。其有来艰。迨至五日丁酉，有来艰自西，沚戩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戔二邑，舌方亦侵我西鄙田。

大意是说：己巳这一天，有不幸自西方传来。长友角（另有学者解释为“长”地的一名叫“友角者”）前来传消息说，舌方侵入我方领地，掠走75人。癸巳这一天，名叫“彀”的占卜师占问，未来的十天还平安吗？商王读了卜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到来。等到第五日丁酉这天，果然有不祥的消息从西方传来，沚地的名戩的来报告，土方又侵入我西部领地，占了我方两个邑。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武丁时代。在不足三十天的时间内，分别有名叫长友角、沚戩等人报告了西北舌方、土方入侵的消息。强敌入侵还掠走边民。边情告急。

甲骨文中的“戈”、“伐”、“兵”、“射”字，记录了商族人的兵器和兵种。



为了平服西北，武丁动员5000兵员，首先选择对土方用兵。与他最宠爱的女人妇好一同出征，写下了一部战地浪漫曲。最后终于擒获土方首领，并使其余部远遁。

平定土方后，武丁转而进攻势力最大的舌方。舌方是游牧民族，向来出没无常，很难捕捉。为了达到打击舌方的目的，武丁几乎每



次战役都亲自出征。参战军队多以王族和王的亲族为核心，辅以其他属邦的军队。武丁多次向祖先占卜询问，究竟应该征集5000人还是3000人进行讨伐。

商王朝的征兵数额，有时会达到万人以上。

有关妇好的“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口”这条卜辞，征兵总数达到13000人。这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大的一次性征兵数额。这样的兵力与现代战争中动辄几十万大军相比，也许算不了什么。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13000人却相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商代的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族武装，即兵员由各宗族中的分族派出。这些士卒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即跟随本族首领接受商王调遣出征。战后则回到本族。死后则归葬于本族的族墓地中。我们以往发掘的墓葬，一个显著的规律是，用青铜兵器随葬的死者，绝大部分都是男子，只有妇好墓等个别例外。因此商代虽有女兵，但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男子。男子死后，为纪念其行伍经历，都喜欢用生前用过的兵器随葬。

当时正式军队的编制是“师”。甲骨文中有所谓殷作三师左、中、右。“师”这一军事建制一直沿用到今天。据有的学者考证，当时每个师约一万人。“师”以下是旅和戍。而战士则按进法编排。最低层以10人为一队。

按照十进制，百是十的倍数。甲骨中有“登射百”、“三百射”的记载。不仅表明可能“百”也是一级军事单位，而且表明当时还有“射手”这样一个步兵之外的兵种。这一兵种大约也是以100人为一队，“三百射”可能指左、中、右三队。

我们不清楚当时是否已经有骑兵，但甲骨文中的“多马”、“多马亚”、“马亚”、“马小臣”等武职，似乎向我们暗示这一点。堪称中国考古学一大奇迹的商代车马的发掘，则以事实向人们宣称，商代的中国可能已经是车战时代的开始。



甲骨文中的“师”字。今天军队中“师”的建制，早已超过了3000年历史。



这些成批出土于殷墟的青铜矛，正好10个一捆，是商代军队以“十进制”编队的证据。

商代的兵器，进攻性的有戈、矛、钺、刀、镞等；防御性的则有胄、甲和盾。

戈、矛、钺、刀均用青铜铸造，按不同器类分别安装木、竹质的秘（柄）。青铜箭头则接有箭杆。只是竹、木质部件出土时多已朽没或仅见痕迹。2000年发掘的安阳殷墟54号墓出土了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套带铭文的青铜戈。其中一部分青铜戈中还残留着3000余年前的木柄。

商代的兵器种类与后世的十八般兵器相比，相对显得单调一些，但战争甚至比后世更为惨烈。

四方的平定，对于商王来说，无疑是重大事件。每获胜利，商王便将俘获的敌方首领奉献于祖先陵前，大肆庆功。然而，





铜器铭文上频现商族人以钺行刑砍杀人首级的图像。掌握了钺，便掌握了对少数人生杀予夺的权力。殷墟发现的商代墓葬中只有大墓才会出土铜钺，墓主们可能生前掌握过军权。

商戈本来有多种不同的形制，如直内戈、曲内戈、歧冠戈、有茎戈等。随着时间的演进，戈的形制还发生过许多重大变化。稍早一些的戈宽而短，援部是直的，不出胡。晚期的戈有了胡并带“穿”（孔），更易于绑缚到柄上。在殷墟的墓葬中，多数戈都发现于死者的齐耳部位，似乎戈柄都略短于执戈者的身高。戈通过啄、勾等动作杀敌，攻击距离可以很长。所以有一部分戈的柄长可能高于执戈者身高。





矛是数量仅次于戈的商代兵器。矛装柄后，刃与柄在一条直线上。其用法以刺为主，与戈不同。

对强族的征伐，绝非一年半载可以奏功，往往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而战争的代价，常常还会转换为仇恨。

经过500余年的厮杀，商王朝的辉煌历史逐渐光芒耗尽。商代晚期，周族在西部的崛起，东夷和淮夷的反叛，最终使得商王朝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

东夷是分布在今天淮河、泗水一带的古族和夷方、林方、孟方等小国。夷人对商王朝统治的反叛由来已久。早在中商时期，仲丁、河亶（dǎn）甲等商王就曾兴兵伐夷。武丁王时，商朝因西北边关吃紧，对夷人有所松懈。至商王帝乙在位时，夷人势力大增，频频入侵。帝乙在位的第十个年头，商王不得不发兵亲征。这次东征，甲骨文中大量记载。甲骨学家根据卜辞复原了当时的征伐路线。此次使用的主要是步兵，兵力不详。商军先在首都举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30天后军队推进到雇，40天后到达一处名为“勑”的地点。这一位置在今天的黄河以南但仍然离郑州不远。随后商王挥师东进，70天后攻至今天的商丘一带，80天后进至今山东曹县附近，然后挥师南下，与地方诸侯攸侯喜的军队会师于今河南永城、安徽宿县间。合兵一处后，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夷方发动进攻，渡过淮水后又与林方交兵。伐夷方、林



方的战役结束后，王师收兵回到攸侯喜的封地，这时距离开首都安阳已经130余天。于是商王决定班师回朝。商王的归程用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因为一面行军，一面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田猎、祭祀和献俘活动。这样既可显示军威，又可追踪残敌。等大军回到出发地时，时间已经过去250天。整个军事行动从准备到结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卜辞显示，商代晚期对夷人的征讨远不止这一次。商王先后擒杀了多



胄是一种防护性兵器。商人的胄有铜的，更多的可能是皮质的。

殷代战车示意图。

这种由1名御手、2名士兵三人一组的“战斗单位”，是今人想象出来的，未必是商人的真正战斗队列。但以戈、矛为主要作战兵器已被无数的考古发现证实。马车用于战斗也是完全可能的。





利簋。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铸铭文32字，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铜器，该器载西周初年武王灭商事。铭文内容隶定为：“武王征商，住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嗣自，易又事利金，用乍檀公宝尊彝。”



名夷方首领。夷人的仇恨有增无减。直到商王朝末年，商纣王仍然不得不继续派重兵向东南进剿夷人。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商王朝虽然在东南方高奏凯歌，但仍然不能挽救大厦倾覆的命运。

公元前1046年，日益强盛的西周，趁商王朝重兵鏖战东南，畿内空虚之际，挥兵东进，直指商都。商纣王匆忙之中率手中仅有的兵力迎敌，与西周军队战于牧野。

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记载了这场著名的灭商之战。

这一仗打得甚为惨烈，以至“血流漂杵”。商军终因兵力不足被击溃，纣王自知无力挽回局面，于是收拾美玉金帛，与娇妻相拥，从容自焚。

干戈赢得的百年基业，在干戈声中轰然坍塌。

历史的车轮，又碾过一个时代。

拾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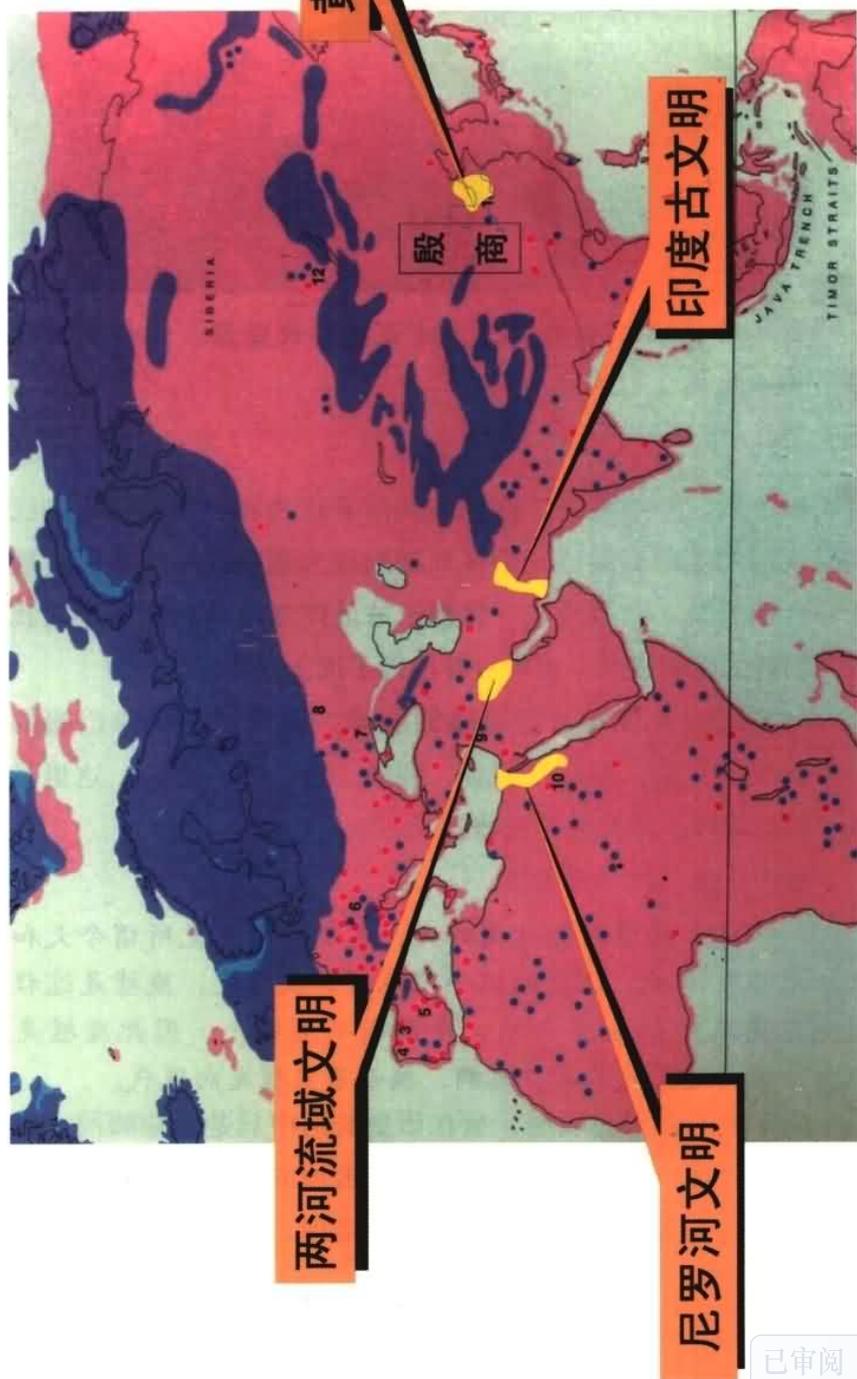
世界的殷墟

时间定格在公元前1046年，殷商王朝的历史被悄然掀过。

西周新朝的周武王得政后，为安抚民心，最初曾将纣王之子武庚就地而封。因放心不下，又指派了自己的三个兄弟分兵监管。武王不久辞世。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生前派去监管殷人的三个兄弟竟然会在殷人后裔的串通下举戈反目。当时新继王位的成王年幼，殷人的反叛着实令朝野震惊。幸得成王有名相周公相辅。为平定叛乱，周公再次出兵殷墟。史称“二次东征”。

这是一座距今1000年左右的宋王朝时期的墓葬。该墓直接挖在3000年前的商代地层上。墓室用砖雕刻成豪宅，以贵族的来世继续书写殷墟的历史。宋代是一个充满情调的社会。人们不喜争执，懂得如何生活。以致今天某些文人学士喊出了“我愿意生活在宋朝”的口号。这座埋藏在殷墟腹地的北宋墓葬，果然揭示了宋人居所的舒适与美妙。但它延续的是死后的生活。3000年前商族人真实而热闹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





黄河商文明

殷商

印度古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

尼罗河文明

世界的殷墟。包括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谷文明以及美洲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地诸原生文明，均在历史长河中被新的文明取代，只有中国文明延续发展下来了。这便是中国文明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2005年，商王朝的废墟上建成殷墟博物馆。工作人员乐于陪同你在废墟上与古人对话。

讨灭叛乱后，为绝后患，西周的统治者认为有必要将殷人彻底迁出商代旧都。因而殷墟一带在周初出现大规模政治性移民。殷墟人口疾速衰减，其结果是一代都邑被最终湮埋。3000余年前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也被一并埋入了泥土之中。

时光沉寂，曾经万方辐辏的殷墟，逐渐沦为埋葬亡魂的墓地。从战国开始，越两汉两晋，到隋、唐、宋、元时，这里早已成了累累荒坟，沦为一片废墟。

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商王朝的勃兴与败废，放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都邑的湮埋与再现，前后用了约3000年。殷墟的考古发掘还远未划上句号。殷墟有太多的宝藏等待揭露和清理，更有数不清的疑问尚待解答。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洹河，是我国北方的一条小型水系。多少个纪元，她静静地流淌在豫北平原，宛如一名裸卧的少女，冰肌玉肤，睡意朦胧。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依偎在洹河怀抱的豫北重镇安阳，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都邑所在地。

这个王朝便是商朝。商王朝在安阳的都邑，被称为殷墟。

巨大的宫殿、恢宏的宗庙、气势磅礴的王陵，描绘出一幅壮阔的画面。残断的甲骨卜辞，虽然常常只存留只言片语，但仍然可读出百转柔肠。

公元前1046年，当西周王朝的历史车轮碾过豫北大地的時候，殷商成为过去，都邑沦为废墟。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走向未来。

殷墟，值得我们永远关注。



ISBN 978-7-03-023171-0



9 787030 231710 >

定价：38.00元